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丁江 高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发行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15号)

长沙市潇湘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期刊登记证第125号

*

198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0千字 印张: 7.5

印数: 1—6,000 定价: 1.25元

目 录

湘 雅 春 秋

- 湘雅医学院的缘起和变迁…………… 张孝骞 (1)
- 从湘雅到湖南医学院…………… 凌敏猷 (12)
- 办学缘起和宗旨—学生运动—学校的恢复与改名—学
 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复员重建学校—在长沙和平解放
 前后—学校与雅礼会的关系
- 国立湘雅医学院西迁贵阳的情况…………… 张孝骞 (25)
- 抗战中的湘雅医院沅陵分院和 湘 雅 护 校
…………… 彭勇炎 杨传治 (33)
- 忆湘雅师生在解放战争中的斗争…李守谅 汪学仁 (37)
- 我忆“湘雅精神”…………… 黄友岐 (45)
- 怀念湘雅创始人之一颜福庆…………… 张孝骞 应元岳 (51)
- 架设中美友谊金桥的杰出医学家李振翩… 刘笑春 (53)
- 求学湘雅 忧国忧民—蜚声医林 造福人类—钟情故
 土 巧架金桥
- 回忆沙眼病原体发现者汤飞凡教授…………… 何 链 (68)
- 我的几段经历…………… 卢惠霖 (81)
- 从传教士家庭起步到洞庭湖滨—在大西洋彼岸留学和
 归来以后—在生物学王国里遨游探索—在科学的严冬
 中经受熬煎—进入八十年代科学的春天—终于成了一个
 彻底的无神论者

文化史料

肖同兹与中央通讯社……………黎宗烈 (96)

开创时期的中央通讯社—肖同兹接办以后的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的组织—中央通讯社的业务活动概况—中央通讯社对人民做了些什么—中央通讯社与各方面的微妙关系—接收敌伪物资的情形—两个巨头肖同兹和陈博生的简史

解放前湖南的公共图书馆……………周德辉 (114)

解放前的长沙图书业概况……………吴起鹤 (147)

我所知道的湖南《大公报》……………张平子 (174)

湖南《大公报》创办缘起与筹备经过—湖南《大公报》的组织与成员—湖南《大公报》主要成员之略历—湖南《大公报》的历程

关于湖南国术训练所的片断回忆……………竺永华 (204)

记亚新地学社……………邹协助 (208)

从黎锦晖说到湖南歌剧……………朱立奇 (212)

海外来稿

我生活的艺术天地……………(香港)周文珊 (224)

姑娘生来爱唱歌—多姿多采的学生时代—从中学到大学—半途出家皈依音乐

湘雅医学院的缘起和变迁

张 孝 骞*

西医最初是通过英美传教士在我国设立医院传入中国的。这当然是传教士们的传教手段之一，客观上起到了引进和推广西医的作用。据我所知，辛亥革命前，除李鸿章、袁世凯各曾设立军用的医学校外，我国没有自办的现代医学院校。丁福保曾在上海开设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医院，属于私人开业性质。他译述过一些国外医学书籍，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但没有办学校。直到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教育部才创办医学专门学校，采用当时的日本学制，为期四年。还有张季直(謇)创办了南通医学专门学校。

外国教会在我国设立医学校则为时较早。帕克(Peter Parker)于一八三四年在广州开设医院时，就收学生习医，一八六六年正式成立了医学校，据文献记载，这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设立医学校的开端。因孙中山在这里学习过，该校后来被命名为孙逸仙博士医学院，属岭南大学，即今中山医科大学前身。此后其他教会也先后在华创办医学校，如北京的旧协和，山东的齐鲁，上海的圣约翰，广州的夏葛，汉口的大同等，大都是先办医院，招收学徒，然后扩充为医学校。还有一些学校开办后因基础不牢固或因人士变迁而停办，或并入其它学校。这些学校设置的课程大都比较简单，一般用中文授课，学生毕业后多数

*张孝骞系湘雅最早的毕业生之一，任湘雅医学院院长达十年之久。解放后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是著名的内科学专家。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不能阅读外国文献，也难以进一步自学提高。因此，要培养高级医学人才，就必须派留学生出国深造。以上是湘雅成立以前我国医学教育的概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各校，如协和、齐鲁、圣约翰等都有各自的发展。

湘雅医学院原名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于一九一四年（本科开办于一九一六年）。它的产生也同上述院校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同于其它教会办的学校，它是由中国的育群学会和美国的雅礼会合办的。雅礼会也不是一般的教会，是美国耶鲁大学一部分校友组织的文教团体。先是雅礼会的胡美医师于一九一六年在长沙创办了雅礼医院和雅礼中学，最初规模都很小，雅礼医院的医师只有胡美一人。到一九一四年，雅礼会才和育群学会合作，办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其经过将在下面叙述。

胡美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深受该院医学教育改良派的熏陶，来华后立志兴办高水平的医学校 and 医院。他的这一理想不是偶然产生的。当初美国医学教育在一段时期内相当落后，到处都是由开业医生设立的医学校，学制混乱，忽视基础科学的训练，教学水平低。上个世纪末，美国一些生物、医学科学家在罗氏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下，掀起了一个医学教育改良运动，这一运动具有以下的内容和宗旨，即：加强基础科学课程，延长医学前期教育年限，直到大学文理科毕业；注重临床实践和临床与基础学科的密切结合；杜绝医学教育商业化；教师一律专任；精心计划学生毕业后的培训，包括住院医师制；大力提倡科学研究，寓教学于研究之中等等。霍普金斯医学院是首先实行这套制度的学校之一，还有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霍普金斯的创业教授，如欧斯勒、威尔迟、哈尔斯特、豪威尔等都成了一代宗师，对美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有过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学生遍布全美国的医学岗位，为美国医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运动基本上奠定了美国现

代医学的基础，逐渐固定了美国的医学教育模式。胡美是霍普金斯的毕业生，自然不满足于办一个小小的雅礼医院。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他要办一所高标准高质量的医学院，能和美国第一流的医学院媲美；就是要有坚实的基础课程，合格的专任教师，完善的实验设备，充分的实习课时，良好的临床基地，完全用英语教学等。在他手里这些目标虽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办起来以后，就成为华中地区最好的医学校，吸引着许多外省学生和华侨学生，而且是最早开设医学预科的学校之一。但由于湘雅没有固定资金，雅礼会财力有限，旧中国政府又不重视教育，致使原定的办学计划不能全部实现。比湘雅迟三年开办的新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财团罗氏基金会的独资经营下，异军突起，规模很大，确实办成了象胡美所设想的那种第一流的医学院。它的影响所及，大大推动了抗日战争前我国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事实上，协和也是极力效法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而且达到了神似的程度，连病房建筑的设计都不例外。协和的建设和常年的经费耗资巨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止，总共开支了二千三百余万美元。这是湘雅和我国当时任何其他医学院校望尘莫及的。

前而已经说过，雅礼医院成立时，规模很小，实际上是一个私人诊所。但上门看病的人却不少，逐渐得到市民的信任。一九一〇年抢米风潮之后又发生教案，许多教堂被焚毁，雅礼医院由于病友的维护得以保全。医院医师最初只有胡美一人，一九一〇年颜福庆回国参加了医院的工作。一九一一年初，盖仪贞护士长开始招收护士训练班，医院初具雏形。辛亥革命后，谭延闿任湖南都督，其母曾患大叶肺炎病势很重，在病程的后几天经颜福庆医师诊治，霍然痊愈，从而赢得了谭对西医的信任。颜、胡二人终于说服了谭，以湖南省政府名义与雅礼会合

办一所医学校，定名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其具体目标是：

(一)设立一现代化医学院；(二)兴办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三)在医院办一护士学校，培养护士和助产士；(四)筹设研究病因和医学科学的实验室。条件是中美双方各负同等责任：中方建筑医学校和护士学校校舍，担负常经费；美方建筑医院，支付十五名教授、医师、护士的薪金，这些人员必须是国外大学毕业、经雅礼会选派才能充任；董事会上双方有相等的代表权。合约为期十年，约满可以续订。合约送北京政府立案被驳回，理由是地方政府不得同外国团体缔约。经颜、胡二人晋京，邀集在京湘籍人士成立育群学会，代表省方签约，才获批准。育群学会首任会长为当时总统府顾问章通骏，颜福庆副之，聂其琨任书记。以后该会重心移到湖南，由省内知名人士主持。

合约签订后，省方拨给一栋坐落在潮宗门正街的某巨室的宅第作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院(扩大的雅礼医院)和湘雅护士学校的临时院(校)址。医学校第一班预科生一九一四年冬始业，本科一九一六年秋始业，一九二一年夏毕业。毕业生由湖南省政府发给毕业证书，由雅礼会经美国康州授权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嗣后每年毕业本科生一班。一九二〇年雅礼科学大楼落成，预科改由雅礼大学文理学院接办。这样不但能提高医预科的教学质量，也减少了医学校在人力、物力上的负担，能更好的集中力量办好医本科。协和医学院也有同样的经历，也是先办了预科，然后才由燕京大学代办本科。不过协和医预科的学制多一年，共为三年，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更加扎实。这是当时湘雅的不足之处。相形之下，湘雅经费不足，条件较差，但学风淳朴严谨，敦厚笃实，老师循循善诱，学生勤勉好学，师生之间仿如家人兄弟。这一传统可以说是湘雅的生命线。

湘雅医校自一九一四年开办后，中美双方履行了合约中各

自的承诺。中方在北门外购置了地产，兴建了校舍。雅礼会募得捐款，建造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化医院和添置了相应的设备，共约一百五十张病床。医院于一九一五年十月十八日举行奠基仪式，主持仪式者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尔·迟教授。医学校和医院于一九一九年迁入新址。后又盖了护校教室和宿舍，及几所教员住宅，都在现湖南医学院南院范围内。

医学院开办后每年招生一班，到一九二〇年，各年级都已齐全，但学生中因成绩不及格而留级或退学的比例相当大，主要原因是功课繁重，要求严格，而且英语授课也是一道难关。因此，截至一九二七年仅毕业学生七班，四十九人。北京协和医学院头七班的毕业生也不过六十四名。解放前协和和湘雅两校的毕业生总人数分别为三百一十六和三百五十八名，大致相等。

育群学会与雅礼会在十年的合约期间，医学院筚路蓝缕，困难多端，最大的难题是经费。雅礼会本身并无合约规定的派来十五名医护人员的财力，它主要靠募捐和某些基金会的资助，而这些都是非经常性的。湖南省所给的常经费每年只有五万元，而且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还经常扣发或迟发。其次，师资缺乏，开院之初，欧战方兴，以后美国参战，医护人员多赴前线，不易延聘合格人员来华任教。我所在的第一班受此影响最大，不少前期课由临床教师兼授，加上学生们的努力自学，勉强渡过了这一难关，接近二十年代师资问题才趋向缓和。总之，以人力物力来衡量，当时湘雅完成的教学和医疗任务是相当可观的。毕业生人数虽不多，但绝大多数投身在教学和公共医疗卫生岗位上，极少从事私人开业的，即使在抗日战争和艰苦岁月中，也多能坚持不懈。后来还有些同学参加了革命活动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十年合约期满后，中美双方都感到有骑虎难下之势。美方

财力不继，胡美曾一度考虑把湘雅并入教会联合会拟办在上海的医学院，但雅礼会董事未予支持。中方当然希望尽可能支撑现有的局面。几经商榷，最后达成一个续约十年的折衷方案：医学校完全由中国人自办，雅礼会撤销对医学校的一切行政管理权，由育群学会单独组织校董会；医院仍由中美合办，另设中美双方联合组成的医院董事会。医院和医学校通力协作，人员设备互通有无。这样，中国收回了教育全权，雅礼会减轻了负担，但医学校的经济困难相应加重了。

续约缔结后又毕业了两班学生。一九二六年因大革命洪流的影响，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湘雅也被卷入。一九二七年雅礼会人员全部撤离，医学校陷入困境，从而停顿达两年之久。但医院在中方人员和毕业同学的支持下，从未中断诊务。公推王子珏医师主持院政，并筹备恢复医学校，重组校董会。一九二九年秋医学校恢复开学，改名湘雅医学院，招收预科生两班。一九三一年校董会和医学院分别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湘雅医院属雅礼会所有，仍保留中美合办体制，另有院董命主持，但在较大程度上医院由医学院管理、使用和配备工作人员，雅礼会只派几名美籍医师、护士参加。该会代表何钦思还参预医院的财务管理。雅礼会人员中以外科教授顾仁夫妇服务最久，热情最高，直到医学院迁移贵阳，还远道来院短期任教。

医学院复校后的八年中（1929—1937），困难虽然不少，仍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齐全的教学班子，其中部分教师为本院毕业生。教师中应特别提到杨克念教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回国后任我院内科教授。他品学兼优，在我院复校早期多著劳绩，不幸因肠梗阻逝世，为我院当时一大损失。

一九二九年复校后的湘雅医学院，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学制为六年，一年预科，五年本科。仪器设备和临床条件

都具有一定规模。经费除湖南省款外，还有教育部和一些基金会的不定期补助。因此在军阀纷争、时局不稳的环境下，尚能勉强维持。从一九三五年起，每年毕业一班学生，也参加一些公共卫生和防疫救灾活动。在喜峰口战役中还派了师生联合组成的医疗队去支援浴血抗战的部队。可以说湘雅对当时的医学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好景不长，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最初湘雅尚能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且收容了六十多名战区学校借读生。随后上海撤退，战事蔓延到长江流域。长沙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首遭敌机轰炸。同年十二月南京弃守，武汉告急，长沙人心惶惶，医学院面临应变的抉择。这时王子珩院长已去江西任职，无法兼顾湘雅院政，校董会与代理院长共同商讨对策，决定西迁。但是，迁校却遇到一系列的困难。首先，雅礼会反对迁移，同他们合作的医院和护校只得任其留在长沙。一九四四年长沙失守，医院仓皇迁安化，损失惨重，护校则早在长沙大火时解散。其次，迁校经费和交通运输都难于筹措。最重要而不易解决的问题是医学院迁往何处。尽管如此，全体师生员工都一致支持迁校。一九三八年初夏即开始装箱。迁移地点当然首先考虑省内。我曾专程赴湘西沅陵考察。当时该城居民不足一万人，唯一的一所教会医院规模也很小，估计临床教学难以解决，只得放弃。事实上，后来难民群集沅陵，这个小城一时兴旺起来，湘雅医院随即在沅陵成立分院，并为护校的恢复提供了基地。当时没有预料到这些发展，致使医学院错过了机会。由于省内其他地点不是地少人稀，就是地当冲要，不够安全，只好退而思其次，考虑省外。太远的地方，如成都、昆明，限于经济条件，不敢设想。邻省广西较近，而且湘桂铁路正在铺轨，可能解决棘手的运输问题。因此倾向于迁往桂林。我曾两次赴桂林洽商，广西教育厅表示欢迎，并允给予协助，还

得到了省主席的接见和首肯，我们一时受到鼓舞。为了等待湘桂铁路通车，一九三八年七月，学院先将一些器材用船运至衡阳。没料到广西方面忽然推翻前议，使我们进退维谷，只得临时决定迁往贵阳。我于是年盛夏访问贵阳，得悉贵州省无力协助，但新近迁往贵阳的中央医院和新成立的贵阳医学院愿协助我们，因为湘雅一旦迁去，也可助他们一臂之力。特别是中央医院，前次初迁长沙期间已和湘雅建立了联系，此时该院人员分散，力量不够集中，湘雅临床人员恰好可以填补，而一个管理比较完善、设备比较齐全的中央医院，也能较好地解决湘雅的临床医学问题，堪称两利。后来事实证明，两院通力合作，真诚无间。中央医院人员，包括沈克非院长参加湘雅的教学；湘雅人员，包括我自己分担中央医院的诊备，而且各不另外受酬。至今回忆起来，仍觉难能可贵。这时，卫生署的卫生人员训练所也在贵阳，所长姚克方是湘雅校友，我们迁去后得到这个所的不少帮助，尤其是在初到贵阳的时候。

湘雅既决定西迁贵阳，四十多吨设备器材便经广西运筑，学生、教职员工和家属则租用西南运输处的回空车辆经湘西直赴贵阳。十月十一日胜利完成迁校任务，人员物资均未受损。经过两星期的紧张筹备，于十月二十四日上课。随后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十一月十二日晚间长沙发生大火，湘雅建筑群侥幸保存，护士学校却遭解散，医学院搬迁得正是时候。广州失守后，桂林亦受威胁，并迭遭敌机轰炸，原已迁桂林的武昌华中大学不得不再迁云南。广西爽约，对湘雅来说，竟是塞翁失马。

医学院迁到贵阳后的艰苦历程以及复校和临时建设的情况，许多校友都曾亲身经历，可能记忆犹新，不在这里赘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全体师生员工的忠诚。虽然物价飞涨，生活越来越艰苦，而且人少事繁，工作负担很重，湘雅人员都能以

院事为重，克己奉公，刻苦自励，团结奋斗，高效率地履行各自的职责，从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得教学和临床工作的质量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和迁徙的影响。临床人员都坚持专任制，不为开业的厚利所动摇，为学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学生也能保持淳朴勤奋的学风，接受艰苦环境的锻炼，养成节约、互助、积极、主动的习惯，无形中丰富了精神上的收获。

迁校后学生人数逐渐增加，截至复员前的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学年度，在校学生共二百五十九名，为迁校时的 216%，毕业学生八班共一百五十名。

医学院迁到贵阳后立即遇到经济危机，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学年度几乎濒于停顿。为此，前院长颜福庆不得不联合校董会进行所谓国立运动，就是申请把湘雅由私立改为公立，经费由教育部拨给，以解脱学院的困境。一九四〇年夏国立告成，但经费问题只得到部分解决。因为当时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单靠教育部一点经费，仍难维持学院的开支，因而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基金会和国外战时援华团体。雅礼会也给予了一定的资助，它的董事长和执行干事都到贵阳视察过。医学院在重庆时期，雅礼会还派了外科医师裴文坦来院协助教学和事务性工作，颇著劳绩，复员时又担任湘渝两地的通讯联络工作，后不幸因飞机失事殉职。

医学院改国立，仅限于学院本身，不包括同雅礼会合办的湘雅医院和湘雅护士学校。为了弥合和加强三个湘雅单位的联系和协作，三个单位的负责人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以湘雅医事中心命名的组织统筹其事，这个组织迄至一九四八年夏仍在筹备之中。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长驱直入，蹂躏湘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敌骑深入广西，一度窜到贵州独山。当时一般估计，敌人不敢继续深入，即令铤而走险，也可

望将其聚歼于贵州山区。不料国民党将领汤恩伯之流畏敌如虎，仓皇撤退，以致贵阳顿形混乱。湘雅原可以如中央医院一样，观望形势，在必要时转入山区。可是这时人心已经浮动，部分师生自动离院，难以制止，防空部队乘机占据湘雅校舍。医学院不得不再迁重庆。由于形势紧张，时间迫促，图书设备仓卒装箱待运，加之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干扰，损失不少。时值严冬，师生员工和家属步行数百里，狼狽凄惨之状，比之一九三八年有计划、有步骤地由湘迁筑，有天壤之别。果然，几天之后日军自动从独山撤走，贵阳无事。我一直留在湘雅村料理未了事宜，春节前才押运最后一批器材抵达重庆。

医学院初到重庆时的情况远比初到贵阳时更困难。当时山城的拥挤状况远远超过一九三八年的贵阳。若是没有驻香国寺的陆军医院院长李穆生校友的热情收容，湘雅真是走投无路了。我曾遍谒国民政府湘籍高级官员求援，包括重庆市长和湘雅在校学生的家长，都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还是通过一位中学同学的关系，借得兵工署在杨公桥的一所仓库，才勉强安顿下来，恢复上课。交换条件是我自己为该署和其所属单位履行会诊义务。医学院三月初上课，用缩短暑假来补足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学年度耽误的课时。医预科和医前期在杨公桥院本部上课，而在仓库外空地上盖了一些必需的临时房屋。感谢陈崇春院长和应元岳、吴英恺两位科主任的善意援引，高年级的临床教学得以在高滩岩重庆中央医院照常进行。两院合作完全采取贵阳中央医院的方式。虽为时不长，他们这种急公好义、助人为乐的精神是感人至深的。临床班学生宿舍是借用医院附近的某个机关废弃不用的草棚，稍加修葺尚不能完全遮避风雨，同学们毫无怨言，再一次体现了湘雅难苦朴实的传统学风。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投降，湘雅面临复员的艰巨任务。为了及时恢复湘雅医院，临床医师和家属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

九口车运返湘。医预科和医前期师生员工和图书设备，则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学年度课程完毕后，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分批运回长沙。流亡八年、两次迁徙的湘雅医学院，终于全部安然返回长沙原址，揭开了院史新的一页。我欢送最后一批人员离渝后，即应邀赴美国参观学习。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回院，一九四八年三月辞去医学院行政职务，专任临床和教学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北上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复校工作。

湘雅医学院在复员的同时，就开始了战后的建设，诸如修葺旧房，重建校舍，扩建病房，新建门诊，充实设备，增聘教师等等，真是千头万绪。我在重建工作中自愧少有贡献，具体情况，还是留待当事诸君记述为宜。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和平解放，医学院回到人民怀抱，从此规模不断扩大，院务蒸蒸日上，教职员工成倍增加，毕业学生年以百数计，为祖国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任何时期的湘雅都不能比拟的。这一段校史定能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从湘雅到湖南医学院

凌敏猷*

办学缘起和宗旨

湘雅医学院是湖南医学院的前身，创办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为它的院庆日。这个学校是由湖南育群学会和美国雅礼会合作开办的。雅礼会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同学组织的一个民间团体。它的代表胡美等人于一九〇六年就到了长沙。他们在西牌楼租了一处房子，开了一个小型医院，叫做雅礼医院。这个医院开张以后，治疗了一些病人。据龙伯坚告诉我，当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湖南督军谭延闿的母亲李太夫人，患了大叶性肺炎。谭母发病时，体温逐日升高，找了很多医生治疗，病情还是继续恶化，谭家的人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有人说，西牌楼有家外国人办的医院，何不请那里的医生来看看呢？因此，就把雅礼医院的胡美医师请去了。胡美问了病史和检查病人后，诊断为大叶性肺炎，病已到了烧退阶段，就开了一些西药（毫无特殊作用的）叫病人吞服，第二天谭母的病就好了。谭家的人都很惊讶，谭延闿感受尤深，认为外国人既有这样好的医术，我们为什么不学呢？故发起在长沙

*凌敏猷系湖南平江人，著名精神病学专家。一九二二年入湘雅本科，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二九年插入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回湘雅任教，一九四八年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现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一级教授。

开办医学校，以湖南省政府的名义与雅礼会签订了一个草约，共同开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当这个草约呈送到北京时，北京政府认为地方政府和外国民间团体合办事业，史无前例，不予批准。在这种情况下，谭延闿就把长沙教育界名流如胡元谈、陈润霖、曹典球等人组织起来，成立湖南育群学会，以此名义和雅礼会合办医学校，并派颜福庆和胡美携带中美双方的协议草约去北京，邀请一些在京做官的湘籍名人从中周旋，这个合作协议最后得到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批准。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正式开办，由育群、雅礼两会合组校董会，推举颜福庆为医学校的第一任校长。胡美医师为促成其事作了很大的努力。

当时，校董会制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要在湖南兴办一所第一流的医学院校。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前期、后期的设备都与美国同类院校差不多。美国雅礼会同意选送十多名做授来学校教学，中国方面负担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由湖南省政府拨给。

湖南省政府还拨给湘宗街一所民房做校址，但远远不够用。长沙当时是一个比较陈旧的城市，市内房屋非常拥挤，不适宜于医学事业大规模的发展，因此必需在城外找地方兴建校舍。湘雅负责人在长沙周围进行过调查，最初他们想把学校办在南门外，也想到过河西或水陆洲，但是这些地方或容易遭水淹，或交通不方便，都被放弃，最后决定在城北的麻园岭一带寻找校址。那时的麻园岭一片荒凉，有许多分散的菜地，还有许多坟墓和臭水沟池，离长沙城有三里多路。但湘雅的创办人颜福庆、胡美等人的眼光比较远大，考虑到若干年后学校发展的需要，目前虽离城稍远，将来交通发达了，问题不难解决；而且修整后的土地很适宜于开辟校园，雅礼会曾在此开办过中学；因此决定在该处建校。同时湖南省政府亦拨了大块地皮作为建

校之用。校舍很快就建起来了。

学校开办之初，颜福庆校长就号召学生努力钻研业务，学好本领为广大群众服务，千万不能走私人开业、只顾个人利益的道路。他还经常勉励学生努力争取成为第一流的医学人才。后来医学院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为我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

当时学校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注重培养学生的光荣感和自尊心（英文叫Honor System）。每次考试，无人监考，教师出了试题就离开了，让最后一位交卷的考生，将全部试卷收集送交老师。一般是无人舞弊的。万一发现了有人舞弊，处罚是严厉的（直至开除学籍）。通过这种教育，学生养成了自治、自尊，以诚实为无上光荣的观念，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学校对实习医员要求也很严格。某实习医员给学生开了阿托品，因记忆不准，将剂量多开了一千倍，幸得药房把关，未照处方配药，才免除了一次医疗事故。颜院长得知此事后，即召开教务会议，决定延长该员实习期六个月，并通报全院，引以为戒。我当时是本科一年级学生，此事对我教育很深，至今难忘。

学 生 运 动

湘雅学生一方面接受院领导的教育，认真学习业务，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同时也高度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大大提高，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并在学校里广为宣传。当时，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主办《湘江评论》，受到当局的压制，无法印刷发行。以龙伯坚为首的一批湘雅学生如张维、李振翩等在院内代为密秘刊印发行。因此毛泽东和湘雅学生有过不少接触和联系。长沙市组织学生联合会，湘雅学生张维被推举出任主席。一九二三年湖南人

民发动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运动，湘雅学生也积极参加，张维、李振翩、高镜朗等和其它各界代表在毛泽东率领下同上北京，控诉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不久张被驱逐出湖南。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内革命形势迅速高涨。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的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迅猛发展。湘雅学生早有革命传统，自然不甘落后，为了壮大革命声势，扩展革命力量，所有长沙市的学生游行示威、宣传，以及其他革命活动，均无役不从；少数先进分子还在中共长沙市委领导下，于校内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以指导运动。当时的学校领导层，对于革命形势认识不足，顾虑重重，一些美国教师首先离开长沙，一些外省教师也相继离去。颜院长感到学校无法维持，也离开长沙，避居汉口。学校只好停办。

湘雅停办后，颜校长先由汉口跑到北京，任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一九二七年秋，他邀集原湘雅的教师朱恒璧、孙克基、应光岳、任廷桂、骆傅荣等，再加聘乐文照、谷镜研等，又在上海开办一所医学院，初名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名上海医学院（现名上海第一医学院）。这个学校也逐步发展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医学院，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材。但是颜院长仍念念不忘湘雅，他不止一次说过：“我是从湘雅起家的，没有湘雅就没有上海医学院。”

参加大革命的湘雅学生，先后加入了北伐军充当军医或担任政治宣传工作。一九二七年五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湘雅学生中好些人奔向叶挺和贺龙所领导的部队。七月下旬，他们先后到达南昌，光荣地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其中有陈文贵、王肇勋、张毅、凌敏猷、肖卓、徐克钦等人。起义后，他们随军南下，受到反动军队的截击，经过多次激烈战斗，终于到达广东的潮州、汕头。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军又是千里行进，孤军奋战，

无后方，无供应，终于全军溃败。这批湘雅学生参加革命，完全是出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忱，对于革命理论尚无深刻认识，一旦遭此失败，就感到徬徨，纷纷回来寻求学习机会，以完成自己的学业。后来，他们在医学上都有所成就，并对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学校的恢复和改名

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停办以后，医院业务仍须维持。颜院长委托王子珩医师领导医院行政。医院业务除由肖元定、颜仁（雅礼会派来的）两医师主持外，王院长还邀请几位老湘雅毕业生如刘泽民、梁鸿训、袁道、王肇勋等回院工作。医院不仅没有停诊，业务还陆续有了发展，为长沙市和全省的保健事业做了很多工作，受到了社会的信赖。一九二八年，王院长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军医处长，驻节汉口。湘雅医院院长暂由肖元定代理。次年留在长沙的湘雅董事会董事陈润霖、曹典球、曾约农、顾仁等倡议恢复医学校，并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的支持。龙伯坚因与谭家有世谊，也在此中取过联系和促进作用。谭电令湖南省政府恢复对医学院的经费补助，并电邀王子珩返回长沙筹备复校。王旋由湘雅董事会推举为医学校校长，兼任医院院长。同年秋季，医学校恢复招生，规定学制为六年，又先后聘请杨克念、唐宁康、蒋醒、杨济时、李佩琳、李瑞林、苏祖裴等人，以加强教师阵容。还有几位美籍教师如范美玲等亦返回长沙。负有盛名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又恢复了，并改名为湘雅医学院。

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

张孝骞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一九二一年）毕业生。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连续工作多年。一九三六年回母校

担任教务主任。次年王子珩出任南昌中正医学院院长，湘雅校董会推举张孝骞接任院长职务。适值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华北，大举向华中华南进攻。这年夏天，武汉、南昌、广州相继沦陷，长沙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并遭到敌机轰炸。为了保存学校，湘雅是否应该迁校？迁到哪里？这是需要迅速作出决策的。当时日美关系尚未破裂，美国人相信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因而雅礼会坚决反对迁校。迁校当然有很多困难，一则交通不方便；二则离开湖南以后便无经济来源；三则能迁走的只是教职员和学生以及少量的教学设备和图书，到达目的地以后，人员住宿、教学用房以及临床教学等问题如何解决，都是问题。然而在张院长的号召下，全院师生都坚决拥护迁校，后来经与前院长颜福庆（当时在重庆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反复磋商，决定迁往贵阳。迁校中最繁重的总务工作，特邀请李启盘医师担任。遂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分两路向贵阳进发：一路乘火车至广西金城江，转乘汽车至贵阳；一路循公路至湘西、黔东直抵贵阳。到达目的地以后，分别租赁民房和旅社，安置教职员和家属，学生则暂时寄住贵阳东山的寺庙，并借用阳明路贵阳医学院房屋进行课堂教学，又与从南京迁来贵阳油榨街的中央医院合作进行临床教学。虽然迁校匆忙，诸事如麻，然而由于全体师生的努力，教学工作很快就走上了正轨。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日本飞机第一次对贵阳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大片建筑顿时成为焦土，居民死伤不少。湘雅人员迅速疏散，迁往市郊的乡村，幸无一人遇难。张院长高瞻远瞩，看到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于是准备在贵阳作比较长久的打算，总务主任李启盘足智多谋，精打细算，勤恳为公，一心扑在建设临时院舍的工作上。他们首先在贵阳次南门外石洞坡租得长郡义园的地皮，在此兴建三栋木撑瓦盖、篾壁涂灰的两层楼房，以解决前期教学、行政办公和学生住宿的需要；另外建了一栋茅草盖的

平房，作为学生食堂和礼堂之用。又由教师自己出钱盖起了简陋住宅若干所，以安置家属。

李启盘为了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采取了几条行之有效的措施：一、学生在生活、学习、工作方面都需要坐凳子，如果每个场所都准备凳子，开支是很大的。他只为每个学生准备一条凳子，而且只有三只脚，让凳子跟人走，这样就节省了不少木材和经费。二、当时贵阳没有自来水，饮水和用水都要到坡下一条小河里去挑，李主任置备了运水牛车，先把坡路整修好，派学生轮流赶牛车运水。三、实验室用水则把楠竹打通，接于水桶之下，使其源源流入。四、贵阳老鼠多，常把实验室的小动物咬死。他按白施恩教授的设计，把小动物笼用木柱架起升高，并在柱子中段用圆尖物拦住，以防止老鼠往上爬。李主任还在其他许多方面想了不少好办法，既省钱又解决了实际需要。

石洞坡后来改名为湘雅村，抗日战争胜利后，医学院全部迁回长沙，这个名称仍然保存着，至今未变。从湘雅村到油梓街中央医院约有五里之遥，担任临床教学的教师，包括张孝骞院长在内，不论天晴下雨或冬季寒风凛冽，每日均步行于两地之间，使临床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无论在医疗教学或行政措施方面都给了湘雅以许多方便。

一九三八年九月，湘雅医学院迁往贵阳时，湘雅医院和护士学校仍留在长沙，以适应居民的医疗需要，并为医学院的高年级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同年十一月长沙大火后到一九四四年间，肖元定、凌惠扬曾率部份医护人员到安化东坪作短暂停留。李明俊率部分人员前往耒阳，以适应省级机关（当时省政府迁往耒阳）的医疗需要。多数医务人员则由刘泽民、王泰元带领迁往湘西沅陵，并在那里开办医院、护校，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才搬回长沙。

湘雅迁贵阳后，很快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当时湖南已属战

区，不少地方业已沦陷，省政府难于按时发放教育经费；加以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学校脱离了自己的医院，再无医疗方面的收入，雅礼会本来就不同意湘雅迁校，复因战事关系，不能有所接济。而迁校在旅途运输上花费很大，到达贵阳以后的生活需要和教学、行政开支更是大大增加，所以不到一年，学校就无法维持了。张孝骞院长为此劳心伤神，向各方面寻求帮助，都无结果，最后只好请求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即所谓“国立运动”。当时朝野人士对湘雅医学院均较重视，故请求“国立”之议一经提出，即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上顺利通过。从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起，医学院改为国立湘雅医学院，所需经费由教育部直接拨给。

一九四四年冬，日军对贵州省发动进攻，占领独山，威胁贵阳，许多机关学校和厂矿企业，纷纷从贵阳向重庆搬迁；交通运输极端紧张，湘雅遇到的困难较之上次由湘迁黔更为严重。张院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多方求人帮助，仅租得几辆卡车，运输学校的公物和少量教学设备，学生只好背着行李，结队步行，员工及其家属则让他们自找运输工具。到达重庆以后，租借兵工署的一所厂房（在重庆市大杨公桥），安置学生和前期教学；又得到重庆陆军医院和其他医院的帮助，使临床教学得以继续进行。在重庆一段时间真可谓黎明前的黑暗，全院师生员工都吃了不少苦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全院师生员工欣喜若狂，争着燃放鞭炮，上街游行，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复员重建学校

抗战胜利了，大家高兴地筹划复校。后期师生于一九四五年年底首先迁回长沙，次年六月全院复员完毕。此时张孝骞院长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离开重庆去美国讲学，院长职务由肖

元定教授代理。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曾四次进出长沙，一九四五年最后一次撤退时，将湘雅原有院舍全部焚毁。我们需要在废墟上重建校园。在肖代院长领导下，全院师生员工通力合作，克服重重困难，利用各种条件，于学生回院时尽量立即开课，并重建校舍。首先将医学大楼修复并改为四层楼房，名曰“福庆楼”，以纪念颜前院长。所有医前期教学设备、学生宿舍、单身教职员宿舍和学院办公用房都安排在这座大楼之内。另外还修建了一些家属住宅，恢复了护士学校。

一九四七年夏，张孝骞院长自美国归来，不愿销假复职，肖元代院长亦拒绝继续代理，教育部亦无人可派，院长一职遂成问题。后经多方联系磋商，部里决定聘我接任。我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正式就职。

抗战八年，医学院经过两次大迁徙（先迁贵阳，后迁重庆），经历了很多巨大的困难。原在长沙的院舍遭日军烧毁，复员建设任务繁重，历时两载，始粗具规模。在张孝骞担任院长的十年之中，学院每年继续招生，弦歌从未中断，教学质量一直保持了早年的高水准。这不能不归功于张孝骞的坚强领导和全体教师、学生、职员、工友的通力合作和辛勤劳动。

那些年代，特别是两次迁校（由贵阳迁往重庆和由重庆迁回长沙）之际，医学院的教学人员有些变动。首先是白施恩和孙宗彭两位教授先后从贵阳离去，刘秉阳（微生物学）、黄友歧（神经病学）、梁觉如（小儿科）等教师加入。随后，袁道、徐荫棠、王以康、朱鹤年等教授也先后离开。迁回长沙后加入的有邓一隽（卫生学教授兼湘雅医院院长）、卢惠霖（生物学）、易见龙（生理学）、任邦哲（生化学）、叶雨雯（药理学）等教师。还有一批由助教、讲师或副教授向上递升的，如刘友斌（化学）、潘世宸（病理）、王同曾（解剖）等等。自抗日战

争以来，不管学院的物质条件如何困难，在教学方面总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为了贯彻实现上述原则，主要责任自然就落在教师身上。教师有权处理教学业务上的各种问题，包括学生成绩的评定和他们的升、降、去、留等等，从而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

以前在长沙雅礼大学任生物学教授的张福良先生，一九四八年秋受南京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委托来到长沙，想在湖南农村开展一些工作。他和湘雅医学院会商之后，决定在岳阳搞血吸虫的防治研究，在郴县许家洞搞疟疾的防治研究，并于两地设立研究站。医学院派寄生虫学教师陈国杰去许家洞，陈枯鑫去岳阳，分别主持其事，由农村复兴委员会补助一部分经费。解放后，两站均移交湖南省卫生处接管。许家洞站不久停办，岳阳站继续工作，对于洞庭湖沿岸的血吸虫病的防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长沙和平解放前后

由于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起义，长沙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和平解放。自一九四八年春季至一九四九年秋季，长沙的政治局势极不稳定。一方面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长沙解放指日可待。另一方面白崇禧由武汉窜来长沙，企图作垂死挣扎，以致危机四伏，人心惶惶。当时医学院的经济来源濒于枯竭，无以维持教职工最低限度的生活，教师队伍随时有溃散的可能；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学院财产有被抢劫、破坏的危险。这期间，有几桩事情特别值得回忆一下。

一、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一位负责人来到长沙，下榻省卫生处。他打电话询问医学院的情况，在得知学院经费异常困难，不易维持下去之后，他很同情我们的处境，并告知美国给国民政府的援助中有一笔指定作医学教育

的专款，可以分配一部分给湘雅，邀我同去上海一趟。我们于第二日就乘飞机到了上海。我拿了他写的英文介绍信到外滩去找一位负责处理美援的美国人。这人看了信以后，就给湘雅医学院签发一纸向中国银行领取一批数目很大的金圆卷支票。我拿着这张支票，并邀请上海医学院同学方侃教授同往上海交易所，换得黄金若干两，又小心翼翼地带着黄金搭乘由上海飞长沙的最后一次班机回到了学院。这次上海之行，可谓满载而归。有了这笔款项，我就大胆地向全院师生员工宣布：“不管时局如何变化，大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是有保障的。”因而安定了人心，稳定了教师队伍。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仍从广州汇来一笔金圆卷，学院又移用一部分医院收入，就这样勉强度过了难关。从上海带回的黄金，几乎全部用于扩建医院病床。

二、一九四九年夏，南京、武汉等地相继解放，长沙形势骤然紧张。为防止破坏与抢劫事件发生，医学院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院长兼任，委员有教师刘秉阳、陈国杰、邓一赓、王泰元、任邦哲等人。委员会之下设护院纠察队，以学生、工人为主体，也有比较年轻的教职员参加，由事务主任刘济尘担任实际指导。纠察队的任务是保护学院财产，以防破坏。纠察队共有队员一百余人，在学院范围内划分了巡逻区域，并在许多重要场所装设了电铃，遇有紧急情况，立即鸣铃报警。纠察队员的武器最初只有木棍，每人一根。后来从国民党退役军人处借（购）来驳壳枪三支交纠察队使用（解放后均上缴公安部门）。此外又和长沙市警察局北区分局联系，请他们派武装警察在医学院周围定期巡逻，以防意外。纠察队紧张地工作了两个星期，幸而没有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学院财产得以全部保存，未遗失一针一线。

三、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曾多次来我院探索共产党员名单（当时我院确有一批共产党员在从事秘密活动，一些负责同

志和进步人士也一度住进我院)。有次甚至派便衣武装包围我们的教务会议,勒令交出名单。但是每次都被我们据理驳斥或婉言拒绝了,教职工、学生和工友都未受到政治迫害。七月中旬,国民政府教育部自广州来电,命令医学院随军南撤,我们提出一些理由,如交通困难,给养无着落等等,表示只能从长计议,无法立即执行。因此在长沙和平解放时,这所历史悠久、富有成绩的医学院得以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四、长沙解放以后,立即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不久,军管会派代表郑琼前来接管学院,院内群众亦推派代表进行协助,所有人事、经费、图书、设备以及房屋建筑等都一一作了移交。

湘雅医学院虽于一九四〇年改为国立,当时仍留在湖南的湘雅医院和护士学校未被政府接管。于是另设“湘雅医事中心”管理这两个院校。此次医事中心所有财产一并交由军事代表接管了。

医学院与同它有关系的医院、学校的应变和接管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是由于得到了地下党及时的指示,以及进步师生的协助和支持。这在湘雅的历史上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长沙解放后不久,湘雅医学院由中南卫生部直接领导,院长仍由凌敏猷担任。中南卫生部先后派殷传昭、孟献国担任副院长。由于人民政府对我院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注意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各项工作蒸蒸日上。一九五五年,人民政府令长沙市第五中学搬迁,所遗校舍全部拨给我院,我院院舍扩大一倍。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间,我院呈现了一片兴旺景象。

解放初期,教师中自请离开的有内科教授兼教务主任吴执中,被调离的有微生物学教授刘秉阳、寄生虫学教授陈国杰、物理学副教授邝华俊等。本院多数毕业生被分配出去,许多

外校毕业的学生被大量分配进来。

“湘雅医学院”这个名称本来含有湖南人民（育群学会为代表）和美国人民（雅礼会为代表）合办医学教育事业的意愿。解放以前三十五年间虽然毕业生仅四〇六人，但所造就的师资，一直是本院各教学部门的中坚力量。我国医学界的著名人物不少是从本院毕业出去的，例如内科学教授张孝骞，微生物专家谢少文，以及汤飞凡（微生物学家）、谢志光（放射学家）、董秉奇（外科学专家）等等。故湘雅名声久以传遍南北，享誉中外，她对于中国医学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九五三年十月，我们正式奉中南卫生部指示，将学院名称改为湖南医学院，以迄今日。

学校与雅礼会的关系

前面已经谈到，雅礼会对于湘雅医学院的开办和发展，有过很大的贡献。对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两方的合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二六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高潮，北伐军进入长沙时，医学校的美籍教师纷纷离去，因而导致学校暂时停办。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逼进长沙，医学院被迫迁往贵阳，当时雅礼会另有见解，不予同意，合作几乎完全中断。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由于美帝国主义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并发动了侵朝战争，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雅礼会的朋友被迫相继离去，从此我院与雅礼会的关系中断了近三十年。一九七九年中美恢复邦交以后，雅礼会的朋友又相继来访，加强了双方的学术交流，增进了合作关系。在结束本文时，我衷心祝愿属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人员与学术交流今后能够顺利发展，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国立湘雅医学院西迁贵阳的情况*

张 孝 骞

历史概况

国立湘雅医学院前身为私立湘雅医学院，成立于一九一四年，原名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是湖南育群学会和美国雅礼会合办的。在此之前，雅礼会还在长沙创办了湘雅医院。育群学会系由湖南教育界人士组成，并接受省政府津贴。至一九二五年，与美国雅礼会的十年合约期满，撤销了其对医学院的行政管理。学院由中国人自办，并成立了新的董事会。一九二七年湖南发生政治上的变动，雅礼会召回大部分医务人员，学院和医院一度停办，不久医院就恢复了，学院则停办达两年之久。一九二九年秋，学院复办，招收学生四十四名，分为两个医预班。

一九三一年，湘雅董事会和医学院在教育部立了案。湘雅医院属雅礼会财产，仍保持中美合作体制，但在很大程度上由学院管理使用。医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湖南省政府的津贴、教育部的补助费和国内及美国雅礼会的捐款。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湘雅医学院成为当时国内少

* 这是张孝骞教授(时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医学院迁往贵阳改为国立后起草的一份报告，原题为《国立湘雅医学院——一份西迁贵阳后的历史性报告文档》，原文系英文，写于一九四一年。近年由张孝骞教授本人译成中文，编者在文字上有所删改。

数几个能维持相对正常秩序的医学院之一。有一个时期，曾收容过六十多名“借读生”。其教学医院（主要为湘雅医院）还为伤病员提供了医疗服务。不久，战事蔓延到长江流域，迫使学院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自长沙撤退，迁至贵州贵阳。当年十月，于贵阳临时院址复课。在此非常困难时期，美国雅礼会恢复了部分经济上的援助。

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根据学院申请教育部批准改为国立。我们之所以作此申请，是为了缓和学院搬迁后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使学院得以维持下去。教育部批准为国立，说明了各方面对我们工作和贡献的评价，同时也符合美国雅礼会把学院行政和财政责任在条件成熟时逐步移交给我们的初衷。学院改为国立后，仍然保持原有的办学方针和历史传统，以及长期建立起来的和各方面的联系。国立还有利于进一步争取国内外各方面包括湖南省政府和美国雅礼会的援助。

迁院经过

在战事逼近湖南，敌机频繁进行无目标滥炸的情况下，湘雅董事会认为这个具有近三十年历史、设备较好的医学院，应该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设法保存下来，将设备和人员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为国家培养医学人材，医院则可以留在长沙，为市民及战争受害者提供医疗服务。最初，曾考虑将学院迁往广西桂林，后来还是选定了贵州贵阳。因为在贵阳，能够较好地安排与其他医疗机构的合作。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开始将设备装箱，七月一日首批设备离开长沙，在衡阳等待向西转运。九月，四十吨设备由铁路经过广西运到贵阳，另租八辆两吨汽车将学生、教职员工及家属经湘西直运贵阳。总运输费用为24,297.5元（编者注：系指当时的法币，以下同）。

迁院工作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完成。经过两周紧张准备，学院于十月二十四日上课，仅比正常开学时间推迟三周。搬迁后，除三人因病休假外，教师队伍基本保持稳定；学生注册人数一百二十名（较前一年仅少六名）。设备图书经过1,400公里行程，几乎全部安全到达。当时西南运输处在运输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罗氏基金会则捐助了三千美元（相当于18,000元法币），用以支付部分运输费用。

贵 阳 复 校

学院迁到贵阳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其中最紧迫的是院舍问题。当时政府没有给予援助。在近半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租赁来的不合用的房屋内办公和进行部分教学，同时借用了贵阳医学院的空闲教室。学生则分散住在租来的民房内，有一段时间宿舍竟达八处之多。值得庆幸的是，在那样不利前条件下，大多数教学设备安装起来了，学生能正常上课，并前进行必要的实验室实习作业。

为了给教师和学生创造较好的教学和学习条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们租了贵阳郊区离城两公里的一块长沙义园的土地，十二月动工建房，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末，三栋两层楼房及几处附设建筑物即告落成。这些房屋勉强够头三个年级作教室、实验室和宿舍之用，高年级学生则迁入学院在中央医院内所建的宿舍，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另建了五处临时房屋。在起草本文时，还有三处正打算兴建。一九四一年计划再在附近为职工家属建造八栋简易宿舍。至此，为建房支付了50,000元。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这些房产现已增值。

在房屋和经费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安排好实验室和使全院人员适应新情况，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节约用房，我们想方设法提高房间的利用率；家具设计简单；包装箱用作书架和

药品试剂台；凳子做成活动的手提式；椅子成为罕有的奢侈品。学生有时须站着吃饭和上课。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间要住十二至十四个学生。没有电源和自来水，经教师们的巧妙安排，实验课照常进行，未受多大影响。

到一九三九年四月，学院已基本上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但由于教职员及学生人数陆续增加，因而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越来越感到困难。唯一的办法，是每办一件事都坚持节约和讲求实效的原则。而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行政事务人员的努力。湘雅医学院之所以能在贵阳较早复院，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他们的忠诚和勤奋分不开的。

复院后，教学仍然经常而临困难，其中包括敌机的轰炸。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二日，四枚炸弹落在我院动物室右侧，该室全部被毁，并严重损坏了附近的建筑物。幸而事先已有足够防备，才未造成人员伤亡。对中央医院（湘雅医学院的教学医院）的轰炸就更严重，有四名护士死亡，四名其他人员受伤。湘雅学生幸免于难。

学 院 现 状

学院把医预科及医前期的教学放在自建的临时院舍内进行，临床教学则安排在中央医院。该院约有二百张病床，具备一般的教学条件，另设了一个特别伤员病房。学院和医院之间密切合作，医教人员通力协作，设备互通有无，结合使用，使得医疗和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这样的合作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长沙和沅陵的湘雅医院则作为训练实习医师和湘雅护士学校教学之用。

学院的教职员计有十四名教授，五名副教授，十五名讲师和六名助教，全部为专职；另有十名名誉或兼职教师。约有二十名行政事务人员，八名技术员，二名护士。中央医院属卫生

署，另有编制，学院临床教师在该院临诊，该院人员兼学院教师，都不额外受酬。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学生为一百六十名，其中女生五十五名，占全部学生人数的34%。

医学院的主要教学设备都已迁到贵阳。全部医预科及医前期课程都配备正规实验课，学生能得到充分的独立操作机会。实习标本很充足，只是试剂和化学药品缺乏储备，兼因运输困难，不能随时补充。

临床教学主要在教学医院的病房和门诊部进行，注重个别施教。一年平均有三十例尸检，约为死亡病例的17%。临床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之间，经常就有兴趣的课题开展讨论。前五个学年的教学时数，70%为实验和自习，30%为课堂讲授。第六年在医院实习。

在当时条件下，高等院校开展正常的科学研究是很困难的。虽然如此，在过去两年半中，学院尽量克服障碍，保持了科研的气氛和势头。例如：临床教师对某些贵阳地方病如斑疹伤寒、疟疾、阿米巴痢疾等进行了调查研究；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病理学等部门都分别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一个特殊的营养研究室正在着手筹建。所有这些工作都鼓励学生主动参加。由于缺乏资金，学院无力出版定期刊物，致使多数科研成果未能发表，甚为可惜。

医学院在国立之前，经济上已经十分困窘，实际上在迁院前预算就难以平衡。在贵阳的前两年，即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共用去364,152.43元。学院并无任何基金，常年经费主要靠湖南省政府的津贴和教育部的少数补助，平均每年不足80,000元，学生学费是微不足道的，约8,000元。学院所以能够搬迁和在贵阳复院，是由于接受了不同来源的捐赠，特别是中华基金会、美国雅礼会和罗氏基金会的资助。但

这些捐赠多为临时性质，远远不敷应用。因此，学院负了沉重的债务。

国立后，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一九四一年，政府答应总共拨给290,570元。而开支估计约为400,000元，将有110,000元的赤字。这一预算数字已把工作范围适当扩大、教职员及学生人员稍有增加、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预计在内了。一九四〇年最后五个月的总开支为137,436.93元。如以此标准按全年计算，应为330,000元。从当前物价还在继续上涨的情况来看，上列400,000元的预算数字不能算估计过高。细差部分我们希望争取各方赠款和补助，以资弥补。

设在长沙和沅陵的湘雅医院系中美民间合办的事业，但与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两院床位总数约三百张，目前开放三分之二。湘雅护校设在沅陵湘雅医院，有六十名学生。

学生生活及组织

湘雅学生一向崇尚稳健、朴实，学习勤勉。学院搬迁和复院的艰苦过程，又有助于增强这种品质，使之具有坚定、节俭、积极主动、热爱医学专业和热心公益事业等优点。学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能获得如此良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实为有幸。

全体学生都住学院宿舍。宿舍设备简陋，没有工役，学生自做清洁卫生及其他生活上的事情，有时还要在夜间轮流值班。多数人自己洗衣，男学生也不例外。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低年级学生还接受军事训练。教育部规定的“导师制”也在审慎实行，导师注意培养学生的思想和品德。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将来可望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学生所付学费是很微少的，每学期只有十元。伙食是在学院的监督下由学生自办的。伙食费随物价上涨而逐步增加，目前

每月约需三十元。加上书籍、衣服和其他杂费，每人每年至少需七百五十元。55%的学生来自敌占区，一般没有经济来源，分别由教育部、湖南省政府、教会、湘雅奖学基金和基督教青年会所属学生救济委员会资助。

学生一半以上为基督教徒，三分之二为湖南籍，其余来自广东、浙江、湖北、江西、福建、江苏、河北、辽宁、山东、安徽、四川、贵州、广西、陕西、吉林、黑龙江等省。男女学生比例为二比一。

学生组织包括学生自治会、学生基督教青年会、歌咏队及学生自助会。学生自治会是照教育部规定组织的，在湘雅着重进行体育及文娱活动。湘雅戏剧社和湘雅排球队是贵阳大专院校同类组织中的佼佼者。湘雅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有九十九名成员，大都为基督教徒，它与贵阳市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女青年会密切联系，开办查经班和主持星期天礼拜，湘雅歌咏队在贵阳也很有声誉。这些组织中，学生自治会和自助会特别值得一提。早于一九三九年，在国外学生为援助战时中国学生的慷慨捐款活动感动下，湘雅学生认为自助和互助是他们自己应尽的职责。于是，比较富裕的同学主动帮助穷困的同学，捐输了一笔相当数目的救济金。高年级同学把低年级同学需要的教科书赠送或低价卖给他们。女同学组织起缝衣班，为男同学缝补衣服，男同学则利用业余时间种菜和互相理发。所有这类活动均由自助会主办，自治会协助办理，曾给院方的教育和行政工作以有效的配合。

在教育部要求下，教职员与学生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参与群众教育工作。我院承担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扫除文盲、卫生教育、急救指导和在条件允许时的预防医学管理等活动。每年夏季，多数高年级的学生照例到农村协助公共卫生人员进行抗流行病的工作。事实证明，这种实践对他们是非常有益的。

结 束 语

湘雅医学院的办学目标，是要在战时及将来复员后把学院办成国内最好的医学院之一。它的教学目的是把学生训练成既是好公民，又是合格的医师，给他们灌输公医制度的优越性，培养他们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并着重造就他们高尚的品德。一九三八年，学院迁到贵阳和复院的过程，并没有严重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

战争结束后，学院将搬回湖南长沙。届时与有关单位和机构，特别是湖南省政府及美国雅礼会的联系和合作当可重新恢复。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

抗战中的湘雅医院沅陵分院 和湘雅护校

彭 勇 炎 杨 传 治 *

沅水之滨，凤凰山麓的东树湾里，筑起了十余栋竹木结构的平房，数十名白衣战士为了伤病难胞和当地群众的疾病痛苦在这里忙碌着。这就是抗战时期的湘雅医院沅陵分院和湘雅护士学校。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侵占武汉以后，长沙告急，所有机关、学校和工商企业纷纷筹划搬迁。湘雅医学院已于同年九月迁往贵阳。湘雅医院因有市民和伤员的医疗任务，仍留长沙。湘雅护士学校则被迫暂时关闭，仅留部分高年级学生在医院实习协助护理工作，低年级学生各自回家避难。

同年十一月，日军逼近长沙，局势更加危急，医院护理部主任陈琰如和内科医师吕静轩得到代理院长顾仁医生（Gr. W. Greene）的同意，携带少量药品和器材以及布类等物资，约集检验师、药剂师、老工友各一名，护士长五名，外科医师一名，分途避至湘西沅陵，首先在交通要冲驿码头汽车站开设门诊。因省政府行署设在这里，省直机关如教育厅、财政厅、省银行、电报厂和好几所私立学校如雅礼、福湘等中学相继迁来，沅陵一时成了战时的湖南省会，人口由几万一跃而为二十

*彭勇炎、杨传治均系当事人。彭现任湖南医学院耳鼻喉科教授，杨曾任湖南卫生学校校长。

余万，致使居住拥挤，生活艰苦，病人相应增多，一个门诊部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的医疗需要。由于行署的帮助，在凤凰山下买了一栋木房子，并积极和贵阳、长沙方面联系，获得一些救济物资，于一九三九年春，因陋就简地建立了湘雅医院沅陵分院。

在贵阳的医学院院长张孝骞教授和留长沙的医院院长肖元定教授，先后到沅陵分院指导工作。与此同时，湘雅护士学校也在沅陵恢复了。张、肖二院长任命刘泽民教授和王泰元先生分管医院和护校，但院校在工作上是密切联系和互相支持的。

护校恢复后，立即召集本校疏散学生及收容常德护校逃难的转学学生共五十五名分班复课。一九四〇年春季招收新生一个班。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恢复春秋两季招生。同时每年又代办省立高级助产士班一个班。以上各班都只能招到学生二十名左右。在校学生数每年约一百余人。虽然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仍坚持严格训练，力图保持在长沙时的水准，课程设置和学制(三年半)均未缩减，医院的医师和护士长都担任教学任务，病室、寝室兼做教室，遇有空袭时，就在山谷的树林中或防空洞里教学。教材缺乏，就由教师口授，学生记笔记。有的教师白天上班，晚上编印讲义，把医疗、护理和教学统一起来，做到理论密切结合实际，力求使学生学得扎实，熟练地掌握技术。七年间共招收护士班十一个，助产士班五个。护士、助产士共毕业一百余名。按当时政府规定，护士毕业后须分派在军医院或公共卫生机构服务一年，助产士则担任妇婴保健工作。这样，使得湘雅护校的毕业生有机会直接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经当时教育厅考核，护校毕业生成绩列为甲等。

在分院房屋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刘泽民院长亲自设计并率领民工，把一栋栋的竹编泥糊或木板房子建起来了，病室、手术室、药剂室、检验室、专用医疗用房、教室、图书室以及生活用房都成比例地增加。病床由数十张增加至一百五十张左

右，门诊每日由百余人增至二百余人，还在城中心中南门借用当地宏恩医院的两间房屋另设门诊部一处，每日应诊病人也达二百人次左右。

照明设备在医院里是非常重要的。分院开始没有电灯，晚上遇有急诊，就马灯、手电筒一齐上，剖腹、截肢及难产等手术都能照常进行。由于消毒严格，外科手术伤口都能达到一级愈合，极少有感染者。实践证明，没有高压蒸气锅进行器械及敷料消毒，用瓶密封蒸两小时，也能达到无菌或灭菌的目的。

沅陵地处湘川公路要冲，战时人口流动频繁，一度霍乱流行。因此分院又在县城东郊的“三吾古寺”内增设隔离传染病院，以适应需要。该院医护人员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抢救霍乱病人。无床就以竹板、木板权当病床；输液瓶不够，就用灌肠筒代替。就这样，许多上呕下泻、失水严重、形如骷髅的病人被抬进来后，打一针就见效，迅速恢复健康走了回去。当地人民都认为这是湘雅分院创造的奇迹。据吕静轩医师回忆：当时国外文献记录，霍乱死亡率是20%，而这次沅陵霍乱大流行的死亡率只有3.7%。因此，湘雅分院曾受到国际联盟霍乱委员会的特别嘉奖。该院还先后控制了流行性脑膜炎及痢疾等传染病对沅陵人民的侵害。

沅陵分院在业务组织上主要分内、外两大科，刘泽民院长兼内科主任，成德教授任外科主任。各科医务人员分主治、住院、助理住院医师及实习医员几个等级。内科包括所有非手术的疾病，如一般内科、皮肤花柳科、小儿科、神经精神科及流行传染科等。外科则包括一切须行手术的疾病，如一般外科、眼耳鼻喉科、妇产科、泌尿科等。医院的规章制度和各级医务人员的职责均保持与在长沙时一样，如住院医师实行二十四小时负责制，头一年的助理住院医师及实习医员书写各自的完全病历，主治医师每日早晚查病房各一次，督促检查各级医师的工

作；科主任每周大查房一至三次等。

根据沅陵分院的实际，对医学院每年由贵阳派来的实习医员，采取大胆放手，抓紧督促检查，履行各项制度，严格审阅和修改临床病历记录、各项检验报告以及检验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效果的办法，既抓典型病例的临床讨论与讲授，又注意理论密切结合实践，收到了既治疗病人又培养了人才的效果。曾在沅陵分院实习的学员，不仅在战时发挥了救死扶伤的作用，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绝大多数都成为大医院的专家教授，如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院眼科劳远琇教授、贵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兼骨科主任孙其发等，都是医卫战线上的出色人才。

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沅陵分院和护校经过近七年艰苦奋斗，完成了历史使命，于当年十月全部迁回长沙原址。刘泽民教授和傅乐敦先生是步行返回长沙的。当时长沙的护校校舍和医院房屋尽毁于战火，仅残留下一栋大楼。护校和医院仍于十一月照常复课、开诊，为医学院从重庆迁回长沙复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忆湘雅师生在解放战争中的斗争

李守谅 汪学仁*

湘雅医学院是一所国内驰名的学校，也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与湘雅学生有过不少接触。一九二六年，湘雅成立过共产党组织，领导了学生运动；有一批湘雅学生在“马日事变”后，光荣地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九三八年，又有一批湘雅学生（包括护士学校的学生），先后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战争。关于这些革命史实，已有专人撰写，我们仅将解放战争时期湘雅医学院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以及领导革命斗争的情况记述如后。

建党前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一）聆听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和进步学者的报告。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溃退千里，湘雅医学院在从湖南迁往贵阳后，于一九四四年冬又被迫转移到重庆。同学们长途跋涉，倍受艰辛，亲身经受了大片国土沦陷后的苦难。到达重庆后，部份同学借住战区收容所，进步同学有机会接触了重庆的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汪学仁通过地下党员张志昂邀请著名学者郭沫若、茅盾、翦伯赞等来校作报告，他们从

*李守谅和汪学仁均系当时湘雅学生，李守谅现任湖南医学院学报编审。汪学仁现为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副主任医师。

各个方面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本质，同学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郭沫若、茅盾还题词勉励同学们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争取民主而斗争。郭老的题词是“实事求是，虚己接物”；茅盾的题词是“努力民主，和法西斯的细菌斗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重庆成为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激烈较量的地方。湘雅进步同学与重庆地下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兰维廉、魏书均、汪学仁等鼓励同学们订阅《新华日报》，并向进步同学介绍进步书刊。一九四六年一月旧政协闭幕后，周恩来同志在沙坪坝重庆大学作报告，兰维廉、汪学仁、陈璋、魏泽强、欧钟文、李安伯等人串联了湘雅二十四班大部份同学及二十五班和其他班一部份同学去听报告。周恩来同志用大量的事实，精辟的分析，阐明了抗战胜利后的局势，使同学们认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和平的不同态度。由于同学们提高了认识，所以当反动派于二月二十二日欺骗煽动重庆万余青年学生进行反共反苏游行，捣毁《新华日报》重庆民生路营业部时，湘雅有部份同学写信给《新华日报》社，表示慰问。

（二）林智事件。一九四六年五月，湘雅从重庆迁回长沙，地下党随即派长沙市北区负责人张经武（原二十四班学生）住进了三楼学生宿舍，进行地下工作。

一九四七年四月，学校发生了“林智事件”。因二十四班没有病理学教师，学校聘请了联合国救济总署湖南分署卫生组派到湘雅医院的外籍外科医师林智兼课。林智不仅手术粗糙，造成死亡事故，而且课堂讲授照本宣科，同学们毫无收获。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侮辱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他不叫学生的名字，也不叫学号，总是叫“我的儿子”。同学们口头提出请他改正，他不理睬；书面提出，他又当场撕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经请示地下党，兰维廉、魏书均等发动全班同学讨论，一致商定，如果林智再不改正，就在上课时，由魏发出信

号，朱镛莲带头一齐走出教室，以示抗议。这件事终于发生了，震动了全校。学校当局唯恐这一行动会导致救济总署削减对学校经济上的支援，于是责令学生表态认错。经过两天的追究，除个别同学认错外，绝大多数同学都坚持真理，维护民族尊严，不肯认错，在鸦雀无声的教室里孔华宇同学第一个勇敢地站起来说：“我们没有错！”同学们跟着纷纷呼喊：“没有错！”这次斗争增强了同学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斗争必胜的信心，为后来的学生运动打下了基础。

（三）“六·二六”游行前后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女学生沈崇事件，全国人民对美军的暴行及蒋介石置民族尊严于不顾的媚外政策义愤填膺，湘雅学生也不例外，向全国发出了抗议美军的通电，一九四七年春，地下党组织在湘雅进步同学中介绍和传阅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五月，上海学生游行示威，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五月二十二日，湖南大学举行了罢课游行，游行队伍到达兴汉门。五月二十五日传来了南京发生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五·二〇”惨案的消息，孔华宇提出在同学中发起签名要求举行罢课，声援南京爱国学生运动。兰维廉、魏书均、孔华宇、陈璋、汪学仁、魏泽强等分别在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班征集同学签名，大多数人赞成罢课，但也有一部份同学不赞成罢课，同学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学校当局的监督下，全体学生在福庆楼一楼小礼堂展开了辩论。会上李寿复等慷慨陈词，呼吁罢课，参加全国性的“六·二”游行。辩论后，全体同学分别在赞成罢课和不赞成罢课的本子上签名，结果以一票之多通过了罢课。易凡、魏泽强、朱掌书多次过河与湖大同学联系，争取一致行动。五月三十一日下午，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准备在湘雅福庆二楼一年级教室举行

会议。布置会场时，突然有将近二百名国民党军警人员包围了福庆楼。我们立即研究决定，发动二十六班全体女同学和二十五班大部份女同学陪伴已经到会的代表（男同学），佯装成一对对“情人”，款款走出校门，并在各个路口通知各校代表，改在当天晚上去湖大科学馆开会。湘雅学生会派魏书均、李安伯、魏泽强为代表去湖大参加会议。易凡、朱掌书负责联系落实游行路线和纠察等事项，也过河去湖大。六月二日晨，湘雅医学院游行队伍由李寿复带领从福庆三楼出发，来到福庆楼大门。这时代理院长肖元定和部份教授，出于爱护学生之心，跪在学生队伍面前。肖院长说：“你们的家长把你们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好好教你们学医，今天出去游行，外面很危险，我只有跪下来求你们了。”原来学校已经接到通知，蒋介石已向全国发出急电，要严厉镇压“六·二”游行。这时学生们也跪下了，大家泣不成声。李寿复把队伍带到小礼堂，再次辩论是否外出游行。这时湖大游行队伍已经到达湘雅校门口，高呼口号，等待我们会师。兰维廉、魏书均、李安伯研究以后，认为湖大同学坐划子都过河来了，难道我们连大门也不出去吗？！于是李安伯含着热泪，再一次向同学们说明参加“六·二”游行的重大意义。最后高呼：“凡愿意游行的跟我来！”于是大批同学跟着李安伯冲出了福庆楼。这时学校大门已经封锁，有的同学越墙与湖大同学汇合。肖元定代院长受到感动，打开大门把游行队伍放了出去。这次游行，长沙各大、中学学生都参加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当时湖大校长胡庶华教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湘雅的陈枯鑫、沈士弼、陈国杰、程治平等老师也同情和支持“六·二”游行，有的还参加了游行，给同学们以极大的鼓舞。

“六·二”游行结束后，惩罚随之而来，不少同学被迫休学、留级，有的被取消贷金。李安伯被扣发贷金，留级察看；

汪学仁被借口有肺结核病勒令休学，立即离校，不准参加医前期考试。

建立湘雅地下党组织

一九四八年，湘雅医学院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是兰维廉，后由魏书均、汪学仁先后继任，直接与张经武同志联系。其发展过程如下。

一九四七年，张经武经过长期考察，首先介绍兰维廉入党；以后又吸收了魏书均、汪学仁、陈璋、蔡孝明、刘沈秋、李守谅、毛政翔、刘正直、艾芳等人入党，以后又转来地下党员魏之文，党组织逐步扩大，开展了一系列进步的活动。

（一）成立班代表联席会和生活团契。这些都是学生组织。一九四八年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但学生会由于参加“六·二”游行被当局取缔了。为了团结进步同学，争取中间同学，把湘雅医学院的学生运动重新开展起来，地下党的组织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各班推选代表，组织班代表联席会。经过酝酿、发动，得到各班大部份同学的支持。一九四八年暑假后成立了班联会，作为公开的群众组织，选举兰维廉为班联会主席。为进一步团结广大群众，又成立了生活团契。为什么取名“团契”？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因为湘雅原有基督教团契，定期活动。我们可以循例，只把基督教团契改为生活团契，以便吸收非基督教徒参加。生活团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由魏书均担任团契主席，组织开展各种符合广大学生要求的进步活动。具体活动有以下几项。

组织小型读书会，出版生活壁报。由李守谅、朱掌书、陈修、毛会亭、陈璋、汪学仁等组织壁报编辑委员会。壁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有从香港寄来的进步书刊剪贴；有由毛政翔、刘沈秋在夜间收听新华社广播的记录，交李守谅整理，

改换语气，报道解放战争进展的真实消息；有转载翻译的进步文章；有陈祐鑫教授的访美见闻，主要说明美国工业发达集中，比我们更怕原子弹，藉以消除人们的恐核心理。

成立铁牛剧团。由蔡孝明任团长。蔡自编了剧本，徐有恒、孙君絮、朱掌书等参加了演出。一九四八年除夕还组织了冬残晚会，兰维廉、李寿复等表演了《三根火柴》，讽刺战争贩子企图毁灭世界，结果把自己也毁灭了；李寿复朗诵了《米，你在哪里》，反映了当时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徐有恒表演的《小儿郎上学堂》，表现了解放区翻身工农努力学习文化的热情。一九四九春，还在演剧六队的帮助下，为资助患肺结核病的同学疗养，又演了《日出》，使他们感到了生活团契的温暖。

组织民歌社。一九四八年冬，南京中央大学有一批同学因遭受迫害，来到长沙，汪学仁邀请了其中的地下党员傅业奎来校教演秧歌舞，教唱《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歌曲，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此时，湘雅地下党经过研究决定在学生中成立民歌社，征得音乐爱好者朱世铎同意由他任队长。民歌社迅速扩大到一百余人，经常在福庆楼一楼教室练唱。演剧六队作曲家宋杨、演员朱而、储声虹、龚克利等都曾来校指导。《山那边是好地方》、《光明颂》、《古怪歌》、《小呀小儿郎》、《跌倒了算什么》、《康定情歌》等豪放、响亮的歌声，鼓舞了同学们的斗志，增进了彼此的感情。

举办工人夜校。一九四八年，地下党派魏书均在湘雅办了一个工人夜校，教员有李守谅、汪学仁、陈璋、陈修等人。通过历史课讲授农民起义，通过语文课讲授鲁迅散文等，提高了学员的思想觉悟。参加夜校学习的有曹本润、何义安、吴开春、曹庆林、朱新华、吴仁秀、杨军祥等十余人，其中大多数在解放初期入党参军，有的还考进了大学，以后从事国防尖端

科学研究。

(二) 走向社会，宣传群众。一九四八年，地下党还组织了部份同学走向社会，参观印刷厂和国民党的所谓“模范监狱”。在狱中，发现大部份“囚犯”营养差，劳动重，而一些汉奸则住单人房间，生活舒适。在地下党的示意下，李守谅以“亮明”的笔名撰文在《法报》上披露参观见闻，揭露“模范监狱”的不模范实情。还利用长沙《中央日报》主笔石冲白系我校德语教师之便，派孔华宇主编《大众医学》专栏，在报上向广大群众普及医学卫生知识。

一九四九年初，由于通货膨胀，学生伙食水平下降，刘树铮等同学曾贴出大字报表示抗议，地下党支持了这一正义行动。四月解放军渡江后，白崇禧退驻长沙。当时国统区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湘雅地下党和群众组织在中共长沙市工委的领导下，组织学生停课，上街搞宣传。徐有恒任总指挥，下分四个宣传队和四个纠察队。有一个宣传队在水风井路口宣传金元券贬值，民不聊生，必须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时，听众十分同情。突然有个国民党军人挑衅地问：“是谁不要和平？”混在听众中的特务便连声喊“打”！这时，纠察队要小贩收起扁担，不要让特务抢去当武器打人，小贩把箩筐投到宣传队面前，使特务无法接近，保护了宣传队员；但纠察队员吴恒素、黄桂育两人被打伤，幸及时躲入天主堂医院门诊所，才避免重伤。事后徐有恒、魏泽强、易凡等代表全体同学向省政府提出抗议，这时程潜主席已筹划起义，答应查处肇事凶手，赔偿医疗费用。

护院保产 拒迁广州 迎接解放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省工委派曹治阳通过龙伯坚先生与凌敏猷院长取得联系，决定每两周在结核病院集会一次，由曹治

阳同志讲解党的城市政策，传达省工委的有关指示。四月，省工委要求凌敏猷院长，征得陈祐鑫老师的同意后，派了陈与沈威廉医师一起去湘中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五月，凌敏猷院长得到省工委关于保护院产，把湘雅医学院完整地交给人民的指示。湘雅地下党也在同时接到这一指示。从七月起，双方配合默契，采取了多项措施，开展护院保产斗争。首先成立一支以学生和工人为主体的，部份老中青教师参加的全院性护院纠察队。经地下党研究后，指派陈璋具体掌握和指导。纠察队员白天照常上课，夜间手执棍棒等武器巡逻值班。在护院期间，陈璋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在工人中建立了外围组织，周敏、曹庆林、杨军祥等参加了这一组织。他们在解放前成为组织工人参加各项进步活动的骨干。七月间，教育部曾电令医学院南迁广州。凌敏猷院长坚决执行湖南省工委的指示，拒绝了教育部的命令。但为客观环境所逼，不能不予应付。为此，凌院长利用国民党政府撤退中交通运输紧张等矛盾，带着电报去找省政府秘书长杨绩荪，申诉南迁有运输和经费等困难，并故意提出如果迁广州需要上百辆卡车运输，杨解决不了这些困难，只好在电文上批示“缓议”。这样，湘雅抗迁取得了成功。

八月五日，地下党员和全院师生员工热情地迎接解放军进城。随即组织医疗队去东屯渡为伤病员治疗。在刘秉阳教授的支持下，还为四十六军开办了化验员训练班。

我忆“湘雅精神”

黄友歧*

“南湘雅、北协和”之誉

湖南医学院的前身湘雅医学院（原称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创办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五三年才改名为湖南医学院。这所高等学府，当时颇负盛名，在国内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誉（后者系指原北平协和医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可见当时在人们心目中，它可与协和媲美。本来，湘雅无论从学校的规模、师资的阵容以及设备器械的完备等方面，都不及协和，而人们竟将两者相提并论，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湘雅为国家造就了不少优秀的医学人才，从而使她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确实，湘雅——人们常称为“老湘雅”，从第一班起，即出了不少人才，其中蜚声国内外者，包括健在的和已故的就有张孝骞、应云岳、汤飞凡等，随后又有谢志光、李振翩、谢少文辈，都是闻名中外的专家、学者，真可说是人才辈出。其后，很多出身于湘雅的，虽或不如前辈那样负有盛名，但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完全可以与国内首屈一指的医学院的毕业生一比高低。因此，湘雅的毕业生，不

*黄友歧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曾任湖南医学院图书馆馆长、教授，现为该院神经病学教授。

论到哪里工作，都无不受人青睐。

什么是“湘雅精神”

于是，人们就会问，湘雅的物质条件既然不怎么好，但是多年来却造就了很多人才，这是因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湘雅精神”的传统贯穿其间，起着造就一流人才的作用呢？“湘雅精神”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我是母校第九班的学生，我们班可以说是“承先启后”的一个班（因为我们系一九二九年秋湘雅重新开办时入学的，先是，它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高潮时曾一度停办）。我一九三九年从协和医学院学习期满后回到母校工作，直到现在，加之我平日对母校的史实和掌故比较留心，所以我想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适合的。我以为“湘雅精神”对于造就医学人才和提高学校声誉确实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它的主要内容主要是一个“严”字，其具体含义是：严格、严肃、严厉。据说湘雅的创始人早 在建院之初，就已提出，本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就是“从严”，用现代的话讲就是“高标准、严要求”。

关于对学生的要求严，在一个学生还未进入医本科时，就已实行了。传闻有某生，在学完医预科（当时设在雅礼大学内）课程时，被一位教有机化学课的外籍老师叫去，对他说“你的课堂学习成绩，还算可以，只是实习操作却不利索。如果你不学医，这门课的学习还可以通得过，如果你要学医，那就非补实习课不可。”结果，那个学生只好硬着头皮去补习实习课，从而推迟了他进入医本科的时间。

那时，教师授课都是用英语（直到我们入学的年代以至四十年代还是这样）。有的教师自己并不讲课，只是事先指定学生去读某本教科书的第几页到第几页。通常每一次指定的章节，份量都很重。有的教师一上课堂，就随意点一个学生的名向他提

问。这时学生得起立回答。如果他回答的不够使教师满意，教师并不立即叫他坐下。我记得很清楚，某次，上应用解剖学课，肖元定老师向我提问：“人的眼窝，宽、高和深各是多少厘米？我一时竟然把这些本来记得很准的数字搞混了，他就等了好一会才叫我坐下，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有的教师并不指定教科书，也不发给学生讲义，而是由自己当场口授，让学生各自作笔记。偶尔，教师把某一点讲错了，还要靠学生在读教科书时，精心核对，反复琢磨，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大多数教师都是事先并不通知，不定期的举行测验，作为平时成绩的记分。某一美籍英语教员干脆每一堂课在开始讲课前，就要对学生进行一次简短的测验。你如跟不上班，就只有降到下一班学习，甚至被勒令通学。

下面这件事差不多成为我们在校时期的一则笑话：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内科教授，举行期考（即大考）时，出了很多范围大小不等的试题，学生都要一一作答，交卷时间不限。因此，有的学生从上午进入考场，直至下午很晚才交卷，这一天中午就只好饿着肚子了。个别同学在经过这样一场考试后，要买一只母鸡来吃，说是应付这场考试，“刮了一身肉，要补一补才行”。

教师考学生，一般采取信任制度（nonor system），即举行考试时，教师在发给学生试题后，即坐在教室里，只顾做自己的事，并不进行监考，有的甚至干脆离开考场，任学生各自去作答卷。不过，万一有学生舞弊被教师发现，就立即被取消参加考试的资格，而且不一定准其下期补考。

“严”字种种

湘雅素来重视实验课。在学生物、物理、化学课时，学生每一次都要做实验，如果教师认为有哪一点不合要求，就会要

求他重做，否则那堂实验课就通不过。

记得我们班学组织学课时，杨克念老师安排我们自己用新鲜的猪、羊肉组织制作标本，在显微镜下检查。上病理学课作尸体解剖时，学生照例被叫去站在一旁观看，由教师讲解。这时，教师总是告诫学生对死者要怀有一种庄严尊敬的心情，绝不许有一点轻蔑或淡漠无情的表现。记得有一次为一个因患腹部脂肪瘤而死亡的女尸体做解剖，在作准备时，有位学生在一旁说：“这个尸体比猪还大。”这句话引出一阵笑声，当时，内科主任某（女性、美籍）恰巧也在场观看。她将这个学生狠狠训斥了一顿，说死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机会，我们对之应抱极其严肃的态度。说完还向女尸敬了一个礼。她的话对在场的每个人都不啻上了一堂生动的医学伦理课。

抗日战争期间，湘雅首先西迁贵阳（1938—1944），后又迁往重庆（1944—1946）。由于学校经费奇缺，所建临时校舍都极其简陋、狭小，一般都是竹木结构的。尽管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医前期各学科都照常设置了实验室，供学生做实验之用。由此可见学院对学生的实验课是如何的重视。

对学生的临床实习课，要求也非常严格。教师不仅要求学生操作正规、熟练，而且特别强调对病人的态度要十分谨慎、严肃，绝对不许因实习而引起任何对病人不利的后果。我们下一班的某位同学，在一次物理诊断课中，检查一位脊椎结核患者时，要坐在病床上的患者，向前弯着身子接受检查，不巧被教师看到了。这个教师立即当着许多人斥责这位同学，并且不让他继续检查了，事后还声言要罚这位同学留级。

另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对一位刚咯过血的肺结核病患者作胸部叩诊，被教师看到了，也险些被罚留级，由于患者再三恳求宽恕，本人也作出了检讨，并保证以后决不重犯，才免于处分。

在我们上学的年代，湘雅实行的学制是六年制，学生到五年级，即进入见习期。这时学生在一位助理住院医师手下担任临床工作，与实习医员不同之处，在于不负责病人的治疗和处理。

一个见习医员常常要在病室里管十几张病床。每一个病人入院，他都要写出完全病历，并且按照规定，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这项工作。有时因工作需要，一个见习医员要代理实习医员的工作。代理实习医员是要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担负起治疗和处理病人的责任的。由于那时的教师和上级医师对学生都是“放手不放眼”，让他们独立大胆去工作，学生所受的精神上的压力反而更大，工作起来无不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生怕在工作中出现医疗事故。

紧张而严格的实习期

一个实习医生的职责，简单地说，就是面向病人。学生在最后一年的实习期里，不是在病室就是在门诊工作。我们那个班到了第六年只剩下十一个同学，工作面又铺得很宽。因此，事多人少，任务特别繁重。例如一个病室（平均设三十张病床）只配备一至二名实习医员，他们除了做临床治疗外，还要做所管病人的三大常规化验。在内科工作的，每星期还要单独看一次免费门诊。一名外科实习医员不仅必须协助上级师生做手术，而且要做各项术前准备工作。

实习医员每天工作十分繁忙，常常要熬到深夜才能回寝室睡觉。记得有一次，时值盛夏，我在一天内收了六、七个病人，因为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病史写作，白天未完成，就不得不开夜车，结果差不多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还要照常上班，处理病室里应做的一切事情，午后才躺下休息一阵，到了下午上班的时候，我还在酣睡。当时和我在同一病室工作的

一实习医员刘秉阳，也因为工作过于疲劳，没有起来。恰逢那天是主任查房的日子，总住院医师看到两位实习医员还未上班，就到寝室来叫醒我们，我俩才急急忙忙赶到病室，结果，我们挨了杨济时主任和总住院医师刘泽民一顿狠狠的批评。

记得在我当实习医员的后半年即一九三五年春天，恰巧碰上长沙发生流行性脑膜炎，湘雅医院（即现在的第一附属医院）奉命收治流脑病人。那时，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尚未发明，治疗流脑的唯一办法就是每天从病人身上抽出大量的脑脊液，随即用生理盐水冲洗脊髓腔。这就要求做侧脑室或小脑延髓池穿刺和腰椎穿刺。这项工作大都是由实习医员去做。虽说是在上级医师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的，但对每一个实习医员来说，都是难度很大的任务。何况那时是实行二十四小时负责制，大家无不是夜以继日地在工作。

在那个年代，教师不光是传授给学生专业知识，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医德，总是教导学生要树立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思想。一次，我们下一班的一位同学，在他所管的一个病人垂危时，估计到病人会在当天夜间死亡，就将死亡记录预先填好，只将死亡时间一栏空着，准备到时再填写。不料这桩事被上级医师（也就是教师）发觉，当即狠狠训斥这个学生一顿，该生险些受到延长一年实习期的处分。理由是，他对病人的生死不竭尽全力进行抢救，而是无动于衷。

从以上这些回忆中引伸出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以“严”字为核心的“湘雅精神”。就是这种精神使湘雅成为一所国内外闻名的高等学府。“湘雅精神”中的某些东西，今天仍可作为我们办理高等教育的借鉴。

怀念湘雅创始人之一颜福庆

张孝骞 应元岳*

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颜福庆先生，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含冤逝世。中共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于一九七八年年底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推倒强加在颜福庆先生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之后，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颜福庆先生是上海人，一九〇四年在前上海约圣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先后赴美、英、奥等国深造。一九〇九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嗣后又在英国获得热带病学学位。回国后，他主持兴办了湘雅医学院，嗣后又创办了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前身）及其附属医院，先后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兼院长、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等职。他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培养了大批医药卫生人才。

颜福庆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强调要有真才实学和掌握基础理论。他关心人民健康，提倡“公医制”和预防医学，影响深远。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除兴办医学教育外，还同医务界前辈创立了“中华医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旋将当时由教会医院外籍医师组织和操纵的“博医学会”合并过

* 张孝骞、应元岳均系湘雅医学院首届毕业生。

来。从此，这个学会就成为我国自己的医学学术团体，对我国医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颜福庆出国留学前，曾在南非一个矿山担任矿医，深受矿工们的尊敬和爱戴，矿工们集体赠送他一枚金质纪念章。以后，颜福庆又赴拉丁美洲参加钩虫病防治工作。一九一一年东北三省鼠疫流行期间，他在京汉铁路沿线从事防治工作。一九一六年，他到江西萍乡煤矿从事钩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并采取防治措施，先后于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了有关钩虫病的流行和防治的论文。此外，他还积极参加红十字会、卫生防疫、防痨、麻疯防治和妇幼保健等方面的社团组织领导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颜福庆担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动医学院校的师生和医务人员组织医疗救护队，到抗日前线前后方，做了大量工作。

全国解放后，颜福庆亲眼看到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单就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发展情况来说，就远远超过了他早年以~~上海医学院及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为基础~~建立“上海医学中心”的理想。他认识到他的这种理想在旧中国无法实现，只有在新中国才能成为现实。

抗美援朝期间，颜福庆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积极动员医药卫生人员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医疗手术队赴朝鲜前线。他还参加了慰问团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建国十周年时，他撰写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一文，刊载于《中国建设》杂志上。

颜福庆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等职。他在晚年，仍坚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会议以及各项社会活动。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举行三十周年院庆时，他受到中央卫生部的嘉奖。还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架设中美友谊金桥的杰出

医学家李振翩

刘笑春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日，湖南省政协和湖南医学院举办了纪念著名美籍华人医学家李振翩教授逝世一周年的集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中医药中心（ACCAM）和李振翩教授基金会等组织的三十一位美国朋友，以及李振翩教授的女儿吉·李家瑞，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纪念活动。北京、广州、山东、昆明、成都等地学者、李教授的亲属，以及湖南省政府、湖南省政协、北京市政协、湖南省教育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和统战部、湖南省卫生厅、涟源县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二百多人参加了纪念大会。省政协副主席周政，副省长王向天，湖南医学院院长徐有恒，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官员、美中医药中心负责人黄子尚及李振翩教授的女儿李家瑞，先后讲了话。原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陈浩在会上宣读了前驻美大使章文晋的书面发言。前驻美大使、外交学会副会长柴泽民寄来了书面发言。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发来了电报。黄子尚先生代表在美国的华人亲友敬献了挽联，联曰：“振振谋救国，主张格致新民，才先向试管里扫荡馊毒，不意间救活百万儿童，先生功德永垂不朽；翩翩入医林，踏实悬壶教学，却不忘国际间宣传大

●刘笑春系湖南医学院院刊主编，他根据海外有关资料并采访李振翩教授的女儿吉·李家瑞女士和其他亲属整理了此文。

同，求全面沟通东西学术，后进举杯敬老成。”为了纪念这位医学界的巨人，笔者特收集了有关史料，并走访了吉·李家瑞及其亲属，整理出李振翩教授的生平事迹，以存史实，所述容有错误，希知情者予以指正。

一八九八年十月十六日，湘乡县一个山川秀丽的村子（今属涟源县）传来喜讯：李稼夫老先生喜获麟儿，这就是李振翩的诞生。李振翩原名“承德”，后改名“振翩”。李振翩上面还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是这个家庭的第七个孩子。

李振翩的父亲李稼夫是位读书人，早年考秀才未中，家道逐渐破落。他的母亲成氏，是位善良的农家妇女，为人厚道，常能扶贫济困。她总是教育孩子们不要损人利己。李振翩也最喜爱自己的母亲。他七岁入私塾读书，后来进了小学。小学毕业后，他听说长沙有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还有个湘乡会馆，就高兴地步行来到长沙城，考进了湘乡驻省中学。因为家境贫寒，交学费都有困难。他总是省吃俭用，常常一个盐鸭蛋吃三顿，一心理头读书，每期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可是要继续读下去困难的确很大。他听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曾打算去报考师范。后来又听说湘雅护士学校招生。这个学校是一位叫胡美的美国医师开办的，专门培训新式护士。在这里读书，除了不交学费和包食宿之外，还发给制服和零用钱。不满十六岁的李振翩十分喜欢为人解除疾病痛苦的职业，立即报名应考，结果考中了。

求学湘雅 忧国忧民

一九一四年，李振翩入湘雅护校学习，准备当一名职业护士。他学习刻苦用功，英文水平提高很快；在病房里，他热心细微地护理每一个病人，受到老师们的表扬，尤其深得教他英语的美籍教师的赞赏。正巧，这位老师的丈夫在湘雅医学专门学

校教课。他们热情地鼓励李振翩继续深造，并推荐他报考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一九一八年秋，李振翩和另外二十五名青年被录取为湘雅医预科学生，二年后升入医本科，编在第五班。

李振翩在湘雅求学的那段时间，正值连年军阀混战。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竟然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热血青年，有识之士，纷纷喊出了“救国”的时代强音。一九一九年初，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从事学生运动。他和湘雅三班学生张维等，发起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由张维担任第一任会长，他们还决定成立湘雅学生出版部，发行报纸，由苏润坡、龙毓莹（即龙伯坚，其传刊于本刊第22辑——编者注）、张孝骞、李振翩等担任编辑，出版发行了《学生救国报》。这是湘省学界的第一份刊物。

一九一九年五月初，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长沙，湘雅学生迅起响应，全校七、八十名学生成立了学生会，由高也愚任会长。六月三日，学生会带领学生开始持续两周的罢课，李振翩率领全班同学参加了这一活动。

随后，一批学生刊物纷纷出版，如湖南学生联合会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高等师范学校由曹典琦（后改名曹伯韩）主编的《岳麓》周刊，甲种工业学校由符狄梁主编的《甲工》周刊，明德中学由唐耀章主编的《明德》周刊，周南女校由周敦祥主编的《女界钟》等，学联的《学生救国报》刊行两期后改名为《新湖南》周刊。同时出版了一种《新湖南》月刊，但两者并无关系。当时，由毛泽东提议，联合以上六种周刊，由六位主编组成了湖南学生周报联合会，会址设在楚怡小学。因为何叔衡在楚怡小学教书，这里也就成了学生运动的据点之一。学生周报联合会不设会长，只设总干事一人，负责档案保管、通讯联络、主持会议及处理日常事务。湘雅三班学生龙毓莹被

大家推为总干事，先后召集了三次会议。《新湖南》发行两期后，龙毓莹感到独立难支，正在这时，《湘江评论》被反动军阀张敬尧查封。龙毓莹于是与张维、李振翩商量，决定请毛泽东来校主编《新湖南》。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新湖南》从第三期开始由毛泽东接办。他每期都为《新湖南》撰写几篇论文，用通俗易懂、犀利透辟的文笔，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思想意志和“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自第七期开始，《新湖南》周刊进行了革新，提出“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四项办报宗旨。刊物出完第九期，也被张敬尧查封了。

一九一九年底，湘雅学生会再度组织学生罢课，与长沙市其他学校的学生一道发起抵制日货、检举奸商、反对当局镇压学生运动，随即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团长，有湘雅学生李振翩、高也愚、张维等参加的“驱张请愿团”赴京请愿，终于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在这次运动中，李振翩上下串连，左右呼应，十分活跃。由于他们的“过激”行为，险遭反动军阀杀害。

驱张之后，李振翩刻苦求学，不问外事。他后来在《中国医药卫生事业之建设》一文中写道：“湖南有少数觉悟的青年，自‘五四’、‘驱张’两役以后，便抱着闭门读书的政策，不与闻校外一切事业。间或有人讥他们为不热心，他们也抱着‘呼我为马者则应之为马’的态度。但是，他们的冷静，是暂时的，并非对于国事永不与闻，极愿在最短时间内，预备充分的学力，以便将来在创造新中国的时候，担任一小部分的建设事业。据著者个人意见，此类青年的目光，未尝不远大，吾人当加以赞助，而不当与以反对。”这段话其实是李本人内心的写照。他在求学期间，依然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去上海参加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当两人

分手时，李振翩曾向毛泽东表示：“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医学，将来定可重逢。”

一九二二年的一天，湘雅的传达员找到李振翩说：“李先生，外面有个洋车夫找你。”李振翩来到传达室门口一看，原来是毛泽东，只见他身着长衫，脚穿草鞋。李振翩异常欣喜，笑着说：“原来你就是洋车夫呵！”毛泽东一把拉住李振翩的胳膊，急着说：“你管他洋车夫、土车夫的，赶快跟我走！你速去叫上张维，我有急事求你们帮忙。”原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已经发作要生孩子了。当时毛泽东从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后回到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杨开慧协助他开展工作。他们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因此没有与李见面。现在爱人生孩子，只好来找老朋友帮忙了。李振翩和张维随毛泽东来到住所，不多久，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就平安地降生了。

李振翩当时一边学习医学，一边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他还主编了《湘雅》杂志，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出版了第一期，在次年建校十周年时又编出了第二期。第一期《湘雅》杂志，刊有十六篇学术性文章，其中李振翩就写了六篇，即《霍乱及其治疗》、《糖尿病食物的分配》、《性的卫生》、《病原及治疗原则》、《花柳病略说》、《中国医药卫生事业之建设》；此外，他还编写了帕斯特和南汀格尔两人的小传。《湘雅》杂志第二期刊登的二十二篇学术性文章中，李振翩写有《肝的功用之新测验法》和《科学的婚姻》，这一期还刊有孙中山先生为湘雅医学院第五届毕业生的题词“学成致用”的影印件和“湘雅春秋”（校史）、学校教师及毕业学生简介等资料。

一九二五年，李振翩以优异成绩从湘雅医学院毕业。美国雅礼会依据康涅狄克州的宪章精神，分别授予李振翩和同时毕业的桑沛恩、董秉奇、杨景衡、袁道等人医学博士的学

位。

在湘雅第五班班史《乙丑级（1925班）史忆旧录》中有一段关于李振翩的记述，录之于后：

“李君振翩，湖南湘乡人。自幼具爱国思想，年十岁，读清史至鸦片之战，投书于地而哭，及入本校，以尽力于各种学生运动之故，功课常落人后。驱张以后，乃折节读书，于是学问精进，造诣甚深。十三年冬，对于红血球之自家凝集，作精深之研究，自造新说以解释其现状，并发明自家凝集素于许多外科病人之血内，其论文将次第发表云……”

李振翩后来终于成为誉满全球的细菌学家和病毒学家。

蜚声医林 造福人类

李振翩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来到了北平协和医学院，与第一班毕业校友汤飞凡博士一起，开始了细菌学与病毒学研究。他还在这里认识了正在协和医学院求学的同乡——湖南岳阳楼下的汤汉志，以后他们产生了爱情。一次圣诞节，李振翩花七角五分钱买了一支钢笔送给他的情人。汤汉志保守着钢笔的秘密，但这一秘密最后还是泄露给了她的朋友们。当时有一位女同学接受了她的男朋友赠送的一千美元，而汤汉志对此却满不在乎，她真心实意地爱着她的“同乡”。一九二八年，汤汉志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院担任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她工作得非常出色。一位英籍导师发现了汤女士的天资，打算送她去外国留学深造，条件是不能结婚。可是汤女士谢绝了这位老师的好意，一九二九年她和李振翩结了婚。为此，汤的导师把她召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另外，选派一位比她低一班的毕业生出了国。同一年，汤汉志随丈夫去了美国。

李振翩立志献身医学，济世救民。一九二九年他来到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从事病毒研究，汤汉志则协助丈夫的

工作。在这里，李振翩和他的导师一道发现了一种研究病毒的新方法，他们试着在鸡蛋里培养一种病毒，然后利用这种病毒制成了种牛痘的疫苗，发明了种牛痘的新方法。一九三〇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Lotta 在纽约出生了。次年，他们带着孩子回到祖国，在北京安了家，汤汉志把母亲从岳州接来一起生活。李振翩到协和医学院担任细菌学副教授。一九三二年他去上海，先任上海医学院细菌学教授，兼公共卫生管理专家。一年以后，任军医学校细菌学教授，后来学校改名为国防医学院，又任血清研究实验室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振翩同其他爱国志士一道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斗争，随国防医学院辗转于南京、广州、桂林、安顺等地，除了担任细菌学教授、血清医疗制造研究所所长外，还几度代理校长。一九三七年他又兼任了中央医学院化验室主任。这时，他已成为这方面的权威，医生们只要见到有李振翩签字的化验单就坚信不疑。

日军侵占上海后，李振翩一家随学校迁到了广州。当时广州城内，居民多已疏散。他们就住在一个官员的公馆里，公馆的房子很大。李振翩的一个在某杂志社担任编辑的侄儿全家，以及刚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的汤汉志的弟弟带着美国妻子，也都住到这里来了。三对夫妇共聚一团，十分亲热，饭后经常自由地谈论古今中外的事情。后来李振翩回忆说：“那可是我们个人生活的黄金时期。”

广州沦陷后，汤汉志的弟弟和他的妻子，去了四川成都，李振翩则跟随军医学院去了广西。此时李夫人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只好暂时去香港居住。不久，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Raymond 在香港出生了。不久军医学院又一次内迁，从广西桂林迁至贵州安顺，汤汉志也带着孩子随丈夫来到安顺，除在军医学院做点教学工作外，还经常给当地同胞治病，被人们誉为“救命医生”。

当时，美国和英国教会的教徒们组织了一支野战卫生救护队，前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经昆明入境前往大本营所在地的重庆途经安顺时，汤汉志热心为他们提供茶水，还把他們请到家中吃饭。他们中有一位年青的英国人因患伤寒留在安顺就医，汤博士为他们精心治疗、护理，死后又安葬了他。后来，死者的母亲从英国拍来了感谢电。

贵州省自一九三四年建立中共党组织以后，连续三次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一九四二年南方局决定派西南联大总支书记、李振翩的堂弟李振穆前往贵州重建党的组织，但必须有个公开的社会职业。李振穆给李振翩写信，表示要去他那里工作。李振翩知道堂弟在西南联大的革命活动和他来贵州的意图，热情地支持了他，安排他在自己所在的血清医疗制造研究所当了一名技佐，并改名为李志浩，以资掩护。一年后，李志浩又改名被派往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继续从事学生运动。

不久，汤汉志的小弟弟 H·Y·Tang 在四川的一次航船事故中死去，留下二十岁的美国妻子和一个一岁的儿子 Carl Tang。后来这位寡妇回到美国去了，他的儿子 Carl 则由李振翩夫妇抚养成人，送他读了大学，当了中学教员（后改做芭蕾舞演员），并给他安排了安度晚年的资产。

李夫人善良贤慧，除了全力赞助丈夫的事业以外，还主动承担了抚育 Carl 和李振翩的另一个侄儿李加农的责任。李加农的母亲在湖南老家去世时，他才三岁，父亲在广东工作，他被寄养在外婆家，外婆去世后，他写信求助叔叔李振翩，并要求给予读书的机会，汤汉志要丈夫及时给侄儿寄去生活费，并送他到南京上学。后来李加农进入南京农校学习，毕业后又留学美国，一九四六年李加农从美国回到南京和叔父母住在一起，汤汉志为他添置衣服，问寒问暖，爱护有加。一九八〇年八月，李加农作为研究科学家自山东出访美国，专程前往探望叔父母，在

去研究所的路上，因车行过急心脏病突发，不幸死去。

抗战胜利后，李振翩一家五口随学校从安顺迁回南京。当时正值国共和谈开始，李振翩对大局十分关心，主张组织第三党派。他写信给马歇尔元帅，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马歇尔认为他的头脑清醒，主意不错。两人从此有了交往。李振翩也成了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的客人，正巧他的堂弟李振穆（已改名李晨）也在中共代表团工作，担任周恩来的秘书，他们兄弟又见面了。未几，国共和谈破裂，马歇尔宣告调停失败。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特务意欲袭击中共代表团，情况十分危急，南方局决定立即将人员疏散。李晨自然又想到了自己的堂兄李振翩，就躲在他家楼上，每天由他们送饭送水。过了两个星期，局势稍有缓和，李晨才回到中共代表团驻地。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周总理接见李振翩夫妇时，李振翩发现总理身后有个熟悉的人影，仔细一看，正是李晨，问道：

“你怎么也在这里？”总理笑着说：“是我专门把他找来，让你们见见面的。”周总理拉着李振翩的手说：“你掩护了我们的同志，我很感谢你！”然后指着李晨说：“你如果没有他，你李晨可能早就牺牲了。我们要感谢你，李晨更要感谢你！”

调停失败后，马歇尔被召回国。他回忆说：“在中国别的事未办成功，但和李振翩博士交上了朋友。”

一九四八年，李振翩到中央大学教授细菌学，他与几位友人组织了“中国科学促进会”，一心仍想用科学教国、建国。而在当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很想做点科学研究工作，可是国内条件却不允许。能不能到国外去试一试呢？他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的女儿李家瑞（Lotta）已于一九四七年赴美国留学，他也就想去美国。事有凑巧，一九四八年底，根据中美文化交流协议，美国国务院邀请李振翩夫妇去美国。他们到美国后，全家住在华盛顿特区。汤汉志去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深造，

李振翩则在纽约国立卫生研究院当研究员。以后，他们加入了美国国籍。

李振翩除了担任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之外，又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从事科学研究，并担任病毒实验室生物学组及生物学标准科负责人，潜心于医学研究，尤其是对沙宾(SABIN)疫苗的研究倾注了颇多的心血。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打听李振翩的去向。后来听说他去了美国，便搭信希望他能回来看看。当时他正在从事脊髓灰白质炎病毒的研究，工作紧张，未能成行。当时在美国，由于这种病毒的侵染，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儿童肢体麻痹，后遗偏瘫，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未能幸免。此病的病源是病毒(ViRus)，共有三型，以第一型最严重，患者也最多。一九五三年，李振翩和他的同事谢夫特合作，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在试管里培养出了C型病毒，并进一步将此病毒从有毒变为无毒，让小兒口服后，产生终身免疫力。人们为了纪念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将这种新发现并经改良的病毒，命名为LSC病毒。在这里，L代表李振翩(LI CHEN—PIEN)，S代表谢夫特(SHAFTER)，C代表C型。此后，亚伯特·沙宾(ALBERT SABIN)将这种病毒制成了疫苗。人们将三型活疫苗制成糖丸，分别染上红、绿、黄三种颜色，供小兒口服，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小兒麻痹症的发生与流行。自从推广应用这种SABIN疫苗后，美国、西欧、日本已没有儿童患小兒麻痹症了。至今，这种疫苗还在国际上通用，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造福了全世界的儿童。在我国，凡用了这种活疫苗糖丸的地区，都控制了小兒麻痹症的发生与流行。

一九六八年，七十岁的李振翩教授退休了。他离开了工作了二十年之久的国立卫生研究院，留下了五十多篇学术论文。他继续探索癌症的病因与治疗，对祖国的传统医药学更有一种

特殊兴趣，整理写出了一些颇有临床价值的介绍中国针灸、针麻和中草药的专著，并将《中国的草药》和《懂得一些癌症》等著述亲自送给国内医学界。他一九七三年第一次回国访问时，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跑遍了广州、北京、沈阳、天津、延安、西安、南京、上海等城市，参观了医院，收集了许多中草药的资料和二三十种中草药标本，表示“要带回去放在我们的实验室内进行研究”。

李振翩教授在国内外德高望重。一九七八年十月，人们纷纷祝贺他的八十寿辰。他的一位同乡知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关节炎、代谢、消化疾病研究所生化药理实验室的华人研究员张耀德教授赠诗与他：“三湘青年血气刚，曾伴蛟龙驱暴张；杏林饮誉五十载，八旬布衣傲君王。”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美京中华医药学会在华盛顿九龙酒家举行春节年会，聚餐联欢，庆祝中美建交，于宴会之后，赠给李教授学术奖章，以表彰他为消灭小儿麻痹症所作出的贡献。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华盛顿地区专门为李教授举行了八十三岁寿辰庆祝宴会，由美中医药中心授予该中心创始人、第一任主席李振翩博士荣誉称号，并为李振翩奖学金筹募基金；还编辑出版了一套科学论文集，由李的朋友和学生分别撰写论文。在宴会上，孙秀弘等三名中国留学生即席赋诗：“德高望重赫乡里，功伟业宏礼寰宇；头角峥嵘真时珍，老当益壮遍球谊。”该诗每句第五字“赫礼真遍”是“贺李振翩”的谐音，表达了人们对这位老教授的尊敬与爱戴。

钟情故土 巧架金桥

一九六八年，年近古稀的李振翩教授离开了纽约国立卫生研究院，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卡尔弗特大街一七一一号，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李振翩有一个幸福、

温暖的家庭。老伴汤汉志自一九五五年开始，一直担任华盛顿圣约翰·伊丽莎白医院的内科医生，并以优质服务受到人们的称赞。他的女儿李家瑞（Iotta），五十年代初大学毕业，是一名细菌学工作者，后来钻研计算机，和丈夫吉氏开设了一家电脑软件制造公司。他的儿子 Raymond，在 Riedmint 航线当技术员。身边还有了四个孙儿、孙女。

李振翩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做了很多工作。他在与朋友们聊天时，认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会有韩战和越南战争呢？他的结论是，看来是由于缺乏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七十年代初，中美两国刚刚突破二十多年的隔绝状态，李振翩就热切的向往祖国。一九七二年十月，中国医学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出席了华盛顿美国医学界的欢迎酒会，代表团成员林巧稚大夫和李振翩的夫人汤汉志大夫见了面。林巧稚和汤汉志是老同学，他们都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林大夫会见李振翩夫妇时，转达了毛泽东主席的问候和邀请他们访华的心愿。

一九七三年七月，李振翩和夫人以及其他几位美国朋友来到了北京。八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亲切地接待了李振翩这位五十多年前的挚友和他的夫人。两位老人回首往事，兴致盎然，谈话持续一个多小时，并合影留念，毛主席问李振翩要不要钱？李说不要。毛主席又问他要别的东西不？李也说不要。他说：“我来不是向你要东西的，而是想劝你同美国友好。”毛主席又问他喜欢吃什么菜？李说喜欢吃冬苋菜、苦瓜等家乡菜。于是毛主席叫王海容将自己菜园里种的苦瓜和冬苋菜等新鲜蔬菜送到了李振翩下榻的北京饭店，请他品尝家乡风味。这种深情厚谊，使他非常感动。此前，周恩来总理于七月二十九日会见了李振翩夫妇。周总理首先对抗战期间李振翩在贵州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一事表示感

谢，并回忆起二十七年前，汤汉志女士与邓颖超同志在南京一次酒会上见面时的情景。

一九七五年六月和一九七八年六月，李振翩夫妇又两次回国参观，分别同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并合影留念。后来，邓小平副总理将签了名的合影照片寄给了李振翩。

李振翩教授最后一次回国，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他不辞辛苦，想为中美友好做点事情。这时毛主席已经去世。他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后，看到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感到十分欣慰。回到美国不久，他写下了一首诗：“生逢天下乱纷纷，奠定乾坤有伟人。喜看故国换新貌，佳音频传慰生平。”

李振翩先后三次回国，每次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大事上：第一是增进中美医学科学的交流。他同国内医学界同仁广泛深入地探讨了最新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医学界的老前辈，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医学知识与经验，把美国和他本人在癌症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传授给了我国医学界，同时又把中国医学研究的成果带回美国，致力于中美两国医药学术的交流 and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他曾表示要努力实践毛主席说过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第二件事是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在他最后一次回国之前的两个月，他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万斯和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等高级官员，同他们讨论了联络处升级为大使馆的问题。他十分关心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他向中国领导人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美国人民绝大多数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同时，他预言一两年内可望解决中美关系的正常化问题。果然，在他这次访问后不到一年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李振翩多年侨居美国，与美国朝野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加上他的研究工作成绩卓著，在美国各阶层，特别在华人中，

有着崇高的威望与巨大的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后，他以全力投入组建华人社团的工作。他协助龙绳文、杨振宁、朱养民、何连玉、傅海澜等组织了美国华人协会，是全美华人协会创始人之一。他被选为第一届华盛顿华人协会分会会长。在此期间，他团结各界华人，鼓励他们为发展科技、教育、文化，造福社会，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关系正常化，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作出贡献。他还和陆卫平、高景泰、郑宗铿、黄子尚等人创办了“美国中国医药中心”（简称美中医药中心），同我国中华医学会密切合作，邀请我国医学界人士赴美讲学，或参加学术讨论，为加强中美两国民间友好往来和医学科技的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李振翩是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和历届大使的好朋友。每逢国家庆典，他都要去大使馆祝贺。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增多，凡我国重要代表团去美国访问，他都出面热情接待并多方协助。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一九八三年吴学谦外长访美和一九八四年赵紫阳总理访美，他都象见到亲人一样的兴奋和激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他在欢迎著名作家丁玲访美的酒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曾多年梦想有中国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周游世界，作学术演讲。现在这种梦想实现了，使我非常愉快。”

李振翩教授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曾给美国总统及国务卿写信，陈述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强调增进中美关系的重要，供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参考，他的这些努力，受到了美国当局的重视。尼克松夫人汉密尔顿·约旦等亲自复函赞赏。一九七五年在北京，李振翩曾进行活动，斡旋于周恩来和布什之间，随后又致函卡特总统，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起了良好作用。当中美关系处于低潮时，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李振翩访

问了布什副总统。并请他转信给里根总统，对此，布什表示赞赏，答应马上转交信件，并向李保证：总统和他本人都希望台湾和北京和解。

与此同时，李振翩写信给邓小平，提出一些对中国外交政策、人口问题和“四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例如对人口问题，他建议用现代优生学方法改善和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就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周总理逝世后，他写了《追悼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的文章。毛主席逝世后，他沉痛地写道：“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处处都表现出他热爱祖国和人民领袖的感情。

一九七九年圣诞节，李振翩作了肠癌切除手术；次年又跌断了大腿骨；夫人汤汉志在这年年底也去世了。这给李振翩很大的刺激，他虽患重病，仍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一九八四年赵紫阳总理访美时，他抱病参加欢迎。同年，我国驻美大使馆举行“十一”国庆招待会。这时他的癌症已到晚期，仍然在女儿李家瑞的陪同下前往使馆祝贺。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晚，癌症夺去了李振翩的生命。终年八十六岁。十九日，赵紫阳总理从北京发去唁电，称赞“李振翩生前热爱故土，十分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为推动中美医学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华盛顿地区举行了有二百余人参加的追悼会，美国副总统布什亲自打电话表示哀悼。

为了纪念这位优秀的科学家、全美华人的杰出代表、炎黄子孙的优秀儿子，美国成立了李振翩基金会，并且在北京、长沙、广州、成都、昆明先后设立了分会。

回忆沙眼病原体发现者

汤飞凡教授

何 链*

汤飞凡是我的丈夫。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十三周年，他不幸过早地离开人世已整整二十八年了。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许多人也都在怀念他。一九八一年五月，春意盎然的法国首都巴黎，生机勃勃，正在这里参加第二十五届国际眼科学大会的各国眼科专家们欢聚一堂，交流学术见解。人们在庆贺医学科学发展的新成就时，并没有忘记先辈们的功绩。在五月十二日的大会上，世界沙眼防治组织把一枚光芒四射的金质沙眼奖章和八千法郎奖金郑重地追授给已经故去二十多年的汤飞凡教授，以表彰他首次发现沙眼病原体，征服了称为“拿破仑盲军之谜”的伟大功绩。这对我这个幸存者说来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就学湘雅致力于探索微生物世界

汤飞凡，又名汤瑞昭，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生在醴陵县(今醴陵市)西乡的汤家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汤麓泉，曾任醴陵县财产保管处处长；叔叔汤汉斌，当过先父何键手下的军需处长；母亲黄氏，是一位家庭妇女，在他上中学时病故，后有继母。飞凡有四兄弟和四姐妹，他排行第三，他的弟

*何键系汤飞凡教授遗孀，何键之女，现居北京市。

弟汤秋凡毕业于武汉文华大学，曾在湖南当过好几个县的县长。

汤飞凡十二岁离开父母来到省城长沙读中学，后考进岳麓山下的甲种工业学校。但是，他不喜欢数学，两年后就弃工学医了。当时，正值湖南育群学会和美国雅礼会在长沙联合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他就去报名应试，被录取为首届学生。第一年汤飞凡就翻破了一本英文字典，以致成了近视眼，暑假回到家里错将哥哥叫成了爸爸，闹出了笑话。虽然，汤家乡下有田产，却不算富裕。读中学时起，汤飞凡就坚持勤工俭学，一边读书，一边为别人教英文或到药房帮工，赚点钱维持自己的生活。七年以后，即一九二一年六月，他和张孝骞、应元岳等十位同学毕业了，获得由美国康州政府批准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

大学期间，汤飞凡对显微镜下的微小生物发生了特殊的兴趣。每当下课后，他总喜欢和细菌老师交谈，向老师提出各种离奇古怪的问题。毕业后，他没有急于找职业谋生，而是慕名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继续深造。他在田百禄(Carl Tenbroeck, 美籍德国人)教授指导下，专门研究细菌。田百禄对培养青年很热心，但是他的那套四年培养计划，却不易为人们所接受。开始，汤飞凡被分配在培养基室，同其他青年医生一道做细菌学的常规工作：洗刷瓶瓶罐罐，制造培养基，了解细菌喜欢吸收什么。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与刻苦钻研的精神，得到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主任田百禄的特别赏识，他很快被提升为助教。

一九二五年，我和汤飞凡结为夫妻。我的父亲何键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时，与他的父亲汤麓泉结为知交。汤飞凡每次从长沙回家，总要到何家大屋来向我父亲请教，如科学课第一课就是我父亲给他补上的。我是家中第二个女儿，父亲见飞凡很聪敏，就将我许配给他，他比我大九岁。我们婚后仅两个月，他就被

送往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深造，从此开始了他的微生物学研究生涯。

在哈佛大学，汤飞凡和余三谔（现任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同在一位美籍德国细菌学家秦思尔（Hans Zinsser）手下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秦思尔是创立抗体一元论的世界闻名的医学家，他要求手下的人要常读有关论文，多多益善，每周举办读书报告会，分析探讨问题。汤飞凡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在一次读书会后，秦思尔教授很幽默地对他说：“当前世界上搞好了读书会工作的人，除了我以外就是你了。”

从第二年开始，他和导师秦思尔合作写成的论文《疱疹病毒的免疫学研究和疱疹性脑炎问题》、《对超滤的研究》、《从家兔脑炎病毒培养细菌的尝试》、《疱疹性脑炎和牛痘病毒的滤过记录》、《对狂犬病病毒和疱疹病毒的补体结合反应》、《对疱疹致病因子的进一步实验》等，先后在美国《实验医学》等杂志上发表，引起了同行们的重视。一九二九年学习结业时，秦思尔教授希望他留在哈佛任教，尽管他很敬重自己的导师，但他更加怀念自己的祖国与父母，还有我这位新婚惜别的妻子，他谢绝了导师的执意挽留，回到了上海。此后，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其时，原湘雅医学院老校长颜福庆教授正在上海主持中央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科大学的前身），他被老校长聘请担任了细菌学副教授，不久升为教授。一九三二年以后，他除了继续在上海医学院执教外，又受聘担任英国人办的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细菌系主任。一九三六年，我陪他前往英国国家医学研究院访问，兼作短期研究工作。在英国，我们住在离实验室五里远的地方，他总是要工作到深夜，然后步行回家。业余时间，他喜爱打网球，也间常拉拉提琴。

回国前的这段时间，是他研究工作的黄金时期，他以全

部的精力投入了对支原体和病毒的基础理论研究。如采用了离心和吸附的方法研究病毒；在英国，他和Elford一起发展用超滤膜法来测定病毒的大小，即所谓“分级滤膜”法。汤飞凡单独或者与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合作，还完成了许多重要著述。他也是最早研究原体的学者。由于他的学术成就举世瞩目，被选为第八届微生物学学会的常务理事。

在抗日战争中与人民共苦乐

正当汤飞凡在科学征途上大踏步前进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对此，汤飞凡激愤不已。淞沪战争爆发后，他再也不能安于学究式的生活了。当时我和汤飞凡身居租界，工作生活尚且“安定”，可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得更多的是祖国的荣辱、人民的安危。他多次对我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我是学医的，应该到后方去为抗日出力。”于是他毅然离开了实验室，投身于红十字会救护队的行列。末儿，我们离开了上海，前往内地参加抗日战争。

不久，汤飞凡受卫生署署长颜福庆派遣，前往昆明重建被日军占领的北平中央防疫处。当时的条件极端艰苦，几乎一无所有，全要从头做起，为此，他四处奔忙，终于在西山角下的昆明湖畔的荒滩上草草成立了“中央防疫处”。当时没有自来水，汤飞凡设法使一台需要天天检修的锅炉继续工作，解决了所有器皿的消毒以及蒸馏水的供应。他还建立了马厩等实验动物基地，不久就拥有了一个细菌培养、分装、检定系统；创办了自己的玻璃工厂，制造各种实验所需的中性玻璃器皿；一只破木船放在湖中用作透析——这就是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他们就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就从猪胃中提取。汤飞凡和他的同事们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终于制出了大批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与血清，不但满足了大西南防疫工作

的需要，支援了在远东作战的英美盟军，而且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支援了陕北解放区。

设备简陋的防疫处，成了汤飞凡教授的科研所。他带领大家结合生产开展了多项科学研究。如回收废琼脂，用乙醚处理牛痘苗杂菌，改良马丁氏白喉毒素培养基等等。经他改进的微生物学方法一直沿用到六十年代。

自一九二八年英国细菌学家复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很快在临床上显示出神奇疗效。一九四三年，汤飞凡开始研制青霉素。当时既没有现成经验，又缺少资料可供借鉴，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可汤飞凡毫不退缩，他带领朱既明、樊广生等人反复搜索，终于在当年就用自己分离的中国菌种，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批五万单位一瓶的青霉素制剂，第二年就投入了临床使用，为我国的抗菌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后来回到北平，他们在中央防疫处专设了抗菌素室，进口了一套小型的青霉素制造设备，开始生产青霉素。这便是我国最早的抗菌素生产研究设施，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后来又从这个研究所分出一部分骨干到上海，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菌素生产研究基地——上海第三制药厂。

在昆明湖畔工作的那段日子里，汤飞凡十分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他总是要求青年掌握好科学技术，要求他们多读书。无论当时经费多么紧张，他都要想方设法订购一些图书杂志，定期举办文献报告会，让大家轮流报告自己的读书体会和心得，对国外最新科研动向进行分析。此外他作为负责人，在生活上体贴关怀职工，设法为职工建造住房，尽管简陋，但尚适用。生活艰苦，他和我一起种菜、喂猪、养鸡；休假日和大家共同植树、种花、修路、建球场，为大家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当时西山没有学校，我们自己办起了子弟学校，没有医院，就自办了“医疗室”，他和几个学医出身的同事轮流为

大家看病、接生；经费不足请不起汽车司机，他就自己开车运送物资。在汤飞凡教授的领导下，职工们都能安居乐业，把防疫处当成了自己的家。这个“家”，不仅是制造疫苗、血清的工厂，亦是当时我国绝无仅有的微生物、免疫学研究机构，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汤飞凡来到北平，开展了重建中央防疫处的工作，地址就在天坛，在这里赶制出了各种疫苗分送到各地去。当时，老解放区石家庄一带流行天花，疫情严重，马海德、沈其震等找到汤飞凡求取援助。汤飞凡二话没说，立即组织人力昼夜奋战，赶制出了十万人份疫苗，满足了急需。

在多年的实验研究中，汤飞凡教授深知动物实验对于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的重要性。一九四四年，他从国外引进了纯种瑞士小白鼠。在更换鼠种过程中，他把纯种小白鼠养在自己家里，避免了混杂。后来，在北平西部，他亲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实验动物场。在这里，他亲自参加选育动物，开展科学饲养管理及动物健康与疾病的观察研究，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实验动物饲养的专业人才。

相信共产党 为新中国服务

新中国诞生前夕，国民党政府要员都在各谋自己的归宿之途。而我们却处在进退两难、举棋不定的境地。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份，他的老师、前湘雅医学院教务长、美国医师胡美先生向他发出了邀请，要他偕夫人赴美工作，并许以优厚待遇。当时社会上的谣传很多，说什么共产党只要年轻人，不要年老的。也因为我父亲的社会关系，许多人都劝我们走，并且买好了两张飞机票。那几天，他坐卧不安，十分烦躁，脾气也挺大。上飞机之前，他不断摆弄着手头的飞机票，沉思中浮出

一脸苦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去为外国人做事，我精神上不愉快。”他还告诉我：“我是炎黄子孙，总不愿背离自己的祖国，我相信共产党会收留我们工作的，我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听了他的肺腑之言，我说：“那好，我们不走了。”我们作出了最后决断，飞机票被撕成了纸屑。

解放前夕，汤飞凡离开北平去广州分处工作时，北平和平解放了，他只好到上海住下来。不几天，他就接到北京来电，请他赴京继续担任中央防疫处负责人。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京沪铁路尚未修复，我们仍住在上海。当时上海生物制品所的魏锡华大夫从丹麦带回卡介苗疫苗，我就将家用电冰箱借给他们作实验，保存苗种。直到七月份，京沪路通车了，我们才去了北京。他回到天坛中央防疫处一看，一切都原封未动，十分感动。后来，中央防疫处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担任所长。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科学事业的高度关怀与重视，鼓舞着汤飞凡继续为科学献身。例如，刚解放时，在我国一些地方流行着许多烈性传染病，严重残害着人民的生命。汤飞凡急人民之所急，带领同事们争分抢秒赶制各种疫苗和血清，参与紧急防治工作。一九五〇年，他用自己改进的方法生产大量优质疫苗，供应空前规模的普种牛痘运动的需要，至一九六〇年在我国已基本上消灭了天花。一九五〇年察北地区鼠疫大流行时，他带领一个突击小组在两个月内制造出了我国自己生产的鼠疫减毒活疫苗，为迅速消灭鼠疫提供了有力武器。为粉碎帝国主义细菌战，他带领正在所里进修的易有年奋力钻研，解决了病毒毒力变异等疑难，他还从自己一九四七年带回国的毒种D₁₇中分离出了疫苗毒种，制成了我国自己的黄热病减毒活疫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许多年来，汤飞凡曾经渴望建立起国家生物制品质量监督

机构和统一的质量标准,建国前也曾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但都被置若罔闻,弃之脑后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并正式委托他进行筹备。他在朱既明等人的积极协助下,正式建立了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即现今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进而又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程》,一度由汤飞凡教授兼任所长。至此,中国才有了对生物制品质量的国家级监督。

汤飞凡教授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信赖与支持。他先后兼任的职务还有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等,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解开拿破仑盲军之谜

一九五四年,汤飞凡教授担任指挥设计,在北京三间房扩建了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这期间他的社会活动已相当繁忙,但并没有停止在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当社会上的烈性传染病得到基本控制以后,他及时将防疫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对常见多发病的防治。他又开始了对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

汤飞凡教授清楚地了解:几千年来,沙眼病在全世界广泛流行,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健康。一八〇一年,拿破仑在滑铁卢一战失利,他那支号称无敌的“铁十字军”,撤离埃及,逃回巴黎,妄图东山再起。可是,没料到成群的士兵被染上了一种眼病:开始发红流泪,继则睫毛倒长,至眼角膜被磨破,眼球上蒙上了一层白翳,最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当时谁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病。拿破仑在一气之下,杀掉了军营中所有的医官。这样,“拿破仑盲军之谜”在血腥的屠刀下不脛而走。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没有沙眼病患者的国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有六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患有沙眼。在特效药物问世

之前，发病率高的地区人口中因患沙眼而引起失明者超过了百分之一，视力受到严重损害者超过百分之十。在我国的统计资料中，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有百分之五十为沙眼病患者，上海市则高达百分之七十。近百余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求对沙眼的防治办法，但一直都因病因问题未得到解决，以至进展缓慢。在学术界，科学家们围绕沙眼病原问题，一直在争论不休。

早在上个世纪末，微生物学创始人之一的寇霍（Robert Koch）分离出了Koch—Weeks杆菌，他以为这是沙眼的致病菌。这就是最早提出的沙眼“细菌病原说”。但被随后的研究结果所推翻。一九〇七年，捷克学者Halberstaedter和V.Prowacek在沙眼病灶的细胞中发现了“包含体”，认为可能是病毒，但也未定论。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Nicolle证明，沙眼材料经过砂棒过滤除去细菌后仍有感染性，故认为沙眼是比细菌还小的病毒引起的，从而首次提出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说”，但也未能最后证实。一九二八年，一个叫野口的日本学者从沙眼中分离出一种细菌，他便认定是沙眼的致病菌，称之为沙眼杆菌（*B.granulosis*），再次提出了沙眼的“细菌病原说”，招致了广泛注意。此间，汤飞凡和周诚泮也正在研究沙眼。汤飞凡教授依据自己的观察，断定沙眼的病原不会是一般的细菌，而可能是近似立克次体的大病毒。可是，既然有野口的新论断，就必须对此做出科学的证明。一九三〇年，他严格按照野口的方法分离出了一株所谓“沙眼杆菌”，却证明了它并不致病。一九三三年，他又将野口保存在美国的“沙眼杆菌”直接接种在自己的眼里，结果也不引起沙眼。从而否定了野口氏的沙眼“细菌病原说”。

汤飞凡教授渴望自己能尽早解开这个谜。一九三四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给人类的危害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来看，沙眼在全世界特别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我们

今天离开解决这一问题和Koch时代一样的遥远。”他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但渴望急切去解开这个沙眼病原之谜。然而，历史却迫使他不得不中断这一研究，一直到了二十年之后的一九五四年，才开始重新寻找沙眼病原体。当时国外也有许多实验室都在争相分离沙眼病原体，但都未能成功。汤飞凡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发现：沙眼“病毒”能在猴子的眼结膜上接种，却不能将病毒单独分离出来。他们先后在八只猴子和二千五百只小鼠眼中分离沙眼病毒，都失败了。一九五五年，他带领助手黄元桐等，根据自己的科学判断，采用立克次体实验技术，又经受了几百次失败，终于用鸡胚卵黄囊接种和链霉素抑菌法，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师张晓楼提供的临床材料中，成功地分离出了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

分离沙眼病毒获得了成功。有人劝汤飞凡赶快发表论文，但他没有同意。在这方面他显得颇为固执，坚持要严格遵循Koch定律的三点要求，继续实验下去以求得最后结论：（一）要能从宿主中分离出病原体；（二）把这个病原体接种给另一宿主能引起典型病症；（三）要能从另一宿主把病原体再分离出来。他要求用分离出来的沙眼病毒开始对人体感染阶段的实验，卫生部同意了他的意见，但不同意用他自己的眼睛做。一封封志愿书似雪片飞进了所长办公室。可汤飞凡早已有了自己的安排，他将一封封申请书都退了回去。一九五六年元旦，汤飞凡独自一人“偷偷”地将沙眼病毒试液滴进了自己的眼睛。结果，几天后典型症状与病变出现了。随后他立即又从病眼中将这个病原体分离出来。为了严密地观察疾病的全过程，他红肿着眼睛一直工作了四十多天，直到确凿无疑地证实了他所分离培养的沙眼病毒的致病性，完全彻底地解决了这个曾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关于沙眼病原问题的争论，才肯接受了医生的治疗。

一九五六年，汤飞凡分离沙眼病毒成功的报告震撼了全世界。向他表示祝贺的电报、信函从世界各地飞来，还有的要求索取论文和毒种。英国病毒学家Collier首先得到了毒种TE55，并在伦敦Lister研究院证实了汤教授的成果。沙眼病毒的发现得到了全世界医学微生物学界的承认，并被誉为“汤氏病毒”（Tang's SVirus）。

在随后不长的时间内，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许多科学家相继采用汤飞凡教授的实验方法，分离出了许多株沙眼病毒，从而连续开展了大量新的研究项目，很快形成了一个沙眼病原研究热潮，也推动了对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病原的研究，最终导致了微生物分类学上的一次重要发展，即确定了沙眼与鹦鹉热、鼠蹊淋巴肉芽肿的病原体同属介乎细菌与病毒之间一类新的微生物，定名为衣原体。因此，在微生物分类学中又新增了一个衣原体目，沙眼病原体则被命名为沙眼衣原体（*Chlamydia trachomatis*）。

由于有了病原体可供试验，很快就证明了采取许多简单的办法如日晒、干燥、热水烫等均能有效地消灭沙眼衣原体；并且在较短时间内筛出了一系列特效治疗药物，从而使防治沙眼病的工作取得了进展。今天我们就很难见到因沙眼病而导致失明的患者了。

沙眼病原体找到以后，汤教授没有停止前进，而是进一步探索采用疫苗预防沙眼的可能性。但要制造沙眼疫苗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他又开展了对小儿麻痹症和麻疹的研究。因为当时这两个病毒已严重威胁着广大儿童的健康。小儿麻痹症发病率已超过了十万分之三十，死亡率达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麻疹的流行就更广了，几乎每一个儿童都难以幸免。每到流行季节，小儿科病房连走道上都挤满了麻疹病孩，全国有数以万计的因麻疹合并肺炎而死去。

一九五四年Emders发表了用组织培养分离麻疹病毒获得成功的报告,给了汤飞凡教授以新的启发。随即他带领闻仲权等人在对小儿麻痹病毒的研究中,很快建立了人胚和猴肾细胞的组织培养,一九五五年分离培养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并着手对死疫苗的研制,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但在这一工作中,汤飞凡教授起步晚了几年。比汤飞凡低四个班的湘雅老同学、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的李振翩教授,已于一九五三年与他的同事谢夫特,在试管里研究培养出了小儿麻痹Ⅰ型病毒,并将有毒变为无毒,给小儿口服,产生了终生免疫,从此不再患小儿麻痹症了。人们将这种病毒命名为Lsc病毒。随后,亚伯特·沙宾(Albert Sabin)将这种病毒制成了预防小儿的麻痹疫苗,称之为Sabin疫苗。一九五九年,我国引进了Sabin疫苗毒种,并很快开展了活疫苗的研制,一次试验成功。一九六〇年我国就有了自己的小儿麻痹活疫苗。

一九五七年,汤教授还指导吴绍元等开展对麻疹病毒的研究,一九五八年,已采用人胚和猴肾组织培养分离了我国第一株麻疹病毒Ma。

人类的朋友和优秀的科学公仆

现在,麻疹已不再构成对孩子们的巨大威胁了,因为注射了麻疹疫苗后能预防麻疹的发生。在我国,凡按要求服用了Sabin疫苗糖丸的地区,也再没有见到新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发生了,同样,因为沙眼而引起的致盲的发生率也已大大减少。如今人们有了征服病毒的活疫苗,有了制服沙眼衣原体的特效药。只可惜这种成功后的场景,汤飞凡没能亲眼目睹。他完全应该分享这胜利后的喜悦。然而,就在一九五八年九月的最后一天,这位刚过花甲之年的老教授就含恨离开了人世。

正是当他刚发表沙眼人体感染和麻疹病毒分离两篇论文的

这年，他突然遭到了无中生有的指控。九月下旬他被忽然叫去写检讨，然后就是斗争会。当接受第二次斗争回来时，只见他脸色发白，饭也不想吃，原来有人说他是“国际间谍”。他告诉我：“没想到我为科学工作了一辈子，会落到这种下场。”他害怕会送他进监狱。他难以忍受这种无端的迫害，便含恨离开了人世，抛却了他的全部事业。临死前，他留下遗嘱，大意是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但没有出卖祖国的思想和行动；还说对不起我，叫他的姐妹多多照顾我，叫孩子们多多念书，要争取入团入党；还有他借谢少文教授的一册书共八本，放在桌子上，叫我归还给谢。他还叮嘱他的学生和助手，要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事业。

凡熟悉汤飞凡的人，无不对他的去逝深表痛惋。著名的英国学者、科学史权威、《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在得知汤飞凡博士逝世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称赞汤飞凡是“他的国家的优秀科学公仆”（A splendid scientific servent of his country），赞誉他是英国十八世纪谚语里所说的“人类的朋友”（A friend of man），他“热爱中国人民”，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名顽强的战士”。在这位英国学者眼里，汤飞凡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人民。难怪在他逝世二十二周年之后，人们还在寻找他的足迹。在抗日战争中曾经同中国人民共过患难的李约瑟博士很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他说：“我相信，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是的，在中国，在世界，汤飞凡都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一九八〇年六月，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致函我国眼科学会，决定在第二十五届国际眼科学大会上给汤飞凡颁发金质沙眼奖章；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国科学院追授他的沙眼病毒研究以二等科技成果奖。这一切不光是我们全家的光荣，也是祖国的光荣。

（刘笑春 整理）

我的几段经历

卢惠霖*

从传教士家庭起步到洞庭湖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从此中国的门户被打开，天主教、基督教传入我国。英国伦敦基督教会，居然把手伸向湖北省天门县，并在汉水河边我的故乡岳家口建立了传教点，将一位靠种菜和在果店当雇员维持生计的卢道宏——我的父亲，发展培养成为一名笃信基督教的传教士。

我是在鸦片战争结束五十八年后，即一九〇〇年九月三日出生在这样一个富有宗教色彩的家庭。一来到人世间，便接受宗教的洗礼，从小就信奉上帝，崇拜神明，还在年幼时就跟随着父母去教堂做礼拜、唱圣歌，模模糊糊地理解圣诞节的含义，逐渐培养起对宗教的兴趣。到了学龄期，便进入了教会主办的学校，免费读书。在我初懂人事的时候，真以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是上帝在六千年前，只花了六天的功夫变出来的；人世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好了的。总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充满着对上帝的虔诚和神奇幻想。

我的父亲担任传教士以后，家庭生活也处于动荡之中，父亲在哪里传教，家就安在哪里。儿童时代，我读过私塾。一九一一年，我进入本县皂市道生小学，在那里读了四年小学。到一九一五年，我十五岁的时候，便进入汉口博学书院文学馆，

*卢惠霖系著名的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现任湖南医学院教授、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相当现在的初中。我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一些理化知识，并对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爱听故事和看小说，特别为《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所吸引。在汉口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家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李春生写的一本书，书的主要内容主要是驳斥达尔文的“进化论”。从那时起，我已经开始懂得一点科学道理，我认为不论教士们抱着怎样的宗教目的，摇唇鼓舌地批判“进化论”，但科学的规律是不能违反的。我终于看到了生物进化论的科学闪光，从而对上帝的信仰发生动摇，开始相信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这一真理，仿佛看到了一些脊椎动物，都有自己远古的祖先这一事实。于是，上帝的偶像一下子在我心中被击碎，生命科学以特殊的新鲜的魅力，占据了我的心。从此，我开始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生命科学有了兴趣，脑子里不再装着上帝，而是崇尚大自然。我常常利用课余和假日，去了解大自然，留心观察各种生物的特征和变化，采集一些野生动、植物的标本，以丰富自己的课外生活，充实自己的生物知识。这就奠定了我一生热爱生物学的思想基础。于是我立志要在生命科学的领域做出成绩。

在第二学年末，我们全班同学因受到该校学监不公正的待遇，集体出走，事虽未成，但我和另一同学却被视为祸首，我们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于是我就回到母校——道生小学教自然和数学。这一年，我尽量采用现场实物教学（特别在植物部分）。尽管一点微薄的薪水仅可养活自己，但我坚持工作，对生物增添了不少感性认识。

一九一八年初，我回到湖南岳阳城陵矶家中。当时家父作为传教士，已调到这里工作。这时，我已十八岁了。秋天，因大哥在湖滨大学工作，他介绍我进入美国教会举办的湖滨太学学习。这个大学分中学部和大学部。我在这里读完二年中学，随后进入大学部（其中还停学一年，在中学部教生物学），并担任

毕业，取得文学士的学位。在大学期间，我对生物学课程兴趣更加浓厚，特别是对做实验格外感到高兴。记得我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变幻莫测、游来游去的微生物和动植物的细胞结构时，真感到是个神奇的大千世界。此时，虽然我还没有在感情上同宗教决裂，然而科学的视野已经打开，我不仅感到在宗教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物世界的实体存在，而且觉得在生物世界里也是忙忙碌碌的在紧张地运动着，推及到人类社会当可想见。这样，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开始引起我的注意和思索。为了加深理解，我从一位美国教授那里借来了一本夏普著的《细胞学》，逐段逐句地阅读，还做一些笔记，终于领悟到生命的奥秘原来潜藏在细胞之中。从此，我和学友魏曦时常在一块谈论关于生命的奥秘所在，渴望将来能在真理的大海边拾到一、两只贝壳，或者在生命的常青之树上，采摘一、两片绿叶，那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就在中学至大学阶段，由于我对生命科学和进化论的浓烈兴趣，同大自然结下了难解之缘。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我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革命。我的思想也受到影响，变得更加活跃起来，精神也更加振奋，求知的欲望更加强烈，对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样样都感觉新鲜。这些方面的著作读得多了，我就逐步从宗教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认识到祖国的现实，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志青年，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启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而自己也应该去为人民谋福利，于是我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活动和岳阳学联的活动。起先，我想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深造，毕业后当一名医生，在为病人治病的同时，磨炼自己的意志，并结合生命科学进行研究。我的好友魏曦先我一步进了湘雅医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当我在湖滨大学毕业时，学校决定派我和另一名同学到美国进修，并且说明美国有细胞学等专科可以选修。于是我就到美国去了。

在大西洋彼岸留学和归来以后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从上海黄埔港搭海轮去美国，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无边无际，我好奇地站在甲板上，任凭海风吹拂着自己的头发和衣襟，我对祖国的依恋之情顿时溶进了大海和蓝天之中。

船一靠岸，我和同学郭发潜一同进入美国的领地，直接插入俄亥俄州海得堡大学四年级补学有机化学、地质学和胚胎学等，一年之后在这里取得了科学学士学位。一九二六年暑期，又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岛兹和尔海洋生物研究所学习胚胎学，当时同班的有闻亦传（以后在协和任教）和武兆友（以后任职于北京师大）。同年秋天，我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动物学系，进修细胞、遗传学。在这里我遇见了世界著名的实验胚胎学家、细胞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教授和著名的细胞学家与实验胚胎学家威尔逊教授，他们在这个研究领域有相当的权威。于是我选择了摩尔根讲授的遗传学与实验胚胎学以及威尔逊讲授的细胞学与无脊椎动物学，这都是我最感兴趣的课目，所以我特别用心听课和做实验，阅读有关资料，以加深对遗传学、细胞学和胚胎发生的理解。这为我以后从事细胞遗传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我国接受摩尔根、威尔逊教育最早的是陈桢博士，以后有李汝祺，他是我去美的这一年暑天离美的；还有陈子英也在我之前，他于一九八一年回国。这几位同学学成回国以后，对于我国细胞学、胚胎学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

留学期间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有一天，威尔逊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同我亲切交谈，并鼓励我说：“你还是不错的，上期细胞学年终考试，只有三个人是九十分以上，你是其中之一。”他曾不惮其烦地帮助我从浩繁的文献中找出我所需要的材料。摩尔根教授在一些实验胚胎学文献讨论课后，也曾个别

对我说过：“奇怪！你的答题中难题都答得好，有个非常容易的题目，倒反而没答出来！”摩尔根所指的未答出的题目是“几种作物和家畜家禽的野生祖先及其所在地区”。我解释说：

“有些东西我平时没有注意，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那些我认为最难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两位教授的关心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满腔爱国热情，觉得祖国最需要新科学、新技术，在这里能把祖国最需要的东西学到手，回国去建立起自己的遗传科学体系，是我最大愿望，也是我努力学习的动力。

一九二七年夏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一九二八年夏，完成了博士学位的课程，获得了博士应考人的资格，只待完成博士论文和答辩。这年暑期，由于系主任威尔逊教授的赏识和推荐，我获得了生物学系给予的奖学金，到冷泉港海洋生物研究所开展独立的实验研究。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通过研究，我首先发现在低等植物蕨类孢子母细胞中出现亲核小体——一种相当于哥尔基的细胞器。细胞学教授知道之后，高兴地祝贺我的首次发现，并敦促我写出论文马上发表。随即又介绍我去纽约纪念医院研究部，开展X线对植物根尖细胞生物效应的研究。由于持续的学习和研究，精神过于紧张，身体十分劳累，研究论文尚未完成，我的肺结核就复发了，不能继续进行研究，经学校介绍，于这年秋天，住进了纽约特鲁多疗养院。这是一所私立疗养院，设备条件比较好，我去就整整住了十个月。当时，对结核病尚无什么特效药，恢复很慢，我只好整天躺着休息，依靠休养治疗，希望能在病愈之后，再从事研究。人在病中，思乡之情与日俱增，无法抑制，也由于家父和兄长先后离开人世，遗下老母和嫂嫂带着四个孩子，他们催促我早日归国，所以，一旦病情减轻，便归心似箭。一九二九年深秋，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原想在上海停留数日，一到上海，天津南开大学就聘我去该校担任生物

学副教授，随后又接到武昌华中大学的聘书。我因旅途劳顿，肺结核病虽已基本康复，但还需要长期休息，便婉拒了他们的聘请，回到岳阳湖滨母校，同家人团聚，边休息边教课，准备次年参加华中大学生物系工作。这时“湖滨”大学部已与湘鄂两省几个教会大学合并，成立了华中大学，只保留了中学部，改名岳阳湖滨高级农业学校。第二年我与杜先德女士结婚。一九三〇年夏，因肺出血又先后在汉口协和医院和庐山牯岭肺病疗养院休养一年。次年秋重返湖滨母校，担任生物学和化学的教学工作，同时自学古体诗词，注意锻炼身体。

一九三五年秋天，岳麓山枫叶正红的时候，我来到长沙，在美国耶鲁大学部份师生主办的雅礼中学担任生物学和化学教员，兼任自然科学部主任，又兼任湘雅医学院副教授，教授比较解剖学课程，还担任了许多课外科学实验活动的指导。由于生活相应地稳定，身体逐渐好转。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人民被推向苦难的深渊。一九三八年秋，我全家随同雅礼中学迁移到湘西沅陵。这时，我无端地爱好起天文学来了，在学生中组织了天文观察小组，每当夜深入静，带着一些学生举起望远镜，遥对星空，观测天象。也是从这时候起，一家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有时连吃饭和住宿都成问题。家母因经不起逃难的折腾，离开了人世。妻子由于子女多，操劳过度和经受不起敌机空袭的刺激，患了精神失常症。为了便于就医，一九四三年我应湘雅医学院之聘，到了贵阳。不久又辗转到重庆，直到抗战胜利才返回长沙。在湘雅时期，先后任寄生虫学和生物学教研室教授、主任，担任生物学、寄生虫学、胚胎学、遗传学等几门课程的教学。整个国难时期，我那科学救国的理想，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幻想。我曾想把摩尔根教授的《基因论》介绍给祖国，然而在那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连生活都朝不保夕，要实现这一愿望，谈

何容易！

在生物学王国里遨游探索

战争耽误了我宝贵的年华，但探索生命科学的愿望仍时时萦怀。我想到自己已到了中年，总应在学术上为祖国做点什么，于是在教学之余，开始了《基因论》的翻译工作，经过反复推敲，终于完成书稿。

湖南和平解放后，我获得了新生。我曾同湘雅医学院的师生员工一道，举着彩色小旗，迎接解放军入城。一九五〇年政府发出了“抗美援朝”的号召，我把自己的长女送上了朝鲜前线。

随后，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湘雅。广大师生员工扬眉吐气。我也在接管中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思想觉悟有了提高，除了积极主持生物学教研室的工作，参加教学改革之外，还先后主编或参加编写本院的《生物学讲义》，中南区医学院校的《生物学》教材，全国统一教材《普通生物学》和本院《人体胚胎学讲义》等。我翻译的《基因论》，也在一九五九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学术界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摩尔根学说受到攻击，我国细胞遗传学的发展受到阻碍，我也因为讲授摩尔根遗传学说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曾先后两次受到批判。国际上生物学界两大尖锐对立学派的争论，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那时，在苏联以李森科一批人为代表，以学阀架势，打着“拥护米丘林学说”的旗号，硬给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扣上“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反动的”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横加挞伐。这种反科学的作法，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在苏联造成了灾难。这股思潮后来影响到我国，也给学术界带来灾难，我因此受到株连。但我相信科学，并努力

通过科学实践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观点。

首先，我采用米丘林学派的“无性杂交”来检验“后天获得性”，以回答是否系遗传以及如何遗传的问题。又采用不同品种的鸡蛋，抽取其蛋白，注入待孵化的特种鸡蛋中，实验结果，除有一只雏鸡的躯部出现一块杂色羽毛外，其它雏鸡的毛都与原产蛋的鸡无异。由于当时很难得到纯种鸡，以致无法证实杂色羽毛的来源。

当我正满怀信心设计一种新的实验方案时，阶级斗争扩大化又渗透到了自然科学领域，湖南医学院也上演了批判摩尔根学派的闹剧。在一九六〇年开展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我作为留美的而且是摩尔根学说在湖南的代表人物，又抗拒所谓批判，自然成为被批判的重点。在数百名学生面前硬逼着我认识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好心人劝我识时务一点，说：“现在学术问题总要同政治挂勾，你就认错吧！”当时我想，从所有的资料看，摩尔根的遗传理论并不带有政治性，米丘林学说也不象现在所说的那样，而是被李森科等所篡改，涂上了政治色彩的。现在拿不出任何东西能证明摩尔根的学说是错误的。因此，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股批判风终于被中共中央发觉，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央文教调查小组来湖南医学院进行深入调查，并听取了我的申述，他们还参加了基础课部的辩论会，明确表态支持我的观点，并严肃指出这场“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是严重违背党的“双百”方针的，应该立即停止。未隔多久，毛泽东同志接见了上海复旦大学遗传学家谭家桢教授，鼓励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真理。这一来，我的腰杆子也就硬起来了。

一九六二年，中宣部与卫生部又联合来我院调查，对我进行甄别平反。风停雨住。在党的“双百”方针鼓舞下，我又着手组建医学遗传学研究室。省科委和学院领导支持我的设想，并

为我配备了助手。我们进行了茄科品种之间的嫁接和茄科与莨菪陀罗的嫁接实验，以检验李森科和摩尔根两大对立学派学说的科学性。当时，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肯定了李森科的获得性理论。我们做了四年连续嫁接和对照实验，结果证明接穗能通过直接运输，把其特有的生物碱输送给砧木的新一代胚胎，但却不能遗传给由种子生长而成的植株，事实否定了获得性遗传理论，所谓后天获得性遗传是不存在的。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进行医学遗传学研究的信心。我先从培养人材入手，为研究组青年教师开设了细胞学和遗传学两门课，不仅讲授经典遗传学的孟德尔豌豆杂交实验、摩尔根细胞遗传学理论，同时对现代分子遗传学与细胞、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进行了系统的讲授。在实验室里，从磨刀到石蜡切片，从果蝇的杂交试验到其唾液腺染色体的观察等，都进行了初步的技术训练。

一九六三年，在医学院科研处的支持下，我们又组建了遗传性疾病研究组，由担任基础课与临床课的教师联合组成，以进行群体遗传学调查开始工作，对长沙市部分中、小学的10,900名青少年进行色盲发病率普查，发现其中男性患者达百分之七点五，女性患者达百分之零点九二。通过对这些患者特别是对四十八名女性患者所进行的家系调查发现，每一位色盲女孩的父母均为色盲患者，完全符合摩尔根所发现的性连续遗传规律。正反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无不证明摩尔根遗传理论的科学价值。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之后，我们拟定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十年研究规划，包括建立细胞遗传学研究室，准备大踏步进前。

在科学的严冬中经受熬煎

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准备全面开展医学遗传学的研究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它给文化、科学界带来

了巨大的灾难。没多久，“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又重新飞到了我的头上。传讯、抄家、批斗随时都可能发生，我预感到运动来势迅猛异常，也估计到会比早几年的“学术思想批判”还要深入，考虑到老伴有病在身，将会经不起强烈的刺激，连忙将她送往女儿家去，我独自一人在家等待将发生的一切，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承担着全部惶恐和迫害。冲击开始了。首先是住房缩小了，两户人家住一个套间。随后是同“走资派”一道接受群众的批斗，一斗就是几个小时。我作为“臭老九”和“反动学术权威”，对挨斗挨批也渐渐习惯了，只是耽误了搞科研的时间，甚是可惜。后来，我要求下去搞医疗队，终于被批准去到岳阳搞血吸虫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这段时间，我活动在洞庭湖区，由于生活的艰苦和过分的劳累，患了十二指肠溃疡病，肠大出血，这才又回到医学院。不幸中的大幸是我的五个子女，均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中有三个大学毕业，先后参加了工作。

一九七一年回到医学院，我幸运地恢复了教研室主任一职，受命主编《生物学讲义》和《遗传学》两书，重新登上讲坛授课。随后，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后，科学界又出现一线生机。湖医闻风而动，在老院长李亭植的支持下，决定把遗传学研究工作与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在较短的时间内，我们先后学会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染色体技术，特别是七十年代初的显带新技术。根据染色体带形的特点，我们准确地识别了每一条染色体及各个区段，确定了各种染色体各种形式的畸变与有关遗传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李院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建立了医学遗传学研究室。我把个人委屈抛诸脑后，也不顾自己年迈体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术专长，一方面帮助中青年科技人员，制定研究计划并付诸实施，另一方面，根据摩尔

根的细胞遗传学理论，充分利用湖南科技情报站的外国文献资料，用我们拥有的仪器、药剂，精选七十年代初期国外染色体显带先进技术，领导室内中年教师进行实验。由于他们的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终于获得了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初步揭示了染色体与人体健康的奥秘。

然而，在那人妖颠倒的动乱年代里，我重返科研岗位后，也不时地遭到政治风浪的袭击。特别是一九七四年的“反复辟回潮”和一九七六年的“拆庙赶和尚”，有人鼓吹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越老越臭”，并散布“卢老头没啥用场了”的言论，逼我退休。当时确有不少教授被迫退休。我想我呆在此地也无能为力，但相信自己还可以继续为党为人民作些有益的工作，于是打算请假离开医学院先去梅县女儿家，再去北京另一女儿家，利用北京丰富的图书资料，写些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后来由于唐山发生大地震，去北京的计划未能实现。“四人帮”垮台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恢复正常，我回到了长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科学带来了春天将要到来的信息。我们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染色体技术经验交流会，肯定并推广了显带技术，成立了显带染色体识别标准三人小组（卢惠霖、夏家辉、张思仲），进行研究工作。同时，我们与附属医院的胡信德、伍汉文两教授和李麓云医师合作，研究临床上的多种染色体病。一九七六年，我们在开展对三个鼻咽癌淋巴母细胞株染色体核型的研究中，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一条与鼻咽癌相关的EA标记染色体，经过夏家辉同志的努力，确定它是由三号染色体短臂易位到一号染色体长臂末端而形成的。这一发现为鼻咽癌的病理学研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中山医学院肿瘤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相继印证了这一发现，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这年，我们又在国内首次测定和

发表了《中国人体染色体G式显带模式图》，还发表了一对单卵双生儿同患鼻咽癌的病例及其染色体组型、血清学分析及指效等研究资料。这在当时世界有关文献中也是第一次出现。

进入八十年代科学的春天

一九七九年，我们与本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胡信德教授（七十年代中期我国第一个试验羊膜穿刺并取得成功的人）、李麓云讲师合作，在国内首次开设了定期的染色体病遗传咨询门诊，为孕妇进行产前检查，开展宫内诊断，测定胎儿的核型是否正常和染色体畸变的类型，先后为不少染色体病患者解除了痛苦。还在整理和搜集大量临床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识别各类染色体病患者以及染色体异常携带者的重要临床指征，明确提出了应进行宫内诊断的对象以及对染色体异常携带者的处理原则，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与优生、提高民族健康素质、诊断与预防染色体病，积累了一批基本资料。当时对新生儿染色体异常发生率的调查，国外已有八个用非显带染色体技术，一个用G显带技术的调查报告，而在我国尚是空白。一九七九年五月至一九八二年五月，研究室采用了G显带技术对长沙市北区三家医院陆续出生的3,415例新生婴儿作了染色体普查，发现其中有染色体异常者二十六例，其发生率为百分之零点七六；染色体变异者五例，其发生率为千分之一点六一。这一资料，将为我国优生优育及染色体病预防计划提供重要的参考。我院医学遗传学研究室已先后报告了四十三例未曾报道过的异常染色体核型。与此同时，我院还建立了生物遗传研究室，已能在实验室测定检查十余种代谢缺陷病（此项工作现已改由生化教研室担任）。在群体遗传学的调查中，我们的生物学老师发现了家族性多指（趾）并指（趾）、家族性脂肪瘤等典型病例。一九七八年中国遗传学会成立。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我国第一次人类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在长沙举行，我作为副理事长兼东道主主持了这次会议。我和另二位中年教师代表研究室，在会上报告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大会的一致好评。会上我被推选为中国遗传学会人类医学遗传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会下成立了八个专题研究协作组，把全国医学遗传学工作者按专业性质分别组织起来，以加速医学遗传学的研究。

一九八一年我院又成立了生殖工程研究组，一九八五年扩大成立生殖工程研究室，由两个附属医院妇产科和学院的基础部联合组成。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开始了冷冻精液的研究，次年二月试用临床。一九八三年一月第一个用冷冻精子人工受精婴儿诞生。现在已建立了小型冷冻精子库，先后为六十名妇女进行了冷冻精子的人工受精，受妊成功率从一九八三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百分之六十八。但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即试管婴儿）研究工作，限于条件，进展不大。一九八五年以后有所改善。

目前我正和本研究室的科研工作者一道，开展人类精液冷冻与人工授精等生殖工程学的研究。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要改变遗传物质，最佳时机是单细胞时期。我们计划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选择健康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二是引进人卵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技术，为遗传工程提供有利条件。我们的研究成果一九七八年分别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和湖南省科学大会奖，一九八〇年七月又获湖南省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再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等奖。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受委托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遗传学》分卷，约三十万字；还在湖南医学院医学遗传学研究室开办了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中国卫生部主办的中国细胞遗传学培训班。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

遗传学家潘士芬受世界卫生组织派遣和我国政府邀请亲临这个班讲学和工作。有来自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零一名学员参加听课，其中有二十五人参加了实验技术操作。

近几年中，我还完成了《细胞遗传学基本原理》、《人体点带染色体研究的进展》、《人类染色体病的诊断与预防》等论文，并参加了全国统一教材《医用生物学》和《普通生物学》的编审工作。一九七八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我在先后两年中招收了三名硕士研究生，至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他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留在本研究室工作。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日，经国务院批准，授权我招收首批攻读医用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现已收进了两名。

终于成了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解放前我在科研的道路上，探索了半辈子，成效不大；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了三十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明确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真正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做出了一些成绩，这都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教育。

几十年来，党和人民给了我许多荣誉。一九五〇年我被推选为省、市人民代表；一九五六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来担任民盟湖南省委主委）；一九五八年当选为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六四年、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四年，连续当选为第三届、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九年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还担任了湖南省科协副主席；一九六三年和一九七八年被选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受聘为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等。

八十多年来，我经历了好几个朝代。我从新旧对比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光明前景，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终

于彻底摆脱了宗教的思想影响。一九七九年，我把多年来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写成一份五千多字的入党申请书，表示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一九八〇年一月，在我八十高龄的时候，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找到了政治上的归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无神论者。

（欧阳瑜 整理）

肖同兹与中央通讯社

黎 宗 烈 *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我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充任一名“只拿薪水不做事”的宣传指导员。“七七事变”发生后，被派到南京市抗敌后援会，至是年九月三日，改派到中央通讯社总社，协助办理新闻宣传工作。一九三八年八月，中宣部人事有更动，该部主任秘书许孝炎商得总社社长肖同兹的同意，要我正式参加中央通讯社的工作。从此我历任该社文书员、驻南岳特派员、贵阳分社代理编辑、洛阳分社主任、驻汉中（陕西南郑）特派员，抗战胜利后，任开封分社主任、桂林分社主任，前后达十二年之久。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广西南宁迎接解放，将桂林分社的关防、房地产契约、电讯器材及办公物品移交军管会文教部军事代表梅幼先同志接收。

现在凭我个人经历及见闻所及，将中央通讯社的组织、业务活动及社长肖同兹、总编辑陈溥生的简史等等，写出一点轮廓，备供参考。其中由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担任地区工作，对中央通讯社整个面貌和具体内容，不易全部了解；有些又因年深月久，记忆不清，错误遗漏，在所难免，希望有关人士赐予补正。

开创时期的中央通讯社

一九二八年，丁惟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期，开始成

*黎宗烈建国前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洛阳、开封、桂林等地分社主任，建国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已故。

立中央通讯社，社址设在中央党部内。组织规模相当于中宣部一个科。由余惟一任社长。编辑和记者有刘振华、冯有真、何树元、陈熙乾、周培基、唐三等人。业务活动起先只是抄录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发布的决议案、重要来往函电和各机关公布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项材料，编成新闻稿件，油印分送各报社刊载，作用不大。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蒋欲控制舆论，决心改组中央通讯社，并派肖同兹接充社长。从此肖同兹一跃而成为国民党核心人物之一。

肖同兹接办以后的中央通讯社

肖同兹接办中央通讯社以前，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而中央通讯社又是中央宣传部的直属机构。蒋介石为得要控制这个新闻宣传机关，事先曾找肖同兹谈过几次话。肖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三点意见：社址迁出国民党中央党部；自设新闻广播电台；人员经费，须视业务发展需要而定，不能按照常规加以限制。蒋介石认为肖有办法，满口答应，要肖放手干下去。肖接任后，即将社址迁到南京寿康里一至三号，筹设新闻广播电台，扩大组织，并在南京土街口、网巾市之间，收购大片民房，准备自建五层新闻大楼一座，意欲在中国组成一个新闻托拉斯。

中央通讯社的组织

一、总社

中央通讯社的组织，遍布全国以至海外各重要地区，总社设在南京（抗战时期，一度迁至汉口、重庆；解放战争时期，先迁广州，后撤往台湾）。内分七部五室。七部为总务部、编辑部、英文部、编译部、采访部、电务部、摄影部。五室为社长

室、秘书室、总编辑室、资料室和会计室。另在南京清凉山附近设有强大的发报台。抗战胜利后，改在南京和平门外、神策门内购用民地百余亩另建新台。

七部五室的负责人，就记忆所及，概举于后（前后工作时常有调动，不另分别叙述）：社长肖闻兹，秘书曹荫樾、梁乃贤、翁平、石信嘉等；总编辑陈博生；编辑部主任曹荫樾，钱沧硕、刘竹舟、唐际清等；英文部主任汤德臣、任玲逊、黄序群等；编译部主任李宜培；采访部主任何树元、肖蔚民、陈叔同等；电务部主任高仲芹、周绍高等；总务部主任王商一；摄影部主任罗寄梅；资料室主任先为左恭，后为黄芝冈；会计室主任丁则怡；电务部主任下设工程师、领班、机务员、报务员各若干人；译电室附设在编辑部一起，也设领班一人，译电员若干人；其余各部室，除主任外，还设有总干事、干事若干人。

二、分社及新闻特派员、通讯记者

在全国各省省会和重要城市，先后都成立了分社。分社组织，按业务繁简比照总社适当缩小编制，一般只设主任一人，以下分设编辑、电务、事务、会计、资料各室，除电务室设有领班一人专门负责以外，编辑室则由值班编辑轮流负责。采访、译电工作，均附属在编辑室。资料室只有一个专人管理，大部分分社没有另设资料室。摄影工作则由采访记者兼办。

分社设置的地点，计有上海、武汉、恩施、北京、天津、广州、香港、长沙、沅陵、南昌、福州、杭州、桂林、贵阳、昆明、成都、重庆、西安、兰州、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宁夏（今银川）、洛阳、开封、太原、济南、沈阳等市。这些分社设置时间有先后；因为情况的变化，有些分社后来被取消了。担任过分社主任的有曹荫樾、梁乃贤、翁平、石信嘉、钱沧硕、何树元、李尧卿、陈纯粹、匡文炳、冯有真、张明炜、

张明烈、丁履静、唐际清、陈万里、唐才俊、袁振宇、潘仲鲁、肖蔚民、李良侗、黄一新、沈琢吾、律鸿起、陈熙乾、徐愿宇、郭从周、黎宗烈等人。

在没有分社的地方，有的还设立了新闻特派员办事处，如南岳、衡阳、洛阳、汉中、徐州、桂林等地，在抗战前后，都曾派有特派员组成办事处，配备电台，从事新闻业务活动。充任过特派员的有肖宏宇、王少桐、徐璠、胡定芬、沈琢吾、黎宗烈等人。

各省除设立分社、特派员办事处外，还聘任了一批业余通讯记者。对通讯记者不配备电台，只发给一份有线电凭照，让他们将当地新闻材料译成电码，交由电讯局拍发总社编辑部采用。电报费由交通部直接同总社按月结算。担任记者的人每月可以取得稿酬至少三十元。有些人还兼任平、津、沪、汉几个大报社的通讯记者，每月所获，常在百元至两百元不等。如开封张了旦，朱规清、洛阳史梅岑、绥远（今呼和浩特）杨令德、蚌埠张悟尘等人，都曾担任过中央通讯社的通讯记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战地需要，又在各战地临时加派战地新闻特派员和报务员，携带轻便电台，随军采访。如刘尊棋、胡定芬、王少桐、郭从周等，都曾任过这个职务。他们的工作对宣传抗战，鼓舞人心，激励士气起过一定的作用。

该社在国外如伦敦、巴黎、莫斯科、新加坡、马尼拉、新德里、东京、纽约、华盛顿等地，也先后成立过分社或特派员办事处，由汤德臣、任玲逊、英倚泉、骆介子、陈博生等人分别负责。

总、分社及特派员办事处的职工总人数，最多时达到一千余人。

中央通讯社的业务活动概况

肖同兹接长中央通讯社以后，即以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及同盟社为蓝本，想把该社办成一个跻身全世界大通讯社之林的新闻宣传机构。他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控制本国各报社的新闻电讯来源；第二步，收买外国通讯社在我国境内的新闻发布权；第三步，建筑新闻大楼，附设新闻记者公寓，分租给中外新闻记者作为写字间，从事新闻业务活动。他的这三个步骤实施情况分段说明如后。

一、控制本国各报社的新闻电讯来源

该社大小机构遍布国内外，新闻来源广，又自设有强大的无线电收发报台，通讯异常迅速，在国内新闻发布中，得以事事抢先。同时还取得交通部的协作，不许其它新闻机构另设电台。这样就将全国新闻通讯业务完全掌握在这个唯一的全国性官办通讯社的手中。其它各省市地方当局经营或私人经营的大小通讯社，人力财力与设备，都无法与中央社相抗衡，有的只好“关门大吉”，如河南通讯社、洛阳华北通讯社等，结果就是如此；有的徒留一块空招牌，作为个人政治活动的敲门砖，甚至终年不发一稿，逢年过节，向地方机关索取补助费十元五元不等。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我在开封时，知道有十几个私人经营的通讯社如“远东”、“中州”、“大梁”等，情况就是这样。有些军政机关的负责人为培植私人势力，也创办通讯社，如河南绥靖主任刘峙的和平通讯社，桂林绥靖主任李品仙的桂新通讯社等，其业务只限于发布本机关的一些片断消息，如要向全国播发的新闻稿，还是要交由中央社播发。

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向来以消息灵通见称，自从中央社设有专用的新闻广播电台以后，当天的国内外新闻，当天就可发出，较之他们

只能利用电讯局的有线电报发出的消息要快一天或两天，不免相形见绌，结果只好采用中央社的新闻稿件，借以充实篇幅。

该社为防止各报社偷抄新闻广播，乃逐月编发新闻密码，交各分社及特派员办事处使用。后来由于未设分社或特派员办事处的地方的一些报社深感不便，又规定这些报社每月可以五元代价购买新闻密码一份，自备收报机，按时抄收中央社的广播。

该社每日新闻电讯，分“甲播”、“乙播”（又称简播）两种。“甲播”字数由一万字到二万余字，专供各分社抄收、油印分送当地各报社发布。“乙播”约为一千字至二千余字，专供各晚报或偏僻地区小型报社采用。此外还逐日编印《参考消息》一种，作为内部刊物，分送各有关单位阅读。

该社新闻广播建立之初，每日的新闻稿件，原系义务供给，各报社可以全部采用，也可以随意删削，甚至完全不用，并无限制。不久就借口“版权”关系，迫使各报社订立“供销合同”，视各报社规模大小，业务旺淡，每日收取稿费五元、十元、百元不等。随着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该社所收稿费也随时增加，到抗战末期，每月稿费竟涨到几十万元至几百万元。至此，肖同兹控制本国各报社新闻电讯来源的计划，算是如愿以偿了。

二、收买外国通讯社在我国境内的新闻发布权

各国新闻通讯机构，伴随着他们政府的炮舰政策，先后侵入中国，如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美联社、日本同盟社、德国海通社和法国哈瓦斯社等，都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武汉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当时路透社负责人为赵敏恒，合众社负责人为王公达，哈瓦斯社负责人为潘劭昂，海通社负责人为陈芸阁，美联社负责人已忘记只有同盟社负责人是一个号称“中国通”的日本人小林德。

肖同兹认为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任意发布新闻，一则对于国民党政府一切决定，不易保密，二则对中央社业务发展前途不利，若用政治、外交方式使其就范，势不可能，乃采取收买政策，如同外交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一样，著作权仍为原作者所有，对方须与之签订合同，并付以相当的稿费，方能翻译出版。肖同兹以此办法先后取得哈瓦斯社负责人潘勃昂的同意（哈瓦斯社当时也设在南京寿康里，与中央通讯社总社毗邻），逐步得到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海通社负责人的谅解，先后订立了稿费合同，最后只剩下一个日本同盟社，始终拒不接受。当时正是日军侵华，“松沪停战协定”签字以后，日本新闻记者正以“征服者”的姿态横行于中国境内，当然不肯接受中央社的约束。肖没有办法，只好听任同盟社“独行其是”。收买的办法是这样的：由中央社另设专机，直接抄收路透社几家新闻广播电讯，译成中文发布，每月给以优厚稿费，路透社初为三千英镑，后来提高到五千英镑。其他如海通社、哈瓦斯社、合众社和美联社，都各以该国硬币计算，数目大至与路透社相等。中央社抄到这类新闻广播后，必须于每则电讯头上，在“中央社”下面，分别加上“某社某地某日电”字样，以表明电讯来源，同时保留对方的版权。此后这几家外国通讯社就不再在中国境内印发新闻稿件了。

肖同兹将以上两事办成以后，更加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

三、筹建新闻大楼、开设新闻记者公寓

肖同兹早就得到蒋介石核准，批发专款，筹建一座新闻大楼。在纲巾市、土街口之间征购大批民房，正拟开工兴建之际，遇到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南京遭到敌机轰炸，中央社总社寿康里社址，亦为敌机投弹目标，几乎被毁，乃转移至馥记大楼办公，同时在纲巾市、土街口间征购之民房内，以三万余元的代价，建筑大型防空洞一

座，内有办公室、临时电台等各项设备，以备发生空袭时，全体职工即可躲入洞内照常工作。可是工程刚刚告竣，洞内溢水还未抽干，总社即撤至武汉，三万余元的建筑费算是白花了。抗战胜利后，总社仍迁回南京馥记大楼办公，同时由秘书曹荫舜主持建筑新闻大楼工作。计划以下面三层作为总社办公之用；上面两层作为中外新闻记者的写字间，每月可收入一笔相当大的租金；用四架电梯作为上下楼的升降工具；建筑材料概用外汇向美国采购。肖同兹一向讲排场，爱豪华，羡慕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大楼建筑设计和所用材料，更非模仿美国不可，因此对于设计方案一再修改，建筑费用，一再追加，惟恐不能做到尽善尽美，蒋介石也是有求必应，毫不吝惜。至南京解放前夕，这座大楼还只完成外壳，所有安装材料及室内设备，有些还在美国没有起运，有些正在海运途中，有些已运存上海来不及启用，以肖同兹为首的中央通讯社，就随着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去了。

中央通讯社对人民做了一些什么

该社自封是“一个独立的国营新闻通讯机构”，其实在蒋介石所谓“以党治国”的原则下，所谓“国营”，不过是“一党专营”的代名词，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身并没有什么经营方针，完全要接受国民党中宣部的指导监督，遇有重要问题，蒋介石还要亲自过问。蒋的旨意，常由其最亲信的侍从秘书陈布雷代为传达。肖同兹也常利用陈布雷的桥梁作用，取得蒋介石的谅解。对革命人来说，中央社是国民党在“军事围剿”、“政治围剿”、“经济围剿”、“文化围剿”以外实行“新闻围剿”的一个武器，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能起到颠倒是非、混淆视听、麻痹人心、破坏革命的作用。蒋介石经常利用中央社散播谣言，叫嚣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诬蔑

共产党“共产共妻”、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还捏造一个所谓“望蒋杆”的神话，说是共军俘虏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把他们绑在一根高杆上，使其面对蒋管区，折磨至死。这些捏造出来的假消息经常由中央社用新闻广播发布，借以欺骗和恐吓人民。一个突出的例子：长沙解放前夕，有个国民党反动分子（忘其名）写了一篇题为《武汉归来》的文章，对共产党大肆造谣诬蔑，把解放区描写成一座“人间地狱”，中央社居然为之播发，反动报纸普遍刊登。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徒然暴露了中央社的反动嘴脸而已。

在抗日战争时间，明明是国民党军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央社却反诬“共军侵占国军地盘游而不击，勾结日寇，消灭友军”。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何应钦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的名义，正式发表一篇公报，捏造一些事实，倒打一耙，说是国军受到共军攻击，时间、地点、部队番号、国军“损伤”情况，讲得活神活现，俨然真有其事，这种满纸谎言的文告，也是通过中央社作为新闻电讯向国内外广播出去的。

在日寇战败投降之日，蒋介石利用美国海空军力量，大举运送军队，并勾结伪军，抢夺胜利果实；同时派遣高树勋、马法五等部，由郑州渡河北上，妄图消灭晋冀豫边区的人民武装，打通京汉路北段，为以后“军事围剿”取得有利地位。结果高树勋部起义，投靠人民，马法五只身逃回黄河南岸。这件事又为中央社加添了一段宣传材料，说是“共军割据，袭击国军，破坏接收”。

又如一九四六年昆明发生的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一案，同年重庆校场口特务逞凶一案，以及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一案，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广播中，都是依照国民党的旨意，发布了许多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消息。

在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假调处、真备战时期，中央社也曾派出一些记者随同“三人小组”奔赴各地，进行反动的宣传活动，把破坏“双十协定”，重新挑起内战的责任推给共军方面，作为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口实。在国民党军迭次进犯刘伯承将军所部驻地时，中央社曾发表过两次刘将军被“击毙”的消息。在胡宗南进犯延安的战役中，又发表过毛主席“被炸”的电讯。在国民党军曹福林部驻守河南兰封（现合并考城为兰考县）时，某天黑夜，发现城外有共军部队移动模样，曹部守军一个连惊慌失措，弃城而逃，事隔两天，发现兰封县城内并无一个共军，乃又回驻城内。中央社又播发一篇假战报，说是共军大部队猛攻兰封，守军浴血抗战，伤亡惨重，不得不转移阵地，重新组织火力，大举反攻，杀得共军弃尸满城，狼狈远遁，一举收复兰封县城。曹福林因此得到上级的赏识，将该部一个师长调任开封城防司令。当时在国民党部队中，由于假报成功而升官的，比比皆是。应该说，中央社是帮了他们的忙的。中央社助纣为虐，干了这么多的坏事，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憎恨。

一九四八年五、六月间，全国青年学生风起云涌地举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游行示威时，矛头指向国民党政权，也指向中央社。他们在校内“民主墙”上写文章，在街头宣传演讲，散发传单，甚至在国民党地方党部附近的墙壁上以及中央通讯社的门口涂写这样的标语：“国民党是刮民党！”“中央军是遭殃军！”“中央社是造谣社！”“中央社是种殃社！”这是人民群众愤怒的呼声，也是中央社应得的惩罚。

中央通讯社与各方面的微妙关系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C·C派与复兴社的斗争尤为激烈。肖同兹属于C·C派，对复兴社重要人物抱着敬而远之

的态度。复兴社对肖也时有怨言。但由于肖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复兴社也无可奈何，他们就用钻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对中央社设在各地的分社打主意，加以控制。如“军统”大特务徐远举，做过中央社成都分社主任；西安分社主任丁履静被胡宗南的政工组长王超凡所拉拢，组织一个三人小组，专门从事反共阴谋活动；在洛阳分社和开封分社任过编辑、记者的石德祥（又名石献吉）、李吏三两人，都是复兴社的人，他们利用中央社的名义，间接为复兴社服务。石时常勾结国民党宪兵队搞投机倒把活动。李则与河南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长刘艺舟有联系，利用调处小组在豫北安阳国民党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驻地开会的时候，秘密接受复兴社的指使和王仲廉的邀请，假借替分社去焦作煤矿购运冬天烤火用焦炭的名义，与王仲廉合谋进行反共活动。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开封学生举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游行示威，那天晚上，李吏三又私自参加河南保安司令部召集的检举新闻界“异党”分子的秘密会议，并充当主席，致引起开封各报社人士的愤怒，也遭到中央社内C·C派方面的指责，结果经过总社核准，在开封各报刊登广告，开除李吏三记者职务，并限期离境。这件事的内幕，并非因为李吏三参加了保安司令部检举“异党”分子的秘密会议，实因李吏三一贯倒在复兴社方面，与C·C派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为C·C派所不容。

在抗战时期，中央社与复兴社曾发生过一次正面冲突。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饿殍载道，状极凄惨。当时国民党在重庆设有新闻检查局，在各省设有新闻检查处，在省属市设有新闻检查组，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各报社所有新闻、社论及副刊文字，都要先期送检，得到批准，才许发表，否则以“违检”论处，对中央社的新闻材料也同样处理。负责新闻检查的主要人物都出自复兴社或与该组织有密切关系的人。国民党当局借

口怕影响后方人心和前方士气，对河南实情，封锁极严，河南人民非常愤慨。中央社洛阳分社职工，大部分是本地人，目睹灾区惨状，不甘缄默，啧有烦言。我乃挺身而出，一面将重庆大公报记者在河南灾区采访实况的一篇两千多字的特写稿，用分社电台拍给总社编辑部主任刘竹舟，请其直接转交大公报迅予发表；一面援引大公报社论《念重庆、望中原》中的一段文字，加上按语，编成当地新闻，未经审查批准，即油印分送各报社发表。河南新闻检查处处长石鼎认为我故意“违检”，急电重庆新闻检查局请求严加惩处。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蒋大骂肖同兹一顿，责令肖负责查办。当时参政会中的豫籍参政员郭仲隽、王公度等人得到这个消息，联合好几省参政员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质询案，风潮越闹越大，蒋介石被迫承认豫灾确属严重，并允拨款救灾，这场公案始告了结。对于洛阳分社负责人的“违检”罪，也就无形取消了。事后肖同兹有电给我，说我是“激于一时热性，致引起委座震怒”，并劝我“以后务须特别慎重，再惹出麻烦，使彼为难”。这次中央社与复兴社的正面冲突，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在C·C内部，为着中央社的事也发生过摩擦。该社驻洛阳特派员王少桐，曾在抗战初期随同中外记者赴延安访问，事后很多记者发表通讯。对延安方面有些好评。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认为王少桐是一个潜藏在中央社的异己分子，大肆加以攻击。复因王少桐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秘书，自持有军方作依靠，对省党部不予理睬，省党部一再向中央党部控诉，终迫使王少桐不安于位而脱离中央社。又有一件事，是发生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如《航空协定》、《通商贸易协定》等等，把我国领空、领海、内河航权、金融财政、资源开发、交通运输，以及土地利用等

各项主权都丧失殆尽。重庆大公报发表过一则《中美条约即将公布》的简单消息，据说是由中央社总社编辑部人员泄漏出去的。C·C告到蒋介石那里，肖同兹又挨了一顿申斥。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新闻记者的人，社会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各方面都想拉拢新闻记者，对中央社记者尤其重视。中央社驻洛阳特派员王少桐，被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拉去兼任秘书；驻桂林特派员徐璠被广西省政府聘为参议，都是例子。至于对新闻记者的饮食征逐、物质供应，更是常事。抗战时期，长沙一些新闻记者每遇到手中拮据，只要到前线跑一趟，即可满载而归。因为国民党的一些将领，都希望新闻记者替他们吹嘘一番。他们拉拢新闻记者的办法，设宴是次要的，送钱是主要的。送钱还要不着痕迹，避免贪污贿赂的嫌疑，于是派人陪着记者搓麻将、打扑克，赌本全由主人“垫出”一百元、二百元不等，客人无论输赢，赌本照样奉送。中央社驻长沙特派员胡定芬常以此夸耀于同行。我在洛阳时，听说孙桐萱部驻防郑州，也是采用这种办法拉拢记者的。曾充任洛阳分社记者的管维明，于一九四二年春季赴西北军孙蔚如部防地调查实情，曾向孙蔚如借用过一千元法币作“旅费”。不久管离开洛阳分社，在重庆找到了另外的工作，后来我在河南卢氏县，听说有这回事，当面向孙蔚如声明，中央社记者外出采访，都是由社里支付旅费的，这笔借帐，只能由管私人负责。孙为什么会这样慷慨地借一千元给管，还不是由于管是一个新闻记者的缘故。当开封分社记者李吏三被开除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也曾送过他一笔路费，并托人介绍他去上海一个小报工作。蒋鼎文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先后托河南省党部委员刘心沃，教育厅长鲁荡平邀请我兼任长官部参议或秘书，每月补助分社职工面粉二、三十袋，我以不兼职不兼薪相拒绝。他认为我太不受抬举，怀恨在心。当日军进攻洛阳时，洛

阳分社自雇胶轮大车向卢氏撤退，蒋以军运紧急，派人将大车劫走。我们随即又雇了几辆铁轮大车，中途又被军队劫夺去了，致使我们陷入敌人包围，公私财物全部损失，职工二十余人分头突围，总算保全了性命。事后有人埋怨我不该得罪蒋鼎文这个司令长官，我只好一笑置之。

其他机关团体如文化运动委员会、中山学社、妇女运动委员会等也多拉了一些新闻记者参加。我就担任过中山学社河南分社常务理事及河南省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委员。甚至连一些大寺观的方丈，也懂得这一套，如湖南南岳上封寺大和尚宝生，开封相国寺方丈华严等人，对新闻记者也是尽量拉拢，惟恐招待不周。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两句话：“和尚吃十方，新闻记者吃十一方。”因为一些新闻记者，连和尚吃十方得来的饮食，也要白吃一顿，所以叫作“吃十一方”。有人且把新闻记者列为“五害”之一。所谓“五害”是指“军官总(队)、青年从(军)、国大代(表)、立监委(员)、新闻记(者)”，这些讽刺话语，反应了人民对国民党统治下的腐恶现象的痛恨心情。

接收敌伪物资的情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即派人到处接收敌伪产业。原来在沦陷区的伪军及潜伏的军统特务，因势乘便，已先行劫收一次。等到正式派出的接收人员到达，往往只能接收一点剩余的东西了。

在日军入侵中国大陆时期，同盟社也随着日军的进展向我国内地伸展，沦陷了的各省市都设有同盟社分支机构。日本投降后，所有同盟社的产业，指定由中央社总分社分别接收。总社接到国民党中央指示后，即电令我接收开封同盟社。当时我正在陕西汉中(南郑县)工作，因为交通阻塞，返回经过郑州时又参加了第一战区的受降典礼，迟至九月二十三日始达开封。

得悉该地同盟社产业，早已被人劫收，所有房屋都被人占住，办公家具和机器设备，也被一扫而空。幸亏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在我未到开封之前，即通知中央社分社随省府行动的驻内乡记者孙其方代为接收，才得到一点残缺不全的电讯器材，如耳机、抄报机、天线、钳子、起子之类的东西，其中有一台百瓦发报机，仅留下一个庞大的空壳，连螺丝都不齐全。这台机器是日本产品，国内买不到零件，无法修理，成了废铁，最后还是花了一笔运费，送交南京总社存案了事。分社社址，还是由于西北军第十七师卫生连让出了一所房屋，留下了一些破烂家具，经过修整，同时在另外一个僻静地方找到了几间空屋，在那里架设电台才能开始进行业务活动。

两个巨头肖同兹和陈博生的简史

肖同兹是湖南常宁县人。他的父亲肖月明原是一位织布工人。肖在长沙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结识了黄爱、庞人铨。毕业后，与黄爱一同升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五四运动”后，又同黄爱一同回湘，组织湖南劳工会，本人在华实纺纱厂充当监工。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清晨，黄爱、庞人铨被湖南省长赵恒惕惨杀。不久，湖南爆发“驱赵运动”，肖也是参加者，一九二四年，肖去上海担任美术专科学校总务工作，兼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职工会的书记。当时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与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闹对立，为有觉悟的工人所不满，肖却因此得到“西山会议派”的赏识，被邀出席该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结识了吴铁城、马超俊等人。他在上海工作期间，与帮会头子杜月笙来往密切，据说他是杜的门徒。后来又因吴铁城的关系结识了政学系的张群。在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和一九三〇年阎冯联合倒蒋事件中，肖两次同吴铁城、张群去东北运动张学良附蒋成功，以此深得蒋介石

石的欢心和重用，历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劳工局行政处处长，中宣部科长、秘书、总干事，最后当了中央通讯社社长和中央执行委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利用董显光的关系，走上了宋美龄这条内线。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蒋介石在南岳单独设家宴招待肖同兹，只有董显光、宋美龄两个人作陪。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在行营附近山上散步，很远望见肖同兹，就叫“同兹先生请过来”。当肖谈到在“文夕大火”中，中央社长沙分社也遭受了一部分损失，蒋立即拨五万元作为补充器材之用。蒋对肖如此亲切关怀，肖自己也是受宠若惊，事后逢人便告。

肖在上海、南京各大城市的歌台舞榭中，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人皆称他“肖三爷”，而不呼其名。他的汽车换过好几次，牌号始终是“三”号，恰好与他的排行一致。

肖生平讲排场，爱挥霍，手头常感拮据。他与吴铁城、钟天心二人合伙在南京、汉口开设了私营银行。据说吴铁城、张骥先（当时张是法国哈瓦斯社远东支社社长）等人对肖常有资助。肖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人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肖在中央社任职期间，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总社内部时常发生人事纠纷，在抗战年代尤甚。中文编辑部主任钱沧硕与总编辑陈博生之间，秘书曹荫樾与钱沧硕之间，常闹摩擦。曹与梁乃器同任秘书时，也因职权范围，时有抵牾。他们常常消极怠工，或是称病不出家门。肖遇此场合，只好亲自出马，奔走各家，作和事佬。在外面工作的一些干部，也常有种种麻烦，使他大伤脑筋。这些干部在总社各有后台，曹荫樾、梁乃器、陈博生以及会计室主任丁则怡等人，则经常利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外面的工作人员，进行拉拢，上下左右，互为声援。肖虽身为社长，但对这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得不到各方面的谅解，也是无法行使其权力的。内部情形如此复

杂，外部的人事关系，也波折时生。如孔祥熙，就是一个难以应付的人。孔对肖充任中央社社长，素持反对意见，说肖既未出洋留过学，又不会说英语，资历学识俱嫌不够，徒然凭藉着一幅清秀面孔、翩翩风度和几句漂亮言词，才取得这个重要位置。有一个时期，蒋对肖的能力也曾发生过怀疑，决定把中央社的对外新闻宣传业务划出来，在中宣部成立一个国际宣传处主持其事，以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领导这一工作，并任用董的亲信曾虚白为国际宣传处处长。董与曾都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英语说得很流利，而且在上海英文大陆报任过编辑，这正是孔祥熙理想中的新闻人才。肖因此心怀不满，对孔也疏于往来，在南京被日军侵占，国民政府迁驻武汉时期，孔任财政部长，掌握财政大权。孔借此机会打击肖同兹，要削减中央社的业务活动费，这对肖是一个致命伤。当时由曹荫樾献计，要肖备具红帖（用红纸书写的名片表示特别恭敬）亲到孔宅求助，中央社的经费，始得维持原状。孔、肖之间总算“言归于好”。后来国际宣传处还是撤销了。肖同兹这个社长职务，保持达十八年之久，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政海波澜反复冲击中能够创立任期最长的纪录，究竟有何“高明”之处？我以为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他是全心全意为蒋介石效劳的人，也是宋美龄所赏识的人。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央社随着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九年底迁往台湾。当时中央社连总、分社在内，只有一部分人员和器材预先运到台湾，还有不少的人员和器材，分散在大陆各地，其中有些人自动地交出了保存的公物和资料，投向了人民。蒋介石一怒之下，才将宠信十八年之久的肖同兹贬入“冷宫”，起用曾虚白为台湾中央社总社社长，由曾设计另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社务委员会，推肖为主任委员，借以保存肖的一点面子。

其次简单地说一说陈博生。陈是福建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在北京晨报任过主笔，也是政学系一位重要人物。以此为肖所赏识，引入中央社。初任中央社驻日本东京特派员，“七七事变”后回南京总社任总编辑。他对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新闻宣传方针，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也是蒋介石、陈布雷所赏识的人物。国民党彻底撕毁“双十协定”，擅自召集“国大”期间，指定他和黄少谷（黄是扫荡报社长，也是复兴社的头面人物）两人为全国新闻界立法委员的候选人。肖同兹从中央社业务费中拨出一笔巨款，作为陈的竞选活动费用。两位候选人的提出和票数的分配都是C·C派与复兴社协商内定的。在开封选举时，很多人没有亲自去投票，由几个人代书代投，就把票数公布，宣布当选名单。当时我也是没有亲自投票的一个。但是他们事先协商、分配某一单位的选举人投哪个候选人的票，我是与闻其事，并且赞成这种办法的。选举结果陈博生当上了立法委员。中央社迁往台湾时，陈博生也跟着去了台湾，仍以中央社总编辑和立法委员两重身份，继续在新闻宣传及其他各方面为国民党摇旗呐喊。

本文有几处材料是由参事室王慎五、王光辉两先生口头提供的，在此表示谢意。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修订稿

解放前湖南的公共图书馆

周德辉*

一九七九年秋，我参加湖南省文化艺术志的编纂工作，与编写组同志们一道，比较系统地搜集了关于近代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的史料，其中有不少新的发现。湖南图书馆的创立时间，就是一例。多年来，一说是一九一二年，一说是一九〇五年，而我们掌握的确实可靠的材料是一九〇四年。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图书馆史料记载，我国最早创立的图书馆，一说是一九〇五年创办的湖南图书馆，一说是一九〇七年创设的江南图书馆，另一说是一九一〇年创立的京师图书馆。根据现有原始材料来看，都不是。首创的是一九〇三年湖南常德图书馆。当时，我感到十分惊讶，曾经想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于是动手写此稿。

湖南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胚胎

湖南公共图书馆的诞生，有一个孕育期。这是从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二年。这期间出现的近代藏书楼，实际上是后来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胚胎。

一、 校经书院藏书楼的创立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

*周德辉曾任湖南图书馆馆长多年，对湖南图书事业的发展有较全面的了解。

们，西洋文化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炮火，冲击着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文化，人们在仇恨、迷惘和倾慕中，经过五十年的反反复复，终于半推半就。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连不起眼的“小日本”，也居然战胜了“天下至尊”的“大中国”，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一些爱国之士，首先是一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要求仿效东西洋文化，变法维新。到戊戌变法，便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高潮。

这期间，设立藏书楼的主张，就作为效法东西洋的一项文化措施，跟随着提出来了。王韬在《征设香海藏书楼序》中，宣传“夫藏于私家，固不如藏于公所，私家之书积自一人，公所之书积自众人，私家之书辛苦积于一人，而或子孙不能守，每叹聚之难，散之易。惟能萃于公，则日见其多，无虑其散矣”。主张设立公共藏书楼。一八九四年马建中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也主张在院中设藏书楼。正当这些人议论建藏书楼的时候，湖南学政江标在长沙建立了湖南第一所近代藏书楼。

一八九四年十月，江标到湖南任学政，掌管全省的文化教育工作。他受变法维新的影响，大力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创办《湖学新报》，介绍东西洋文化知识，建顿校经书院，设舆地、算学、方言等学会；为倡导学术研究，积极添置书籍和仪器，并在长沙湘春门外，校经堂西侧新建一栋楼房，命名校经书院藏书楼，开放中外书籍，“所谓洋务或时务图书不下七千种”。

这所校经书院藏书楼已不同于以往各类型的藏书处所。

（一）建立目的不同。皇家藏书目的在于供皇帝施政时参考，休息时享受。宋太宗说得十分明白：“教化之本，治乱之源，无书籍何以取法。”“退朝之暇，聚图书以自娱。”明太祖也讲得很清楚：“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把孔学看成是“治国之良规”，“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清

康熙帝更讲得具体、明了：“自古帝王政治、隆文典经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盖以广见闻，而资掌故，其盛事也。”他提出的藏书标准是：“今访求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集、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留有用。”而校经书院藏书楼在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是为变法维新服务的。

(二)使用名称不同。在这以前、皇家藏书处所称阁(如文渊阁)、室(如味腴书室)、堂(如骑藻堂)、殿(如南薰殿)、房(如舆图房)等。私人藏书处名称就更多，有阁(如衡阳常大淳的濯印阁)、斋(如湘乡王凤初的扫尘斋)、楼(如长沙叶启勋兄弟的拾经楼)、堂(如道县何绍基的东洲草堂)、房(如宁乡刘康的红豆山房)、屋(如安化陶澍的印心石屋)、庐(如湘潭袁芳瑛的卧雪庐)、馆(如岳阳方功惠的碧琳琅馆)、庄(如沅陵冯锡仁的十柳山庄)等。书院藏书也都储藏在各种名称的斋、堂、楼、阁等处所，它和皇家、私人藏书处所一样，很少正式用藏书楼命名的。而校经书院却径用藏书楼命名，这就标志与以往的藏书处所有所区别。

(三)收藏图书不同。一八九四年以前，湖南各类藏书处所的藏书，都不外乎经、史、子、集、丛等各类有关书籍、版本、手稿等。校经书院藏书楼打破了这种藏书惯例，它不仅购藏了一批介绍东西方文明的新书刊，如地理、算学和外语等，而且也添置了一些“天文舆地测量诸仪、光化电试验各器，从而形成了我省早期公共图书馆的一个新的特点”。

(四)规章制度不同。校经书院藏书楼不同的是在当时《湘学新报》上公布了它的章程，公开提出了它对外开放的借书制度，明确规定了以下几点：读者对象：“欲看藏书规制，不论何人，皆准上楼游观。唯看书须由公绅给予看书凭单。”开放时间：“每日七点钟开门，五点钟关门。五、六、七、八四个

月每日六点钟开门，五点钟关门。”阅书手续：“读者持看书凭单，至楼看书时，由管书人先在楼下验收，方准开橱付书；看毕交书后，将凭单给还。如有损失等情，即将凭单存留，禀明公绅办理。”

校经书院藏书楼建立了较完整的外借制度，读者“凭单分注院内院外字样，凡非院内之人，皆不准携书下楼；即院内人，亦须查明确系常住院斋者，方准携书入斋房，看书限十日一缴。过期由管书人于册上注明，三次逾限者，即将凭单扣存，禀明公绅，不准再给看书凭单。院长学长看书，亦由公绅先送凭单，以免冒领”。

校经书院藏书楼开始设有专职管理人员，设公绅、管书人、司书人和夫役。

公绅相当于现在图书馆长，他是由书院与省会有名望的士绅商定以后聘请的，没有工资待遇。章程中夸赞他们“皆有力好善之人，决不计较薪水”，“故不致送”。管书人负责图书全部外借工作；司书人除管理藏书之外，还兼务采购、会计、杂务等，每年“工银五十两”，加薪“每月不得过十千文”。夫役“打扫房屋地板，洗擦窗格玻璃”等劳务。这些人员的设置和分工，已经初具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制度。

二、 学堂、学会藏书楼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开始了变法维新运动，湖南一度成为推行这一运动的重要基地。一八九五年十一月，陈宝箴来湖南任巡抚，在新思潮的激励下，经过整整两年的筹划，毅然邀请谭嗣同回湖南，协助他执行新政。谭嗣同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助下，聘请梁启超等人，在省会长沙办时务学堂，创刊《湘报》，同时大力倡导各地办学堂、设学会、建藏书楼。谭嗣同回到他家乡浏阳，首先将城乡七所

书院改为学堂，然后又发起组织群萌学会、算学会，积极推广新学。影响所及，岳州府所属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县书院也先后改成学堂，郴州等地也纷纷设立学会。学堂从成立时起，就筹买新书，建立藏书楼。群萌学会章程提出：“本学会愿办之事甚多……先从藏书办起。”很有代表性。

一八九八年一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在省会长沙创立南学会，设藏书楼，积极从事变法维新活动，受到从巡抚到学政，从知名士绅到青年学子的支持。当时，虽遭到省内封建顽固势力叶德辉等人的攻击，由于得到当时主张变法维新的清光绪帝的支持，反而影响愈来愈大，只几个月时间，省会学堂、学会林立，连当时清政府的官员也组织起来成立课吏馆，他们利用自办的藏书楼，学习有关各自职守的新学科。各州府县几乎都办了新学堂，设立了南学分会，兴建藏书楼，大力采购新书。这是湖南藏书楼的发展时期。

这时期，湖南藏书楼藏书的特点如下。

(一)着重采购新书，特别是西学新书，当时平江县长洗宝干很有代表性，他写信给时务学堂的梁启超说：“该书院旧有藏书，俱考据词章之学，于古今经济各书尚未购备，何有于西学？兹拟于添购中学政书外，多购西学新书、查照大著书目表（系指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凡有园囿者，悉数买取。”黔阳等县也派专人前往长沙上海等地购买新书。当时出现“集资尚易，购致尤难”的局面，使许多新书脱销。

(二)藏书来源多。当时许多官绅学士出于维新的政治热情，给各藏书楼慷慨捐输，热心资助。《湘报》几乎每天有捐送南学会藏书楼书籍的报导。有次刘麒祥、蒋德均、熊希龄等三人集资买到制造局藏译的西书共二十四箱，每箱一百二十种，捐赠湖南各学堂、学会藏书楼。各地知府、县令捐钱给当地藏书楼买新书的也不少。各学会会友也都集资购置新书。公法学会

章程就规定：“学友入会之始，酌议捐银五两至二十两存公，以为购书等之用。”

(三)充实西学启蒙书籍。当时各藏书楼多采集流行的《格致汇编》《西艺知新》《西学辑存》《西学启蒙》等各种丛书。

(四)按照新分类法进行分编。当时，有时务学堂推荐的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以及《湘报》刊登广学会推荐的《泰西要书总目》^注，分别为各藏书楼采用。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藏书楼大小近百个，其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南学会的藏书楼。它有章程二十四条，明确地解决了以下问题。

(一)向有志向学的人开门，并极力做好服务工作。不仅会友有“常年看书凭单”，而且非会友，只要“实系志切研求，由董事核准注册，即可付与凭单”。为了能使“有志向学者恣观各书”，规定“凡古今中外有用之书陆续购置、其尤要者多置复本”。每日开放阅览时间连续六小时，从“十点钟起至四点钟止”。为保证阅览场地安静，“看书时不得吸烟，不得饮食，不得高声笑语”。同时要求管理人员对读者“须按章耐烦检讨、不得怠慢”。“如因终日阅书，需购饮食者，可由本会斋夫备饭，每餐酌送饭资”。

(二)有较健全的采编工序。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目录体系，规

注：《西学书目表》分三大部、一杂类。一学部：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工学；二政部：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三教部；四杂类：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类可归之书。

《泰西要书总目》分十二大类：一道学(下分10支类)，二风俗通考(下分15支类)，三性学(下分5支类)，四世道(下分14支类)，五地舆人类历史之学(下分9支类)，六史学(下分9支类)，七古事考(下分4支类)，八格致之学(下分10支类)，九医学(下分16支类)，十工艺(下分13支类)，十一诸子(下分14支类)，十二语言文字(下分18支类)。

定“凡书每本盖用南学会藏书图章，其为会友官绅捐入者，加某官某邑某人捐送戳记”，“各书当均用楷书标写书名、卷数”，“所藏书籍应置分类书目簿二本，一交坐办处，一存藏书处。另须将书目用长牌数块，分类写明悬挂”。并“须先置流水簿一本，按购置之先后，或捐书之先后登记，某部计若干册，再另立分类书目簿一本，分类登记，并注明某年月某地某人所撰，系何处刻本，或每部有数本，并注明此书安放何柜何格”。

(三)有严格的借阅手续。看书必须凭证，每次借书一本，当日交还，“如有任意磨擦或损坏者，须认修整之费”，“以至残缺者，应照全部书价赔偿。”“凡入会、未入会者只许来会中领看，不许借阅携出”。“来看书者，均须按章行事，不得乖违”。“管书人不得任意通融”。

(四)着力保护藏书。对多卷藏书，“须用香樟及干木板夹之”，“管书人如有将书籍任意倒置损坏遗失及出借者由董事查明议赔或辞退”。“各书每季须晒晾一次，遇风日晴和天气，须启窗户、开柜门”。“各柜之书或有不常取阅者，管书人须三数日逐一查看，或阴湿潮霉即宜风晾，以免蠹生。柜门要随手关锁，既免盗窃，亦防鼠咬。凡此皆管书人之责承，勿得怠玩”。每季检查一次藏书，如有残缺遗失，由管书人赔偿。

以上情况说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前，湖南藏书楼已达到一个新的规模，这为公共图书馆的诞生作了各方面的准备。

三、 藏书楼的衰落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谭嗣同慷慨就义，陈宝箴被放逐边陲，时务学堂停办，《湘报》停刊，南学会遭取缔，它的藏书楼也被封闭。封建守旧势力乘机而起，一片恐怖笼罩湖南。各地学会无形解散，学堂复改为书院。

这时期，学会、学堂的藏书楼出现了三种情况。

(一)所有学会的藏书楼随着学堂的解散而停办，原有藏书大部散失，有的分散给了会员，有的为少数主持人所得，有的被书院接收。南学会藏书楼收藏的书札、版片等都被清政府销毁，收藏的书籍，涉及变法维新的亦遭销毁，只有一部分“经世致用之学”，才被清政府收缴封存。

(二)少数学堂停办以后，原藏书楼也不复存在，藏书一般都归并到当地书院。江标建立的第一个校经学堂藏书楼，就遭到这样的命运。一九〇二年《湖南官报》的记者曾深有感慨地报道：“湘中自江建霞学使倡建一楼于湘春门外校经堂之西……惜年来鞠为茂草！”该楼只两年工夫已经荒芜得不成样子了。

(三)大部分学堂停办改为书院，原藏书楼就成为了书院的藏书处所。这时期，书院只重考据词章之学，鄙视经世致用之学，仇恨变法维新之学。新的书籍得不到应有的流传，也得不到一些新的补充。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一九〇二年，湖南藏书楼堕入衰落和转向之中。

湖南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诞生

一、 第一个私人合办的公共图书馆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一部分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救国救民，走改良的路行不通，必须要起来革命，推翻清政府。原南学会的组织者浏阳唐才常等，毅然于一九〇〇年在武昌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被镇压，唐才常等遇难。同年，八国联军侵入，一九〇一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再一次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更加引起全国人民不满，清政府害怕引来革命风暴，不得已在一

九〇二年下诏“行宪”，推行“新政”，于是再次废科举、立学堂、派人出洋留学、译印外文书籍。从此，国外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源源不断引入。这时，湖南各地也奉命成立了官书局，刊刻了一批应用书籍，改建了学堂，也建起了一批藏书楼。

一九〇三年秋，湖南浏阳雷茂才（光字）在常德邀集一些同志合伙出钱买新书，租常德城内吕祖庙创办图书馆，传播新文化。开始，他们向常德府申请，提出“新政举行，图书类出，寒酸之士购阅较难”。愿“捐辏资财，开设图书馆”，太守朱其懿马上批准试办。

这年八月，常德图书馆正式开放，读者涌跃，每天经常有几十人，对于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通民智，大有影响。

一九〇四年初，有个常德中学堂的学生覃道让，在图书馆阅书处当着许多读者演说，“发挥救国必须革命之论，慷慨激昂，官绅惊骇失色”。当场，学生张振翼出来干涉批驳，引起一场辩论。清朝地方政府竟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他们在向省政府报告后作了如下处理：“学生覃道让于创立图书馆之时，口发狂言，迹涉悖谬，仅予斥革，尚不足以示惩，理应从重究办，姑念年仅十五，暂从宽典，应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随时查看。如再有狂悖言行，即予押解严办。……张振翼守正不阿，力辩邪说，致与覃道让互相争愤，足见志行坚定，学问明通，深堪嘉许，应由学务处特奖书籍费五十元，以昭激励”。

一九〇五年，在常德府各学堂的大力资助下，常德图书馆得以复馆开放，并废除了过去入馆挂号费和夜读取油资的规定，又兴旺了一段。至同年十月，武陵县令以“藏书不多，经费短缺”为由，将它改为师范传习所。尽管这样，常德图书馆的创办，对我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了开拓的作用。相继在长沙出现了由益阳人刘闳等筹办的阅书公社（租书铺）和梁煥奎

等倡办的湖南图书馆。

二、私人合办的湖南图书馆

常德图书馆开放以后，一九〇四年初一些知名的实业家、官绅、留学生，由梁焕奎、陈保彝、龙绂瑞、谭延闿、魏肇文、黄笃恭、胡元侠、许直、陆鸿逵、梁焕彝、刘栋蔚、俞蕃同等联合署名，在三月十五日《湖南官报》上刊登了《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这个募捐启事，说明了建立图书馆的三个重要问题。

(一)突出强调了图书馆的教育作用。它明确指出：“夫国家之成立在民力，民力之膨胀由民智，民智之发达因教育，教育不能普及则智识无由普遍。以无智识之民，处生存竞争之世，危乎悲哉，不可说也。教育不一途，而范围莫广于社会教育。改良社会不一术，而效果莫捷于图书馆。”

(二)明确提出了建立图书馆的必要。它慷慨陈词：“比年以来，学校教育方在萌芽，而世变环生，日剧日烈，救死不给，厝薪已然，远览列强之成规，上稽近古之已事……痛心种族之前途，中夜徬徨，揽衣屑涕，信乎图书馆之不可一日缓也。”

(三)热忱表达了建立图书馆的决心。它说得情深意切：“改游宴凭吊之区，以研究有用之学，储书籍以备观摩，购图器以资试验；读犹太杀亡之史，而知亡国之可哀；览学校易色之图，则知瓜分之不免。嚶鸣可以求友声，合群即以谋公益。凡我同志共有覆巢之惧，谁无爱国之心，必表同情，成兹盛业。”

他们在这种可贵的政治热情支配下，经过很短时间的筹募，得到当时巡抚和学务处的批准，于是积极修缮长沙城东定王台做馆舍，终于如期在这年的四月开馆。当时发行全国的《东方杂志》曾作如下报导：“长沙城东有古定王台，兹由梁、

龙诸君创捐巨款，购办中外图书及人体动植模型、光化等学仪器列置其中，设馆三所，曰图书、曰教育、曰博物，近已开办。”从这条小消息可见湖南图书馆，不仅有图书供读者阅览，还附设有教育馆，列置光化等学仪器，以供读者试验，附设博物馆，陈列人体和动植物的模型，使读者开扩视野。这样规模的图书馆在当时又是一个创举。

湖南图书馆开放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为建立制度、扩大影响，它在同年十一月六日的《湖南官报》上，又公布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规则》。这个规则共三十条，除继承了南学会藏书楼章程的优点，又有进一步发展。

它有明确的办馆宗旨，“本馆以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创兴学校者得所考证”，“所藏图书、书籍、标本、模型、理化器械，以及各种教育用品、各种报章等项目，凡有志向学者，皆得照规则入馆参阅”。说明它：

（一）是输入和传播西方新文化的知识场所；

（二）是向较多方面的读者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三）是拥有多种多样为读者服务的工具和手段。

它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干事五人，公推一人为总理，其余四人分别担任会计、书记兼庶务，图书采办及转运等事，并协助总理纠察馆中诸事务。设司事二人住馆，专职负责收发券据、出入银钱、填付证书以及收发所藏各件。此外，还雇工友二人，一个买券据及开闭馆门，一个负责供应茶水、饮食和清洁卫生。一共七人，各负其责。

它有扩大收藏的有力措施，一是奖励捐献。“捐财产千金以上者，随时稟请抚宪破格奏奖，并推为本馆名誉赞成员，凡馆中一切事务皆得与议”。二是表彰借展。“凡有珍重家藏未能割爱，但借供众览，或数月一年或者若干年”，办理正式借用手续后，“随时登报申谢”。三是酌情收费，读者入馆券

费：日券一人一券次，钱十文，二至十券次，每券钱八文，十一至二十五券次，每券六文。月券以月计不拘次数，每券一百二十文。它具有公共事业公共办的精神。

三、清朝官办的湖南图书馆

一九〇四年冬，湖南巡抚陆元鼎（署）筹划官办图书馆。年底，端方来湖南任巡抚，标榜“新政”，一面考查图书馆工作，一面购置书籍。一九〇五年三月，以“省垣学务正兴，所有各种科学，东西各国书籍器具，拟设图书馆所，藉可藏储各书籍，以便各学堂就便调阅”为由，接管了定王台湖南图书馆，并把它改成了清政府官办。

官府接办湖南图书馆以后，气派就大多了，当即从省财库拨给筹备经费银一万两，常年经费一千二百两，至于采购建置需要的费用，另外由善后局和厘金局负责筹措，并正式委任溆浦县教谕陈庆年为监督，皮鹿门任纂修。拨给各书院因替废上缴官府的所有书籍。于是官办的湖南图书馆就正式开张了。

官办的湖南图书馆不再向“有志向学”的人开门，而给“各学堂就便调阅”，开始也采购西书与器具，后来又大量收藏经史考据书籍。

一九〇五年夏，庞鸿书继端方任湖南巡抚，认为“定王台原址狭隘，非购民房屋另造，不足以壮观”，于是补拨银五千两，十月“造就藏书楼一所，计三层，纵横面积四十丈；阅览四所，纵横二十四丈；更有买券缴券处，领书处等屋”，可说是书库、阅览室、出纳台等应有设置俱全。管理人员分设会办、提调、收掌、收发、司事、书记、工役等职。还规定：“采办图书，添置器皿及薪水、辛工伙食一切杂用等项，按季造具报销呈报。”

同年十月二十日，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以后，庞鸿书又在

学务公所内设图书馆课，任皮鹿门为课长以加强对湖南图书馆的控制，此后，湖南图书馆工作每况愈下。到一九〇九年，连省咨议局也不得不提出指控：“图书馆地址太偏，藏书太少，近日阅书者不多，几归于自然消灭之势”，“司事各员亦不设法改良，并有挂名提调、总纂等多人，坐领干薪，尤属糜费，应实力进行整顿，裁汰冗员。”当时学司不仅不设法整顿，反而袒护，回答咨议局：“应暂缓行。”

一九一〇年初，清政府学部公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湖南在立宪筹备专门教育事项中，也相应扩充了全省图书馆。

湖南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形成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当时湖南地方政府曾经要求发展全省公共图书馆事业，一面恢复原湖南图书馆的业务活动，一面通知各县普遍建立图书馆。

一、省立湖南图书馆

一九一二年春，湖南都督府将清政府官办的图书馆改为省立湖南图书馆，委派仇道南为馆长，经费由省库开支，拨给前思贤书局古籍、版片，并接管原有图书及定王台原馆舍。

同年三月十五日，新的湖南图书馆开馆，并在《长沙日报》刊登广告：“今值国基肇造，策进共和，知识之开通，文明之发达，当以先研学问为第一主义。……务使宏篇鉅制搜括无遗，四壁琳琅，足供热心求学者屠饫。”

一九一三年五月，湖南图书馆书目记载，共有藏书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册，计分十七类^①。实际上没有添置新的图书和设

备。

省立湖南图书馆开馆后，从时间段落与工作起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初，这七年，湖南的形势是：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灾荒频呈，民生凋蔽，省库空虚，百业不兴。这给刚开放的省立图书馆带来一连串问题。

（一）领导极不稳定。在军阀混战中，胜者为王，掌管全省军政大权的都督像走马灯似的变换，每换一个都督，随着又换一个图书馆长，七年中换了仇道南、肖叔康、刘善渥、杨汝康、周镇澄、蔡铤等六人。当时《湖南政报》载：“连年以来，馆长失人，藉词军事影响，其中损失弥鉅。”

（二）经费奇绌。从一九一三年起，湖南教育司公开提出“际此财政困难之际，而欲扩张教育，颇不容易”，开始削减图书馆经费。从此，湖南图书馆经费年年绌支。到一九一六年，湖南官书报局被撤销，归并到湖南图书馆，隶属于图书出版部，下设印刷、发行两所。于是大做书刊印刷发行生意。一九一八年，图书馆“补助金只能以八折支給，馆务实难维持”。特别是南北军阀在湖南混战的高峰中，经费毫无着落，奉令招商合办湖南图书纸张印刷局，由馆长兼任监理，停止馆务，做生意去了。

（三）藏书有减无增。一九一二年，湖南图书馆接收藏书有中文书五千多部，日文书一千五百多部，西文书四百多部，藏书总数在八千部上下。开馆以后，有关当局对此还大加夸赞，说是“规模尚有可观”。一九一三年藏书略有增加。此

注：十七类是：一丛书，二类书，三社总，四哲学，五法律，六政治，七军事，八教育，九历史，十舆地，十一算学，十三实业，十四医学，十五艺文，十六说部，十七美术。

后“馆长迭易，馆务紊乱”，藏书没有增补，只在一九一六年以后才陆续收集、接收、印刷了一批古籍旧录。后来在南北军阀混战中，图书馆藏书又损失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图书馆不得不在一九一八年前后停止活动。

第二阶段，从一九一九年夏至一九二三年春。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省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拨款整理湖南图书馆。停止活动近两年的湖南图书馆，在民主与科学的声浪中重新开放了。但是，好景不长，一九二〇年六、七月间，馆舍先被城工局驻扎，后来又被李仲麟的湘军游击队驻扎。驻军秩序很乱。器具、书籍、木器损失很大。九月，会客室和晒书楼同时倒塌。十月，谭延闿又把图书馆作招待所，“失书达一楼之多”。十一月，省府在《推行社会教育计划书》中谈到要扩充图书馆，但又迭换三任馆长（易培基、雷飞鹏、黄彝寿），馆藏损失惨重。据当时的《湖南政报》记载：“因受政潮影响，馆长迭易，书目屡更。每值一度交代，以贗本易真本者有之，以今槧易古槧者有之，即或昔有今无，潜为窃者有之。”一九二一年省长公署虽然公布了湖南图书馆长任用条例及湖南图书馆移交章程，也是一纸空文。赵恒惕担任湘军总司令以后，打出了“湖南自治”的旗号。当时省教育会以湖南图书馆“年来栋宇凋敝，整理复需数千金，且其中卷轴虽多，亦尚未臻美善”为由，提出不如归并到该会新建的图书馆。于是，在一九二三年三月省教育会图书馆新舍落成以后，省政府就正式批准将湖南图书馆的珍贵书籍移交该馆，省立湖南图书馆只得停办。这是十年内的第二次停馆。

第三阶段，从一九二五年到新的湖南省政府成立前后。当省教育会要求兼并湖南图书馆的时候，主管图书馆的省教育司意见并不一致，后来采取折衷办法，才将湖南图书馆的珍贵图

书归并省教育会图书馆。一九二五年四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当时省立湖南图书馆已停办。湖南是以图书编辑处名义登记入会的，大家认为有失湖南声誉。当形势稍有好转，省教育司即提出恢复省立湖南图书馆，而将图书编辑处撤销，即以唐璆处长改为馆长，同时支拨开馆经费，九月十八日，省图书馆正式开馆。这时，正是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湖南省会长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一九二六年初赵恒惕被逐出湖南，原任馆长唐璆去职。湖南图书馆第三次停馆。七月，唐生智入主湖南，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复将教育图书馆改为省立中山图书馆。

二、湖南通俗图书馆

辛亥革命前后，知识界为“开通民智”，提倡社会教育。这时通俗图书馆事业才开始为有关部门所重视。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湖南曾经着手筹建省通俗图书馆，后来因为缺少经费，无钱买书，没有开馆。一九一三年五月，湖南省教育司又向省议会提出《拟于省治建立通俗图书馆及巡回文库案》，同时制定公布了《通俗图书馆暂行通则》。《通则》规定：“通俗图书馆之设立，以备置浅易图书，供一般人民阅览，灌输常识，培养道德为宗旨。”这较以往公共图书馆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因政局丕变，人事更动，又成泡影。延至一九一四年冬，当局才勉强成立湖南通俗图书馆，附属于湖南通俗教育图书编辑所内。这是我省第一所打算面向群众的公共图书馆。

开始，湖南通俗教育图书编辑所还比较重视，由所长兼任图书馆主任，另外委派两个专职图书管理员，将编辑所的藏书提供开放。当时，主任陈崇祀眼看开放的图书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求，曾经想方设法为通俗图书馆添购大宗书籍。正在这时，由于政局变动，他被迫去职。添购书籍因而中止。

湖南遍地战火，政局一直不安，湖南通俗图书馆和当时湖南图书馆的命运几乎一样，尽管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了《通俗图书馆规程》，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众阅览”，也无济于事，时开时停，不死不活。直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通俗图书馆才又引起当局重视。开馆“专为通俗人阅览”，同时鉴于“现有书籍多不便于通俗”，还主张添购通俗书籍和设置平民阅览室。这个计划得到了省长的认可，曾命省通俗图书馆遵照办理。后来又是由于政权换人，计划再次落空。

最后，在一九二二年，湖南通俗教育图书编辑所，改为湖南通俗书报编辑所，旋又改为湖南通俗教育馆，湖南通俗图书馆也随着改由湖南通俗教育馆领导。后来实际上成了通俗教育馆对外开放的一个阅览室。它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大不相同了。从此，湖南通俗图书馆便悄悄地结束了它短暂的生命。

三、省教育会图书馆

教育会图书馆，属于群众团体的公共图书馆，是当时出现的另一种形式。

一九一三年湖南教育总会改组，定名为湖南省教育会。一九一五年当教育部提倡各群众团体举办通俗图书馆的时候。湖南省教育会也办了一所。内设图书、书籍、新闻杂志三部，流通的图书一靠购置、募捐，一靠向公立藏书处租借交换。由于规模不大，工作人员配备很少，仅有经理、书记各一人支撑门面，默默无闻地办到一九二〇年。这是省教育会图书馆的前身。

一九二一年，省教育会扩大组织，声望和地位都有所提高，对湖南教育事业有较大的影响，政府当局虽不喜欢它，但也得适当尊重它。这时省教育会也一反常例，直接举办了一些文化事业，其中包括扩建图书馆。他们认为原有图书馆藏书不多，

“且仅适应于通俗之用，不足以资教授之参考”，于是积极改变藏书成分，一面“广为购备供各科研究之用的书籍”，一面接收湖南大学筹备处及原御书楼、岳麓书院、南学会、校经堂和时务、求实、高等三校的图书，共得新旧图书六千三百多册。这年三月，经省政府批准，正式改名为湖南省教育会附设图书馆（后简称教育会图书馆）。

省教育会图书馆开馆以后，感到馆舍不够，即着手筹集经费另建新馆，经过当事人的积极努力和教育界的热心支持，一九二二年四月兴工，至一九二三年春天落成，共花光洋二万九千元；建有书库三处，阅览室、研究室、儿童阅览室、阅报室各一处，晒书露台一座；此外，还有办公室、馆员室数间；同时，藏书增加五倍，有中文书三万一千三百多册，外文书二千多册，杂志一百六十种，报纸九十余种。旧书用经史子集四种分类，新书仿杜威十种分类，目录分书籍目录和杂志目录，均用目录卡片。稍后又得湖南图书馆藏书一千三百八十七部，各省县志共四百二十七部。库藏更加丰富。这是当时湖南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这所图书馆很有一些新的建树。

（一）在开展业务工作上有很多创举：阅书和阅报分开，专设阅报室，各一百五十多种报刊，供一般读者浏览。普通读者与专门读者分开，创办研究室，以备专家研究。成人读者和少年读者分开，另辟儿童阅览室，专供少儿活动。此外，还兼营名家图籍、碑帖陈列，实际上进行了书刊的宣传、展览、推荐工作。

（二）在工作人员选择上有新的措施：馆内设主任一人，主持全馆事务；馆员二人，分任分类保管等工作；办事员三人，分任购置、出纳、收发、会计、文牍、缮写、清检、装订等事。不同的是，主任不是委派，而是由教育会评议部和干事

部联合选举，任期三年，并须具有文学或教育专科学校毕业水平。馆员和办事员都要有经验，有专长，归主任挑选延聘或者雇请。

（三）在开馆时间上也有它独特之处，它除了规定每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开放以外，还规定从立夏至寒露期间，加开夜馆，从晚七点钟至九点钟，以便利读者。

唐生智入主湖南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将教育会图书馆改为省立中山图书馆。“马日事变”后，省政府接管了中山图书馆。后来省教育会曾多次要求恢复教育会图书馆，发还原有图书、设备，都没有得到教育当局的同意。于是一个较为活跃的公共图书馆就这样消失了。

四、早期县立公共图书馆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人们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当时兴办社会教育、通俗教育的声浪很高，创设图书馆也成为了一种革命的新事物。除省立湖南图书馆外，各县也开始出现县立图书馆。在军阀混战时期，这些图书馆的生命大都是短暂的。它们有三次起伏：

第一次：在革命胜利的刺激下，出现了第一批县立图书馆。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一九一二年成立的有东安县图书馆，慈利县图书馆；一九一三年成立的有湘潭县图书馆、桃源县图书馆、南洲厅图书馆，一九一四年成立的有攸县图书馆。这些馆的藏书，有的是接管各县原藏古籍，有的添置了通俗报刊。有的设有专职经理、司事，并有常年经费。据有关湘潭县图书馆的记载，“每日阅报者约百人以上”。

第二次：一九一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要各县成立县立图书馆或通俗图书馆，湖南教育当局也曾要求各县建馆。但响应的并不多。这一年只有泸溪县建了县馆。过了三年，到一九

一八年，常德县才办了通俗图书馆，还附属在县通俗教育馆内。

第三次：张敬尧被赶走以后，湖南当局企图笼络人心，标榜立宪、自治，但号召力不大。一九二二年，衡山县留学各地的中学生，“为谋发展教育，改进桑梓文化”，倡办了一所图书馆，后来改为县立。一九二五年四月中华图书馆协会调查全国图书馆时，湖南除有所学校图书馆外，还有辰溪县图书馆、岳阳通俗图书馆、常德县图书馆、溆浦县通俗教育图书馆、宁乡劝学所附设图书馆等五所县市公共图书馆。到一九二七年末阳县有了图书馆。但在马日事变前后，它们又都无影无踪了。这期间，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衡阳县图书馆成立以后一直保存下来。

一九一七年衡阳县劝学所提出“倡办图书馆，以饬学者”，一九一八年开始募款筹建，将衡阳府模范小学校校址，改建为图书馆舍，一九一九年秋天馆舍建成。一九二〇年筹集图书、购置家俱，充实了馆内设备，一九二一年元月正式开馆。

衡阳图书馆开馆以后，开始经费全靠募捐维持，藏书不多，规模较小，工作也很艰难。到一九二二年，分得石鼓书院学租三百八十石，又得县田赋余额十分之六，从此以后，情况才有好转，藏书与设备，不断得到充实。一九二三年三月，馆长曾邦彦仿照当时北京图书馆的办法，聘请该县“耆绅宿学，及有功本馆”的人士，共三十四人，建立图书馆的组评委员会。公共图书馆吸收社会人士参与管理，它在湖南算第一个。对开展馆务活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入衡阳前后，衡阳图书馆专门成立了保管委员会。“马日事变”前后，图书馆的馆务，归县教育局代管。在这次大变动期间，虽然工作开展不多，但能够保存和维持下来，就算很不错了。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衡阳县图书馆得以延续下去，主要是经费来源有保障，其次是有社会力量的关心与支持，第三是在政治大动荡中有应变措施，这三者缺一不可。

五、三个小型图书馆

五四运动以后，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湖南兴起，湖南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极为活跃，各种主义、各种思潮都有市场。他们结成各种社团，吸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宣传自己的信念。于是，各种小型图书馆或图书室应运而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进步的小型图书馆。

（一）文化书社。它是毛泽东等进步青年组织的一个书店和图书馆合一的组织，一九二〇年七月在长沙正式开幕。后又在省内几个据点成立分社，协同开展活动，在当时进步的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它的主要任务是，“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研究的材料”，“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的机会”。它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售书和借阅。

关于售书：它通过旅居各大城市的社友、亲朋，罗致国内外各种新书刊，及时运来长沙。然后一面通过报刊广告介绍新书，一面通过读者互相推荐、推销，新书销售很快。据开业后七个月统计：销百本以上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动政府与中国》等；销售最多的杂志，《劳动界》（五千份），《新青年》（二千份），《新生活》（二千四百份）。当时长沙《大公报》在《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文化书社是当时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

关于阅览：它在社内设立了阅览所，陈列当时行销的进步书刊。如新文化社丛书、哲学丛书、晨报社丛书、新潮丛书及

《新青年》、《劳动界》等，供社友和所联系的读者阅览。此外还印有两种传单：《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的商榷》，指导人们买书和读书。

文化书社开幕后，约年把光景就停办了。

（二）湖南自修大学附设图书馆。一九二一年八月，毛泽东开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长沙，通过何叔衡等人的工作。在原船山学社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整顿原船山学社图书馆，买进一批新书（其中有不少马列著作），编印了图书目录，订立了《领阅书籍规则》、《书报阅览室规则》，改名叫自修大学图书馆。它一面利用藏书借阅，推荐一批进步书刊：如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著的《阶级斗争》、邵飘萍著的《新俄国之研究》，以及《新青年》、《新潮》、《觉悟》、《共产党》等杂志，一面组织马克思学说讲习会，宣传马克思主义，让师生、学友在这里“自己看书、自己思索”，研究国家大事，选择自己的道路。到一九二三年四月，反动派封闭了自修大学，这所图书馆也遭到毁坏。

（三）湖南青年图书馆。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回长沙以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湘区党委，第二年湘区党委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的实际工作，是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主持的。馆址设在长沙城都正街，原是一幢公馆，楼下设阅览室，陈列一般进步书刊和各种报纸；楼上还设有一间小阅览室，存放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共产党》、《新青年》等杂志。它是专为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开设的。办到一九二三年三月，由于经济困难，很难维持，后来就停办了。

这三个小图书馆在当时公共图书馆事业中，也只是星星之火，看来无足轻重，而它却对造就湖南一代共产党人起了积极的作用，在革命的历史上有它不可磨灭的功绩。

湖南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

马日事变，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用血腥的手攫取了湖南军政大权；以后何键掌权，更用加强白色恐怖巩固了他的统治。从一九二九年起，湖南出现了一个高压下的稳定时期，公共图书馆的事业一度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县市图书馆普遍建立，中山图书馆的兴办，省立图书馆的增设，私立图书馆的继起，颇极一时之盛。但是，曾几何时，抗日战争爆发，长沙文夕大火，公共图书馆事业一落千丈。这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在革命根据地，却兴办了列宁图书馆，如一九三一年浏阳小河当地的列宁图书馆，反动政府也不得不惊叹书籍甚多，但由于资料不全，本章从略。

一、县市图书馆的建立

县市图书馆的普遍建立，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第一个发展高峰的主要特征。

一九二九年九月，何键夺取湖南政权以后，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决定大力发展县市图书馆，从省库拿出三万元，向商务印书馆购买新出版的《万有文库》，每县市发给一部，名义上说是“以资激励”，实际上通令各县市政府，限在“三个月内成立民众图书馆”，这样，县市图书馆便先后建立起来。据一九三〇年一月统计，全省七十七个县市，除“会同、大庸两县因有特殊情况尚未建立外，其他七十五个市县，都已先后遵令成立了民众图书馆”。到年底，会同、大庸两县的图书馆也建立起来了，有些县的区、乡也建立了图书馆，长沙县共有十个，宁乡共七个，溆浦、慈利、石门、华容各五个，湘乡、祁阳各四个，零陵、澧县各三个，长沙市、安

江、醴陵、武功、桃源各二个，全省共有各级图书馆一百一十四。除原有五个县市图书馆外，一年多时间发展近一百个，到一九三二年，除华容、临湘两县的图书馆被撤销外，全省尚有图书馆一百〇三个。

这些新发展的县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从一九三一年五十五个县的调查材料可以看出：

（一）工作人员极少，有三个馆没有专人，十一个馆只有一人，二十八个馆有二人，六个馆有三人，三个馆有四人，还有三个馆有五人，只一个馆有六人，二个人以下的馆竟占总数的五分之四。

（二）藏书极少。五十五个馆中真正得到《万有文库》的只有五个馆，藏书五百册以下的有五个馆，五百至一千册的有八个馆，二千册的有十个馆，上五千册的只有七个馆，其余都在二千至五千册之间。这些藏书，除少数适用或较有价值外，大都不适合民众阅览，入馆的读者每天最多的不过五十来人，有的甚至无人问津。

（三）经费极少。五十五个馆中除少数馆象衡阳等县有固定经费，勉强可以维持馆务外，大都经费无保障，内中有七个县馆划归民众教育馆，经费由它负担，其余大部分馆由县教育局代管，依靠教育局的一点节余经费来维持，不仅无法添置新书，有的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

从一九三二年以后，每年都有一些馆停办或中止活动。到一九三八年抗战形势吃紧，省教育当局眼见门面支撑不下去了，遂通令各县市图书馆一律归并到民众教育馆，改为它的图书室。

在县市图书馆中，有几个特殊一点的馆，补述如下：

（一）衡阳县、市图书馆。衡阳县图书馆在军阀混战中保存下来。一九三〇年县教育界以原馆舍狭窄，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

需要，于是选出整建委员五人，用了一万四千多元，边进行基建，边扩建藏书，其中募捐来的图书不少，有《古今图书集成》、《大英百科全书》等。一九三二年一月初新馆开幕，藏书共有三千二百多种，约一万册，重新编目，将原七分法（经、史、子、集、小说、杂志、报章）改为十分法（总丛、经典、史地、哲学、文学、语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及艺术。新馆设四个阅览室，每天接待很多读者，被形容为“肩摩踵接”，可见当时盛况。当全省县立图书馆衰落下去的时候，它还在一九三七年举办了一个“文献展览会”，花三、四个月时间，动员几百人，“搜集千数百年来乡先哲时贤之手迹”和“数千百片栗片法帖，藏于一室，尤为稀世之珍”，影响极大。一九四二年，衡阳市成立，图书馆划归市管，县教育界不服，“以该馆创建维艰，所有经费、图书，均以全县名义、全县人力、积十余年之经营，始有今日之规模”。抗不移交。至一九四三年三月，只得让县图书馆保留，并分给县一部分藏书、财产。从此，衡阳市图书馆走向衰败，到一九四六年终因图书散失，无形停顿。

（二）长沙市儿童图书馆。长沙市教育界通过教育会迭次向政府要求设立儿童图书馆，市政府一再拖延，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始批准成立儿童图书馆，借长沙又一村市民众俱乐部新建房屋为馆舍，藏书主要靠有关单位捐赠，只购买少量儿童读物和通俗报刊，四月开馆，每天下午开放四小时，入馆儿童在三百人以上。一九三七年增设动植物标本和器物模型陈列室，举办儿童抗敌作文比赛，又一度成为青少年活动的中心。长沙大火后，儿童图书馆被迫停办，至抗日战争胜利后仍无法恢复。

（三）长沙市教育会图书馆。马日事变后，省政府命令重新组织教育会，恢复该会的图书馆。一九二八年七月，长沙市

教育会买了一些国民党党义书籍，找各大书店捐助了图书多种，又得中山图书馆部分复本，共有藏书四千三百四十四本，除国民党党义、经、史、子、集五类外，其它书籍采十分法。至一九二九年三月开馆，书报不外借。仅设管理员一人，管理阅览室、阅报室各一间，主要陈列国民党党义书，读者很少，支撑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停馆。

（四）抗战图书馆。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学校内迁，大批知名文化人和难民聚集长沙。当时，民众俱乐部为“普及民众抗战知识，紧张抗战情绪”创设抗战图书馆。一九三八年初向长沙市书业同业会征求各种抗战图书、画报、杂志，收到“借赠书刊甚多”于三月一日开馆。后因长沙吃紧，不到半年就停止了活动。

二、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兴办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进长沙，改组湖南省政府。为庆祝国民革命胜利和纪念孙中山先生，将原省教育会图书馆改名叫省立中山图书馆，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8月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将教育会图书馆改中山图书馆，第六次省财务委员会决议案中正式确认，仍沿用此名。

中山图书馆对湖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颇有一些建树：

（一）整编了藏书。一九二九年初馆长傅熊湘参照中外的一些图书分类法，自编了一个分类条目。据《钝安（傅的别号）先生行状》记载：“先生任事之始，辨向歆七略之制，兼收荀氏四部之旨，旁采杜威十进之法，设为十类，安置旧籍、容纳新书，中西贯通，条理毕见。”他用了三个月时间就架清检分类登记，用了五个月时间编成全馆分类目录十卷付印。为图书馆完成了一项巨大工程。

（二）充实了馆藏。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山图书馆请得省

教育厅拨三万元添购书籍，一面从藏书家叶德辉家里收购了叶氏所藏的大部分图书，一面登报向各界读者征求需购新书目录，买进了一批新书，大大充实了馆藏。

(三) 扩建了馆舍。图书增加了，原有书库和办公用房都不够用。省政府拨出一万一千多元，在中山堂近旁添建两层洋房一栋，后来又在长沙城东、西、南三处设分馆，图书馆开展活动的地盘增大了。

(四) 增多了读者。由于上述条件的改善，新添藏书适合读者的需要，加上实行夜间开馆，较过去便利读者阅览，读者人数骤增，至一九二九年六月前后，平均每日达五百多人次。

一九三〇年五月粵桂湘军阀开始大战于湖南。稍后，湘桂军阀再度开战。七月红军进攻长沙，傅熊湘出走。六月刘伯远接任。这期间图书馆被驻军糟塌得不可收拾。旧馆舍已经焚毁，藏书大多散失。待局势稳定后，湖南当局无力应付严重的财政困难，于是在同年八月强令撤销中山图书馆。一九三一年又图恢复，委黄济负责筹备，花一万四千元修理旧馆舍，花一万三千元向海内外征购九千多种中外图书。一九三二年九月重新开馆，一时出现兴旺气象。一九三三年以后，又因经费困难，业务每况愈下，主要从事仍保持一些古籍版本的整理工作，重刊了一些古籍，征集了部分地方志。藏书一万四千多册。采用了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建立了卡片式和书本式两种目录，到一九三六年藏书又有所增加，计有中文书十万册，西文书五千册。一九三八年三月，黄淑范任馆长后，“感于王云五氏分类法不足统括一切”，改采皮高品氏中西分类法，分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美术、文学、史地等十类，并将中西文书一律改为卡片编目；惟善本线装各书仍采用簿式目录，循四库经史子集分类编目。

同年十月，定王台旧馆舍被日机轰炸，全部藏书化为乌

有。于是停馆迁移，将古今中外珍贵图籍，中文书4201部，西文书2025部运沅陵。

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中山图书馆先后搬迁了五次，换了四个馆长（黄济、黄淑范、陈敬、周立松）。一九四〇年春尚存藏书中文一十二万七千九百六十三册，西文三千〇二十三册，图书杂志一十三万一千七百九十七册。

复员后的中山图书馆，工作并没有复原，虽然馆的组织机构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有所扩大，成立了采编部、阅览部、特藏部、研究辅导部和总务部，但是活动经费却严重短缺。政府只拨给业务费法币三百万元合新币金圆券恰好一元。能做什么呢？

此后，中山图书馆不得不自谋财路，被迫搞了一些邪门歪道，如把馆旁公地出租给私人等，但杯水车薪，仍然无济于事，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几乎陷入绝境；不得已向银行洽借周转金。银行明知是有借无还所以托词，“省行资力脆弱，目前属转失灵。”“实属心余力绌……故不能予以贷款。”予以拒绝。正在这“车到山前疑无路”的时候，幸好湖南获得解放，于是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三、省立图书馆的增设

在湖南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高潮中，省立图书馆增多了。除兴办中山图书馆之外，还恢复了湖南通俗图书馆。新建了南岳图书馆（后又改南岳正中图书馆）。

现将后面三个省立图书馆分别作简要介绍。

省立湖南通俗图书馆

湖南通俗图书馆藏书并不通俗，绝大部分是经史子集等类古旧图书，多年以来活动不多，时开时停。

主要是在湖南通俗教育馆领导下，采用了一些群众化的工

作方法。这在当时较能吸引读者：

(一) 增设图书阅览分处。全城合理部署，使各处读者能够就近阅读图书。除本馆图书室外，一九三一年在定王台设第一图书阅览分处。在市区校场坪和市郊岔路口分设第二、三图书阅览分处。分储全馆藏书五千六百四十五种，一万六千〇四十二册，为读者借阅提供了方便。

(二) 建立巡回书库。在城区东北和西南两路繁荣街巷设点，按月由书车司事到点上去，将巡回书库的书籍借给市民阅览。由于来往的人很多，就便看书的也不在少数。

(三) 添设流动书车，一九三三年由于巡回书库装书不多，经常供不应求，于是添设流动书车六辆，分别命名为：“载道”、“开益”、“扶雅”、“博闻”、“文运”、“知新”，每辆书车有一个司事，每天六车一齐出动，按日交换区域，巡回游行供人阅览，后来“载道”号书车被派到南岳去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机轰炸长沙市区，三个阅览分处都遭炸毁，图书九百四十种三千一百二十七册及书车二辆全付一炬，其它设备什物荡然无存。十一月，国民党政府放火烧长沙，又把它剩下来的一点产业烧成灰烬。

省立南岳图书馆

一九三二年初，湖南省政府仿照建设庐山办法，规划建设南岳。当时衡山人康和声与国民党省党部部分委员，以建设南岳应以文化建设为主，并提出“式绍先贤”、“藏书名山”等理由，以及利用南岳集贤书院旧址为馆舍等办法，请求建立南岳图书馆。九月，省政府拨出修建和购书费一万元，积极筹建。一九三三年七月，建成五楹两层楼房一栋，楼上作书库，楼下设阅览室和办公室，先后购置、征集图书一千八百多种、八千七百多册。八月二十四日正式开馆。

开馆那天，省政府主席何键亲自赶来主持开幕式，在开幕

式前先来个“先贤入祀典礼”，把唐宋以来曾在南岳读过书讲过学的著名学者，如李泌、韩愈、朱熹等人供奉在图书馆礼堂内，由何键主祭；然后再举行开幕仪式，何键说：“政府要在南岳设立图书馆，由于时局频年扰乱，实因人心太坏，学习研究缺乏正确思想”，“无先圣先贤之真理，贻害青年”，“南岳为先贤读书讲学之地，遗风犹存”，要“向先贤学习，以正人心”。因此，南岳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以收集国学古籍为主，以远绍先贤”。

从此，南岳图书馆年年从各地书局和私人藏书家手里选购国学古籍。根据头两年的统计，进书近千种，约三万多卷，其中大部分是清代武英殿藏书，还有不少明末清初刻本。同时也收集、整理出版《南岳名胜游记》和《王船山墨宝》之类的书籍。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省政府对这个图书馆和它的藏书比较关心，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还拨给它的图书保管费和购书费。它一直未遭到重大损失，抗战胜利后能够继续开馆。

省立南岳中正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曾先后在南岳举行过三次军事会议，抗战胜利后，湖南省主席王东原和参议会会议长赵恒惕等，借蒋介石六十岁生日，把南岳图书馆改为南岳中正图书馆，一九四七年六月南岳图书馆连同三万多借藏书，正式并入中正图书馆。同时国民党“国大代表”们也捐献出图书四万多册，其中有不少善本、珍本。

一九四七年七月，南岳中正图书馆成立，一九四八年二月新建馆舍全部落成，为宫殿式建筑，阅览楼两层，设八个阅览室；书库四层，可藏书百万册。同月迁入新馆开展活动。尽管它的名称变了，活动内容仍与原南岳图书馆一样，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四、私立图书馆的继起

私立南轩图书馆

长沙妙高峰有城南书院旧址，宋儒张南轩曾经在这里讲过学，一九二五年妙高峰中学举行十七周年校庆的时候，一些校友和学术团体认为：自宋以来，“虽院舍兴废无常，而讲学之流风未泯”，发起在妙高峰上建立南轩图书馆，以纪念张南轩。经过一年多募款筹建，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建成一栋约七十平方米的楼房。除接管妙高峰中学全部藏书外，又添置了一些图书。十月十日正式对外开放。马日事变前，政府封闭了妙高峰中学，由省立高中接管了南轩图书馆。事变后，省政府即行复校复馆。

从一九二九年起南轩图书馆先后购置了《万有文库》、《四部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续集》、《大英百科全书》以及几十种县志、族谱，还有一百四十多种杂志，一九三六年共有藏书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种，二万九千七百九十六，册采用王氏分类法，编辑了《馆藏图书目录》。当时藏书仅次于省立中山图书馆，馆务也较活跃。另外辟有杂志阅览室，民众阅览室，增设了巡回书库，并编印了《南轩图书馆》专号，介绍馆务活动。一九三六年接待读者二十八万人次，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它随妙高峰中学辗转流徙，仍未停止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南轩图书馆仍旧受到政府教育当局的重视，拨款重建馆舍。一九四七年妙高峰中学举行建校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补行开馆典礼。但常年经费严重不足（年支一千余万元，而政府津贴仅二万余元），经图书馆多方努力，才勉强拖到一九四九年湖南和平解放。

私立都梁图书馆

都梁图书馆建立于一九四〇年。当时，日本侵略军进逼湖

南，不少学校内迁武冈。曾在省教育厅任职多年的周调阳，拿出自己的藏书六千多册和储蓄三千多银元，在武冈开办了都梁图书馆。后又得到教育当局和当地士绅的支持，修建了新馆舍。一九四四年新馆开放，受到当地读者的欢迎。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通令嘉奖，后来战火蔓延湘南，馆舍长期被国民党军队占用，图书什物的损失，“约在一亿元以上”，活动被迫暂停。

抗日战争胜利，该馆筹备复员，一九四六年秋在武冈重新开馆，一九四七年尚有藏书一万二千八百册。

私立湖南青年图书馆

一九三九年由三名主义青年团长沙区团部主任等人发起，在长沙南正街兴业银行旧址开设湖南青年图书馆，馆内组织设文书、会计、事务、管理、阅览、代售、征募、调查、编辑、指导十课，另有董事三十人，大都为国民党、三青团及政府机关的主管人，青年图书馆开放后，为青年读者免费介绍读物，代购书籍，设立“青年问坛”，负责解答各种问题，还设“集贤箱”欢迎阅众贡献意见，备“题名录”，书写贡献意见有特殊价值者的姓名，留馆纪念，办“文字姻缘”栏，出谜语、对联，诗钟、科学等题目，每周悬赏一次，让群众对答。

一九三九年兰田曾一度成为湖南教育之中心。青年图书馆也迁往兰田，在该处活动了六年多，几乎把个图书馆办成了三青团活动的中心。

一九四六年，青年图书馆从兰田复员回长沙，仅有藏书二千来册，报纸五种，已是气息奄奄了。

私立松坡图书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邵阳蔡松坡纪念会发起筹办松坡图书馆。花半年工夫，找定了馆舍，购买了部分图书、家俱。正待开放，日本侵略军攻陷邵阳，松坡图书馆成了日本军营，全

设备和书籍损失殆尽。抗日战争胜利后，松坡图书馆的董事们认为，地方文化事业不可因被毁而停顿。经他们几个月的筹建，一九四六年又恢复开馆了。据这年五月统计，它有藏书一万多册，报纸三十多种，杂志六十多种。一九四七年藏书增至一万三千二百册，增设了研究辅导组，举办了英语讲习班和语文讲座等活动。

私立之谟图书馆

一九四七年，长沙私立广益中学为了纪念该校创始人、革命先烈禹之谟先生，在学校内建立之谟图书馆。十二月开馆。开馆的时候，校董和教师都勉励同学们要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好好利用图书馆的藏书，以充实自己的学问，将来为国家出力。但由于它的规模太小，主要读者是本校师生，在社会上影响不大。时过境迁，后来竟成了学校的图书室。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修改于长沙

解放前的长沙图书业概况

吴 起 鹤 *

长沙市有书店，始于思益书局，约在一八八六年，为清政府所创办的。局址设于定王台。自前清以来遗留的木刻版，均藏于此。各书店需要印书时，即向该局租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文夕大火”付之一炬，实为书业界一个重大的损失。自一八八六年创办思益书局起，至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止，整整有六十年的历史。

书店的经营范围，大致可分为八个类型：（一）以经营木版书、石印书和标点书为主要业务；（二）以经营教科书和各种参考书籍为主要业务；（三）以经销文艺书籍和人文科学书籍为主要业务；（四）以经销文具为主兼售书籍；（五）以经销书籍为主兼售文具；（六）以经销军事书为主要业务；（七）以经销各种杂志为主要业务；（八）以经销儿童读物为主要业务。第一类书店，人们称它为旧书店；第二类书店，人们称它为新书店；第三类书店，人们称它为进步书店。

长沙市图书业所辖的书店，计有一百一十八家，分属上述八个类型。不过有因时局的变化和业务的发展，由甲类型转变为乙类型，或由乙类型转变为丙类型，所以也难确定它属于那个类型。

*吴起鹤建国前系长沙湘芬书店经理，建国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已故。

各种类型的书店，就其资本来源来说，有独资的，有合股的；就其业务性质来说，有出版的，有经销的；就所属地域来说，有本帮的，有外帮的。这将在各个书店名下分别说明，或在某个类型概括说明。本文系以书业的发展为主线写的。对于有历史意义或代表性的书店，写得较详；对于开设时间短促，或类似摊贩的书店，仅介绍一个大概；或者只提一下它的牌号。

这里首先把图书业的公会简单地介绍一下，然后分述各种类型的书店。

关于书业公会，原有两个组织，一叫“书业装订业公会”，一叫“书业印刷业公会”。到一九一五年，始合而为一，叫“书业公会”。湘芬书局于一九二八年一月才参加公会。一九三一年，书业公会改选，笔者曾当选理事之一，公推韦兰生为理事长。是时，文具业亦包括在图书业之内，因此，更名为“图书文具业同业公会”。其组织章程，设理事九人，监事三人，五年改选一次。工会无固定会址，常假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或集美堂开会。予倡议募捐，在新安巷口靠府正街处建筑会址。一九三五年，工会应例行改选，人事大抵依旧。一九四〇年，时值“文夕大火”之后，商务印书馆迁于邵阳，韦理事长也到邵阳去了，又值改选之期，改选结果，由陈士荣任理事长。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再次改选，再推韦兰生任理事长，其余人选无多变更，予仍联任理事。是时新安巷口会址，已于“文夕”毁于大火。予又倡议再行募捐，于府后街二十四号另建新会址。一九五〇年，长沙解放后不久，公会再次改选，进了一批新人，公推学习书店经理向具罗任理事长，聘韦兰生当顾问，予得摆脱理事职务。嗣后关于书业公会的活动情况，我就知道了。下面我再叙述各类书店的情况。

属于第一类型的书店，计有五十二家，有本帮的也有外帮

的。本帮书店以经营木版线装书为主要业务，兼营装订、修补和经销字画碑帖，并收买古今书籍，或者向思益书局租翻版印少量的书出售，大抵系独资经营和分销性质。外帮书店规模较大，多自营出版，由石印发展到铅印，再发展到纸型板，多系集资而成，资本也较雄厚。兹就发展的具体过程分述如下。

以经销木板、石印、标点书为主的书店

继思益书局而起的，有翰墨园书局、博文书局、蕴古斋书局和谦善书局四家；随后又有集古书局。翰墨园书局的创办人叫谭有道，博文书局的创办人叫魏芝阶，蕴古斋书局的创办人叫柳经玉，谦善书局的创办人叫谭仁德。这四家书店都创办于前清末年。集古书局创办于民国初年，创办人叫李少先。这些人对版本学有些研究。因为对宋、元、明、清各种版本，必须有师传，才能辨别；而且要具有装订、修补的技术。他们掌握的技术，实行代代相传。谭有道传授于谭厚坤，是为文善书局，地点在玉泉街；由谭厚坤再传于谭俊德，是为大雅书局，地点在南阳街。魏芝阶传授于魏鹤轩，是为广文书局，地点在府正街；魏鹤轩再传于苏时松，是为益雅书局，地点在老照壁。柳经玉传授于何德华、宋定安两人，一个开广雅书局，一个开经顺书局，地点均在府正街。谭仁德传授于赵善臣、贺玉阶两人，师兄师弟夥开古今书局，地点也在府正街。李少先传授于张剑秋，是为万卷图书局，地点在府正街；张剑秋再传于黄玉成，是为兴昌书店，地点亦在府正街。以上各书店除集古、大雅、益雅、经顺、古今五家，于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归并于古旧书店外，其余各家均于解放前后自动结束了。并入古旧书店的，还有文成、东善、富有、维新四家。只有益雅一家，因在解放后，由第一类型的书店，转变为第三类型的书店，得并入新华书店。此外进化、广智、集成、唐益雅、祥雅、文雅、

光、祥顺阁、国华、益友、楚宝、文远、晋大、正谊、有善、楚善、经济、思文斋、温古斋、守诚堂、南台实、杜樊川、成化、新民等二十四家，大抵集中于玉泉街一带。南正街还有吴三让堂，采用宝庆版和自刻木版印书，是旧书店中规模较大的。太平街有三益，西长街有大成，北正街有瑞文，三家规模都较小。以上各家书店，除进化书店的赵志庭，广智书店的余东初，集成书局的蔡桂煦已转营他业外，概于“文夕大火”后宣告结束。

外帮旧书店在长沙的仅有五家：（一）广益书局。经理为冯鹤萍，继任张葆臣。（二）锦章书局。经理为陈仕卿，继任胡宗尧。（三）鸿文书局。经理为朱舜臣。（四）春明书店。经理为樊建序。（五）崇正书局。经理为胡宗尧。以上五家书店，除崇正书局外，都是由上海分设而来的，是集股组成的，是旧书业的出版家。五家中以广益书局资本最雄厚，出的书最多；不过多是一些侠义小说和宣传迷信的书，说不上对文化有什么贡献。经、史、子、集等类古籍也出了好几种，可惜错字太多，不免贻误读者。锦章、鸿文、春明三家所出的书，大抵与广益书局相类似，都是把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增注标点，叫“标点书”。这些书店，以广益开设最早，约在一九一二年就开办了，局址设在府正街。其次为锦章和鸿文，均设于南阳街。它们三家均因“文夕”一炬，宣告结束。春明和崇正两家，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办的，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一并于区办的文艺印刷局，一并于人民印刷厂。

以经销教科书、参考书为主的书店

这类书店共计十六家，也有本帮、外帮之分，本帮七家，外帮九家。本帮书店，多系本省的教育员创办的，资本微薄，只印行初中教本两三种至二十余种。外帮书店多由上海总书店分

设而来，资本雄厚，居垄断地位。各家发展情况分述如下：

集益书社：是一九〇〇年开办的，社址原设于柑子园，创办人为陈子辉，系独资经营。销售《新民丛报》、《天演论》、《达尔文进化论》等书，均由日本寄来（因陈子辉原系留学日本）。后迁府正街，更名为群益图书公司，从事书籍出版。所出英文书籍，有《纳氏英文文法》、《英华合解英文辞典》等书；关于数学方面的，有算术、代数、三角、几何教本和各种题解。陈子辉逝世后，由侯某负责经营，恢复群益书社原名。以后没有继续出版书籍，而以出售信纸、信封和文具为主要业务。一九三八年“文夕大火”损失极巨，因而歇业。

宏文编译社：社址原在黄泥堰余尧瞿公馆，后迁浏阳门正街李星沅公馆。创办人为李达章（长沙“四付担子”之一）之弟李实一。此人对于文化事业颇有雄心，自设印刷局从事书籍出版。他聘请湘省名流编辑教本，以黎锦熙为主编，徐特立、方维夏、杨怀中、刘宗向、刘汉良和黄锡卣为编辑员。编有四种教科书：一、初中国文读本，由刘宗向、刘汉良合编；二、农业教科书，由方维夏编辑，第一师范曾采作教本；三、小学教科书，由徐特立和黄锡卣合编；四、师范教科书——教育史、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由杨怀中编辑，第一师范曾采作讲义，尚未正式出版。此外还出了一种杂志，叫《公言杂志》，仅出两期就停刊了。这个编译社创始于一九一五年春，至一九一九年冬，因资金缺乏，宣告停业。开设期间虽短，实为湖南文化的先锋。杨怀中的眷属曾住在社内，毛泽东也经常往来于此。

琴庄书店：系化学教师赵东樵所办，发行有《初中化学》、《初中物理》、《理化问题详解》三种书。《理化问题详解》一书，最为畅销，销数达十余万册，获利甚巨。该店初

于南阳街，规模甚小。光复后，迁于黄兴北路，自建西式门面，自制理化仪器和药品，更名琴庄仪器馆，营业极为发达，赵遂因此成为巨富。解放后，与缤缤书店联营，即后来的长沙仪表厂。

宇宙书局：前身为兰田书报消费合作社。成立于一九三九年，由梁尚彝任经理。一九四四年，改组为宇宙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由张有晋任董事长，梁志超任经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迁于长沙府正街，自建门面，并附设印刷厂，规模更加扩大了。在梁尚彝任内，印行有《冰莹创作选》、《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外历史教学挂图》、《英文文法捷径》等书，和其他自编自印的书籍，共达数十种，并出版中学生读物《学与思半月刊》，远销西南各省。在梁志超任内，又敦请黄子通教授担任编译所顾问，编印师范教科书一套，中学生与小学生补充教材数十种，《国民知识小丛书》二百册。除继续发行《学与思半月刊》外，还发行小学生读物《儿童半月刊》。该局对于文化的沟通和普及，曾起过较大的作用。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和平解放，书局随之结束，前后刚刚十年。

欧亚图书社：原设于兰田，光复后，迁于长沙老照壁。创办人为湘乡彭锦华。他自学了一种拓印术，用来翻印商务、中华、世界各家畅销的教科书，以供兰田各中学之需，虽属违法行为，但对救济书荒起了一些作用。迁长沙后，商务、中华、世界各家，对他监视极严，不能再遂其伎俩，因此营业不振。解放后，上海某印刷厂聘他当技术教师，传授拓印技术，遂自行结束书社，到上海去了。

学余编印社：创立于一九四六年，社址设于营盘街，系物理教员黄培心创办的。发行有《实用初中物理》和《实用初中化学》两书，系与赵东樵合编，后因意见不合，遂分道扬镳，各自成立一家书店，继续印销两书，到一九五〇年，两书

均已销完，书店就结束了。

丰分馆：创立于一九四六年，馆址设于织机街，系新建的石库门面，把“丰分馆”三字做成堆字，安在石库门上面，门里面陈列一个写字台和一张太师椅，两弯各置一条长凳，却未陈列一本书。这个冬烘式的书店，系长沙有名的生物教员曹非所开设的。我曾问他“丰分馆”三字的来由，他说：“我把‘非’字拆开，岂不是成了两个‘丰’字吗？因此还闹过一个笑话：有一天，我坐在里面椅子上，竟来了许多人请我看相、算命，令我啼笑皆非。”该馆发行《初中生理卫生》、《初中植物学》、《初中动物学》三种教科书，均系曹自己编写的。他除了编书以外兼课甚多。他的学生教这门课的亦不少。因此，各学校采用他所编的书甚为普遍。丰分馆刚办了两年，他就因病歇业，旋即去世。

中南印书馆：馆址设于蔡锷中路，系一班印刷业同人为嫉妒湘芬书局而成立的，专门从事翻印湘芬出版之书。经理为刘士安，宁乡人。聘李友梅当编辑，把湘芬出版之书，稍加更改，作为本版。当时，湘芬采用廉价倾销方法，与之竞争，致使它所印行的书销不出去。只办了两年，即告歇业。后来，它所出版的书，湘芬按印刷成本，把它尽数收回。

商务印书馆：约在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由上海分设面来，正式名称叫上海商务印书馆长沙分馆。馆址原设红牌楼牛角巷对面，后迁于南门口，自建西式三层门面两处，都在南正街，即现在的黄兴南路。首任经理为万亮卿，继之为金松龄、韦兰生、李少田。它所出版的书，自儿童读本到大学各科的教科书都有。长沙各中学采用的教本，多为该馆所出，其中以理、数书销行最畅。词书方面有《辞源》这部巨著，杂志方面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数种，还影印了《四部丛刊》，编印了《万有文库》两部大部头丛书。商务出版的书

数量之多，当时在国内首屈一指。解放后一度并入中国图书公司，仍保留其编辑部，以后又恢复馆名。该馆一直保存至今，作为一个重要的编译出版单位，为我国文化事业贡献力量；各地分馆则都并入新华书店，专司发行业务。

中华书局：一九一二年由上海总局来长沙开设分店。最初设在白马巷振兴旅社内，后迁于新坡子横街，最后在府正街自建三层的西式门面，建成不久，即遭“文夕大火”焚毁，墙壁仍旧存在，因恐屋基不稳，修复时又改矮一层。首任经理为王衡甫，继之为程润之，末任为沈松茂。该局出版的书，自小学教科书起，至大学教本止，比较完备。在长沙，以高初中史地教本最为畅销，次之为《初中生理卫生》、《初中植物学》、《初中动物学》等书。后来长沙的生物教员曹非也编印了这几种书，使中华出版的上面三种书，销路大受影响。中华翻印的古籍，有《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辞书类有《辞海》，可与商务出版的《辞源》相媲美。解放后并入中国图书公司，以后又归并新华书店。

世界书局：一九二二年由上海总店分设而来。局址设于南阳街。首任经理为周伯钧，继任为翁稚棠。它所出版的书，有从初小至高中的教科书；高中教本以朱、吴二氏的《化学》最为行销，初中教本以《世界英语》和《进步英语》的销路最广。小学教科书，内容新颖，驾乎“商务”、“中华”之上；它们两家曾想联合起来打倒它，也未能如愿。词书一类，也出版有《词林》一种，但与商务的《辞源》和中华的《辞海》比较起来，则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了。古典文学书籍也印行了多种，但纸张粗糙，错字百出，质量之低劣与坊间的“标点书”相差无几。其余各种参考书，也无一种出色的。解放后，因该局有大批官僚资本，被政府没收，因而歇业。长沙分局，自开张至结束，计有二十七年的历史。

大东书局：系一九二九年由上海总店分设而来。局址亦设于南阳街。其经理自始至终为俞逸仙。它所出版的书，中学教本只有初中算术和初中国语等二三种。小学教本出齐了，但没有多大销路。它还出版了几种翻译小说，质量都不高。其余尽是一些侠义神怪小说，内容还不及“标点书”。该局名为书店，在上海却以经营印刷为主，在长沙则以卖文具为主。解放后政府没收了其中的官僚资本，该局随即停业。从开办到结束，也有二十年的历史。

开明书店：也是上海开明书店的分店，是一九三一年开办的。店址原设于南阳街。开始由浏阳人谭品祺特约承办，不到一年，上海总店即派人接收。首任经理张孚白任职刚六个月，即被更换，改任李涌邨为经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文夕大火”时店房付之一炬。一九四五年总店又改任刘甫琴为经理，先在桂花井成立临时办事处，继在府正街建筑西式门面，一九四六年九月新屋落成才正式开张营业。该店最初出版之书，为夏丏尊、叶圣陶、茅盾、巴金一班进步人士所编辑的文艺书籍；又发行一种《中学生》杂志和多种参考书，内容渊博、实用，销数在商务、中华两家出版的同类书籍之上。辞书方面，发行了一部《辞通》，可与商务的《辞源》、中华的《辞海》并驾齐驱；古籍方面出有《廿五史》和《新元史》单行本。教科书方面，出了一整套小学教科书和高初中教本。高中教本以罗元鲲所编的《高中本国史》最为畅销，初中教本以林语堂的《开明英语读本》为最佳，超过了世界书局出版的《进步英语》。大学用书也出了好几种。还出了《植物图监》，要算一部最精彩的生物学参考书。开明书店虽然创办的时间较晚，但就其出版物的方向和质量而言，在上海五大书店中，要算后来居上了。一九四八年，刘甫琴调往台湾，改任孟伯泉为经理。解放后，与商务、中华两家并入中国图书公司，以后，再并入新华书店。自开办

起至公私合营并店止，有二十余年的历史。

正中书局：总店设在南京，为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所创办，是唯一的国民党官办的书店。该局所编高初中教本都已出齐，却没有小学教科书。于是假国民党教育部所编的“国订本”小学教科书作为该局的版本，成立由该局居垄断地位的所谓“七联”（详下文），企图借此打倒上海五大书店出版的小学教科书。该局于一九三七年在长沙成立分局，佃府正街某号为局址，是时局面尚小。文夕大火后迁于衡阳，一九四五年十月仍迁回长沙，在府正街自行新建铺面。经理为杨志恩，他的姐夫朱经农曾在湖南任过教育厅长，此时任教育部次长。他利用朱的政治力量推销教科书。湖南各中学如果不采用正中出版的教本，政府即借故停发该校的教育经费或津贴。各中学只好一律采用正中出版的公民课本。有个别中学为了讨好，还多采用了几种。解放后该书店被人民政府接管，经理杨志恩逃到台湾去了。该店在长沙市仅有十二年的历史。

文通书局：总店设在贵阳，总经理叫华问渠，是一个著名的茅台酒商，面积资甚巨，拿出一部分来经营文化事业，在贵阳市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印刷厂和一个书店，叫文通书局，在上海、南京都成立了分店，为正中书局的“七联”单位之一。一九四六年，华派他的胞侄（忘其名）在长沙市开设分店，店址原在府正街湘芬书局的斜对面，除陈列一些该局自出的几种簿记、书籍和“国订本”小学教科书外，尽是一些瓦瓶装的茅台酒。刚开了半年迁移到走马楼，向正中书局批进大批书籍陈列起来，也俨然象一个书店了。解放后，总店被人民政府接管，分店也随之自动结束。在长沙市仅有短短三年的历史。

会文堂书局：总店设于上海，总经理为徐宝鲁，长沙分店经理为上海人钱某（忘其名）。该局以发行法律书籍为主要业务。是时长沙私人开设的法政学校甚多，如群治法政大学、达

材法政学校等都是。这些学校都要向该店购买教本。一般当律师的也要向它购买法律书，如“六法全书”和各种单行本，以及国民党政府所颁布的“宪法”等等。该店在长沙开设期间较早，仅后于中华书局。一九三八年因“文夕大火”损失甚巨而歇业。嗣后没有复业。

龙门书店：总店设于上海。长沙分店是一九四九年开办的。经理严济慈，系一女性。她择府正街自建门面，以销售翻印的外文书籍为主要业务，附带销售仪器文具。开业不久，长沙即告解放，她便结束业务，回上海去了。

“七联”，即由正中、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文通七家组成的一个联营机构，不能称为书店。一九四三年成立于衡阳，一九四八年迁来长沙，在商务印书馆内办公。由涂传杰、吴启农二人负责。在该组织中，正中居领导地位，所占股份最多，商务、中华次之，开明、大东又次之，文通最少。该组织以印行“国订本”小学教科书为主要的业务，制有纸型，分由长沙各印刷厂代印。那“国订本”小学教科书系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主编的，“七联”只负发行之责，曾与部里订立有约，不允许别家翻印。在沦陷时期，湘芬以救济后方的书荒为名，呈请湖南省教育厅转呈国民政府教育部，湖南方面所需教科书请求由湘芬书局代印发行，竟得到批准，使湘芬享有单独印行之权。日本投降后，“七联”和湘芬发生几场激烈的斗争，随后就散伙了。

以经销文艺和人文科学书籍为主的书店

属于第三类型的书店计十六家，大抵系湖南教育界中人所创办的，外帮书店仅有大公、生活、中西、三联四家。分述于下：

健康书社：社址设于储英园楚怡小学校门的前面。发起人为黄醒、袁绍仙、盛光学三人，黄系长沙有名的体育教员，

袁系无政府主义者，盛系新闻记者。该社最初以发行《体育周刊》为主要业务，故名健康书社。这个书社创办在文化书社之前的一九一五年，对文化书社有过经济上的援助，曾捐赠光洋五百元。一九二三年多次扩充迁于药王街，做出版生意，印行过《成人读本》一至三册和《初中算术》等书。到一九二四年再加扩充，迁于南阳街。此时有资金光洋二万元，系由袁绍仙一人垫出的。扩充后更名湖南印书馆，由袁绍仙负总责，黄醒为营业主任，盛光学为会计主任，另聘陈菱僧为会计经理，准备印行整套小学教科书。这个印书馆，我也参观过，在门面上陈列着许多鸟、兽、虫、鱼、草、木各种标本，宛如一个小型博物馆。只营业两年，便迁到上海去了。

文化书社：系毛泽东等于一九二〇年八月间创办的。最初的社址附设在潮宗街湘雅医学校的宿舍，仅有三间房子，由李岸、苏瑞章二人主持业务。由于业务的发展，该处房子不够，迁于贡院西街王润美南货号的隔壁。这个南货号有百多年的历史，在公私合营时，才改为长沙市糕点厂的厂址，即现在中山东路一九六号。隔壁一九四号现为长沙市建设路灯队占用的房子，即文化书社迁来后的社址。是时文化书社由易礼容任经理，营业员增到七人，除原有李岸、苏瑞章二人外，又加了刘岳一、肖光球（现名肖青野）、毛泽覃（毛泽东之弟）、刘大森、许文煊（易经球之妻）五人，此外，还有送报刊两人，炊事员一人。后来因此处房屋仍不够用，再搬到水风井口（即现在蔡锷北路新华书店所在地）。在开张那一天，顾客盈门，拥挤不堪。一九二六年，北伐师兴，苏瑞章等人为扩大宣传起见，带了很多的革命书籍和文艺书籍随北伐军到汉口，又成立了一个长江书店，等于文化书社的分店。长沙方面，只留李岸一、二人经营。他把留存的书，批给南华书社代销。“马日事变”后，社内所存什物货架等概被反革命分子捣毁，而李岸亦被杀害。

文化书社就这样结束了。

南华书社：社址设于荷花池，创办人为李耀星，岳云商科毕业生，与文化书社的易礼容、刘岳一等均为同学。因此，与文化书社往来甚密。李于一九二三年创立南华书社，经营宗旨与文化书社的大致相同，凡文化书社所有的书，它这里差不多都有，后来文化书社所遗下的书，它也一起承顶过来。所不同的是南华兼销商务、中华出版的教科书，并兼售各种文具。它还出版有各科常识问答，颇为畅销。当时共产党员柴克西常往来该店，替李耀星作军师，李亦常替他作通讯员。“马日事变”后，柴和李同被反动政府逮捕，柴虽自承为共产党员，却极力替李辩诬，所以李仅坐牢半年，终得释放出狱。李恐日后受牵累，毅然把铺子出顶。我因家兄起朋的介绍，当时不知其中内幕，贸然承顶了这个书店。李得到一笔现款，马上跑到上海，另开一个新声书店。

湘芬书局：这是我自己经营的一个企业，我想多说几句。一九二七年九月间，我以现光洋三千元承顶南华书社后，更名为湘芬书社。湖南过去有绡芬藏书楼，我把“绡”改为“湘”字，以名书社，盖取湘省的芬芳之义也。承顶南华之书，概系新文艺和人文科学书籍，其中还有不少文化书社的存书，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ABC》、《响导周刊》、《三民主义浅说》等，这些书还盖有文化书社的戳记。我又以现金三千元向上海北新书局购进大批文艺书籍，在春秋两季开学时，则经销商务、中华、世界各家出版的教科书，并配售各种文具。我的经营方针，取薄利主义，给学生们一个九五折扣（但遭到商务、世界、中华各家的指责，后改以赠品代之），因此生意特别好，远在南门外的妙高峰中学的学生也到我店购书。一九三〇年红军进长沙我店被查封，完全是出于误会，误以为柴克西之被杀，是南华书店老板举发的；又误以现在的湘芬，即是从前的

南华。这次损失，确亦不小。不久又因邻居失火，湘芬遭池鱼之殃，全部财物付之一炬，幸得店员刘让泉救出一口皮箱，尚藏有现金、自来水笔等，可值光洋二千余元。湘芬后来迁到北门外湘春街晴家巷对面一个新铺面营业。不到一年，那两次的损失，都全部收回来了。

一九三一年，湘芬书社由北门外湘春街迁到城内南阳街，改“社”为“局”，并在府后街成立一个印刷厂，叫长沙印务馆。湘芬书局除与上海北新书局、北平文化学社和苏州小说林书社订立特约合同经销它们出版的书籍外，自己也发行教本，计有钟月秋所编的《高中本国史》、李百葵所译的斯宾莱《高中物理》、李友梅所译的霍尔乃特《高中三角》、《三S平面几何》、《范氏大代数》等书，并委托长沙各中学国文教员代为选编《湘芬活页文选》印行。此外，如杨少岩所编的《初中代数学》，赵东樵、黄惟心所编的《初中物理》、《初中化学》，吴起明、曹非所编的《初中生理卫生》、《初中植物学》、《初中动物学》等书，都由湘芬经销。这时湘芬可算集中学各科教本的大成了，于是由第三类型的书店，转变为第二类型的书店。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国共二度合作，八路军在寿星街成立办事处，负责人王凌波将徐特立的讲演稿嘱我代印，王又函嘱延安新华书店寄来大批进步书籍交我翻印，以广宣传。湘芬曾先后印了《毛泽东自传》，《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八路军》等书数万册。一九三八年冬形势开始有所变化，王凌波为着保护这批书籍，嘱我迁地为良。我雇了六只民船作搬运之用。他又亲笔替我写了六面三角旗，盖了八路军办事处的钤记，作为“八路军运输船”。使我得以安全地把店内所有书籍和文具，运到宁乡县道林我自己家里，就在家设立湘芬书局办事处。一九三九年日军暂时停止南进，我又回到长沙，在府后街口设立湘芬书局总发行所，加紧印行“国订本”小学教科

书以供应后方各小学的需要。不到半年，敌人又继续进攻，我仍回到道林，在家里主持营业，借邮局分寄本省各地和西南各省。那时道林地方只有一个邮政代办所，由于湘芬生意的发达，使那个邮政代办所突升到二等邮局。与此同时，我又在安化乔口地方设立一个湘芬书局办事处，由贺益智替我主持。后来道林又告紧张，我就把办事处迁到常德。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马上把大批“国订本”小学教科书运到汉口，在汉口成立湘芬分局，同时在武昌成立支店。后来我把这两处的业务交与鄂人唐业建负责，自己回到长沙。这时常德办事处和乔口办事处的人已把该两处的存货运到府后街总发行所继续营业。这是湘芬书局的黄金时代。

一九四六年我在府正街购买地基，建筑一所新式门面。为着要和“七联”抗衡，于是增招新股，把湘芬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联合本帮书业和印刷业、纸业一共三十余家，在吉祥巷口成立“国订本”小学教科书联合发行所。这期间，湘芬与“七联”发生过几场激烈的斗争。在法律上“七联”斗不过湘芬，在资本上湘芬斗不过“七联”，“七联”既拥有雄厚的资本，又有国民党政府无限量地拨给西报纸。而我们所印的书概系剽报纸，相比之下，销路停滞，不久我们就把吉祥巷口的发行所自动撤销。又因决策不慎，印了一套“初中公民读本”，那时省政府教育厅规定各学校必须采用正中出版的《公民读本》，以致湘芬发行的《公民》全无销路；同时，印的一批师范参考书和中学生各科参考书，计有十余种，均销路不佳，使书局受损失很大。加以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不断贬值，湘芬就逐渐走下坡路了。

解放后，湘芬出版的理、数教本虽得全部销完，而所发行的“国订本”小学教科书和各种社会科学读本，以及各科问答等书，均成废纸，由天伦造纸厂收购作造纸的原料，共计三百余

石，仅得到旧人民币六百余万元（合现在的人民币六百余万元），我被迫于一九五一年四月间把湘芬书局的全部财产移交给职工掌管。至于汉口、武昌两处的业务，早已交与该两处的负责人，自己不再过问了。我只领到自己应得的工资三百余元，洁身而去。随后职工们把湘芬全部财产并入联大印刷厂，即现在的长沙印刷厂的前身。

泰东书局：创办人为张秉文，系合股经营，局址设于南阳街。经理为李德基，据说是一个共产党员。该局经售之书以上海泰东书局和太平洋书局出版的社会科学书和新文艺书为主，是继文化书社而起的进步书店。一九二八年被国民党省政府查封，经理李德基被逮捕，坐牢数月；所有店员均一度被看管，取得两家铺保才获释放。那封条上写着：“马日前，宣传赤化，传播是力；马日后，通同共匪，相与活动。”从这几句封条上的话看来，就可了解当日泰东书局的营业宗旨了。后经该局创办人张秉文向国民党行政院长谭延闿交涉，书店才得启封。又经过许多曲折，李经理始得恢复自由。他从此与泰东书局脱离关系。由苏庆生继任经理。因有前车之鉴，改以经营文具为主，把书籍一项作为次要业务。“文夕大火”损失甚巨，遂告结束。

民治书局：局址设于府正街，系伍菊农于一九二六年创办的，专从事翻印人文科学书籍，《如共产主义ABC》、《三民主义浅说》之类。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获利甚巨。该店虽然也是以营利为目的，但对进步思潮的宣传不无功劳，所以我把它列入进步书店。“马日事变”时店主恐遭查封、逮捕之祸，把那些进步书籍运到玉泉山庙内，连夜焚毁了。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国共第二次合作，他又从事翻印抗战书籍和人文科学书籍，不下十余种。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文夕大火”，不及运走，所有房屋、货架和存书全被焚毁。从此一蹶不振。旋即因病而死。

求知书店：原名茂林书店，设于南正街苏家巷口。创办人为徐汉卿。以收买旧书为业务。“文夕大火”所有存货付之一炬。光复后，由他的妹妹徐伟主持复业，更名求知书店，改以经营新文艺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为主。徐伟与中国书店孙阜民联系密切。一九四六年中秋夜国民党特务逮捕孙阜民时，也把她和她的哥哥徐汉卿一同捕去杀害。据云：“由特务用船装到洞庭湖投诸水中。”又一说是：“预挖土坑，夜里把他们三人活埋了。”后来这个书店，由她的弟弟徐立坚继续经营。解放后不久，徐立坚另有他就，遂自动结束了。

生活书店：总店设在上海，系“七君子”之一邹韬奋所创办的。一九三七年八月间，由上海总店设分店于长沙蔡锷中路，经理为严长庆。该店所销售的书籍，除本版书以外，凡是上海各书店所出进步书刊几乎都被搜罗来了，生意甚好，购书的人总是挤得水泄不通。一九三八年十月长沙告紧时，该店把所有书籍，仍旧运回上海，就宣告停业了。这个进步书店在长沙开设的时间仅有一年零两个月。

中国书店：经理孙阜民，原系世界书局的学徒，他于一九四六年在长沙创设这个书店，地址在辕门上，即现在的中山西路，系合伙性质。该店以推销上海各书店出版的新文艺书籍和进步刊物为主要业务；因孙是世界书局的学徒出身，世界出版的书籍经销亦多；并兼售文具。该店于是年夏天被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书记长陈士棻唆使喽啰捣毁，所存文具尚有三大包，由该店店员陈仲钢押运到陈士棻所开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后来这位店员即在该社服务。此中内幕，迄今还不明白。当该店被捣毁时，孙正在上海办货，有好友通信于他，劝他不要回长。他因为想把店务结束一下，还是回来了。又有人劝他逃往延安去，他迟疑不决，匿居在柑子园多福寺小学内，被特务侦悉，于中秋节的晚上，卒被国民党特务捕去杀害了。

金国书店：店址设于府正街，系向金声、曾国英夫妻所创办的，即以他俩的名字各取一字作为店名。最初经营印刷业，从一九四五年十月起才改营书业。该店以翻印别家的书为主要业务，也曾翻印过湘芬出版的书。因翻印袁湘生所编的“汉释英文法”，被袁控告，赔了一笔巨款。长沙解放前，为共产党印过一批宣传小册子被人揭发，书店被查封。他夫妻俩事先已得到风声，马上逃往衡山，幸免于难。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之启封，发还机件，搬到岳麓山，专替湖南大学印讲义，这个书店就是这样结束了。

兄弟书店：是地下党领导的一个传播新文化和革命思想的书店，经理邓晏如。（详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邓晏如《解放战争时期的长沙兄弟书店》一文——编者注）

大公书局：一九四六年开办。局址设于蔡锷中路。经理为郑励生。店员计有七人，内有四人系中共党员，即陈茂志、赵海明、陈明、武开沅。该店以经销上海三联书店、联营书店和《世界知识》杂志社的出版物为主要业务。一九五二年停业，财产售给新华书店。

求知书局：长沙市先后有两个求知书局，前一个求知书局已在上边讲过了。这个求知书局原设于安化桥头镇（现属涟源），系由龙良臣、龙良相、龙锡定、陈羽秋、李志道、谢伯渔等合股开设的，由龙良臣任经理。一九四六年，迁于长沙蔡锷中路，以经销进步书刊和文艺书籍为宗旨。一九四七年龙良臣往九龙经营求实出版社。这里的书店由其弟龙良相负责。于长沙解放前结束。

中西书店：店址设于蔡锷中路。一九四七年开办，主持人为翁玄修、郑雪春夫妇（都是浙江人）。主要业务为经销文艺书籍和医药书籍以及各种挂图，兼售文具。该店于一九四九年六月间在汉口购进一批革命书籍，刚运到店内尚未开包，被当局

查获，即于六月十三日派武装人员搜查，把翁玄修和一名职工捕去，关押二十多天，经书业公会联名保释出来。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由文建书店过渡，再并入新华书店。

学习书店：一九四八年开办。系合夥经营性质。店址设于蔡锷中路。经理为向兴罗是民主同盟成员。它所经销的书，以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为主。解放后，以经销新华书店的出版物为主。后来与新文、文文、中西、学生四家组织文建书店。一九五六年并入新华书店。

读者书店：经理为戴德嵩，系民主建国会成员。店址亦设于蔡锷中路。也是一九四九年开办的。它的营业宗旨，大致和学习书店相同，解放后，亦以经销新华书店的出版物为主。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新华书店。

三联书店：总店设于上海，系由新知、生活、读书出版社三家联合而成。它经销的书，以三家书店自己的出版物为主。长沙分店店址设于蔡锷北路水风井口，即文化书社的旧址。经理为李志国。这个书店是在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开办的。解放后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合并为中国图书公司。

以经销文具为主兼售书籍的书店

集美堂仪器图书馆：创于一九一五年。创办人为湖北冯鹤萍，经理为冯荫南。开始没有独立门面，在万福街（现在的五一马路）咸和栈内租几间房子营业，只做批发生意。最初向日本购进一批自来水笔、五彩图画和名人字画开张营业，后来又在上海正兴画片公司和华孚金笔厂进了一批精致画片和自来水笔加以充实。一九一七年在八角亭大盛绸庄隔壁另设广文书局门市部。一九一九年把批发部和门市部合并起来，迁到南阳街，再加以扩充，定名为集美堂仪器图书馆。特约经销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出版的《英文津逮》等书，代销商务、中华

两家出版的中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以及扫叶山房出版的经、史、子、集。文具方面：特约经销上海公盛油墨厂的五彩油墨和上海科学仪器馆的理化器械、药品、仪器，以及各种教育、体育用品，货色比较齐备。一九三八年“文夕大火”后，迁于衡阳，以后随着战事发展，又辗转迁移到独山，货物损失殆尽。在那个时期，印行过一部《国民大字典》，藉以度过难关。一九四五年复原回到长沙，在皇仓湾和平村复业。一九四九年迁于府正街，更名中南书店。一九五一年再迁南阳街，就原来废址建一个小门面，增加股友数人，改名新联文具社，经营手工业作坊以制作出售日记本为主要业务。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联入长沙印刷厂。前后有四十年的历史。

亚光书局：局址设于南阳街，与开明、湘芬两家铺面联在一起。创于一九三一年。经理为周天书。系独资经营，以经营体育器械、自来水笔和各种文具为主，附带经销北新书局出版的文艺书籍和亚新舆地学社出版的各种地图。一九三八年在“文夕大火”中损失极巨，以后就没有复业了。

缤缤书局：经理李培元，是书业中最善于经营的一个人。该店系李独资经营，原名缤缤文具社，创于一九三一年，设于中山东路又一村口的对面，以批发文具为主要业务，兼营一部分书籍。抗战时期，在府正街自建门面，更名缤缤书局，印行一批抗战书籍和各科问答。“文夕大火”后迁于常德，成立缤缤书局办事处，光复后回长沙，所建门面未遭焚毁，于是大加扩充，增设印刷部，自制纸型，印行大批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如《四书白话句解》等。到一九四九年又改变宗旨，把印刷机件售出，在上海购进大批文具，运到长沙时已临近解放，马上把整批文具运到贵阳，获利甚巨。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他和琴庄仪器馆联合为长沙仪表厂。

力行书店：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原设于南正街，即现在的

黄兴南路。经理为易嘉言。系独资经营。以经营文具为主，兼销世界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开张才几个月即遭“文夕大火”，受到极大的损失。光复后，在府正街和北正街各开一个铺面。不久又借钱在南阳街建筑铺面两栋，一作印刷厂，一作书店，把府正街和北正街两处的存货归并到南阳街新址，并在上海各同业处赊进近两万银元的文具，举行大廉价售出，得到一笔现款，偿还部分旧债，又赊进大批家俱。后来债主逼债，只好把两栋房屋抵偿。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长沙印刷厂。

文汇书局：一九三六年开办。局址设于老照壁。系合股性质。经理为成雨仓。以文具、体育器械、地图、挂图为主要业务，兼售一小部分文艺书籍。文夕大火后结束。

文文书局：创办于一九四五年。局址原设于南阳街。系文大浩、文雪樵两叔侄合伙开办的，叔任经理，侄任会计。它以地图、画片、日记本及各种文具为主要业务。书籍方面以翻印《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和《杂字》为主，批发给农村，大获收益。后迁于南阳街口。解放后，经销新华书店的出版物。一九五六年与学习、中西、新文、学生四家组织文建书店。旋即并入新华书店。

启明书店：创办于一九四五年。店址设于南阳街。创办人车鸿泉，江苏人。以经销上海启明书局的出版物为主，兼售文具。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华丰文具店。

群益书店：店址设于南阳街。系李耀星、张海珊两人于一九四六年合伙经营的，李即前南华书社的老板，张系上海群益书店的店员。书以上海新声书局出版的各科常识问答为主，文具有日记本及各种挂图、画片。解放后，以制造日记本为主要业务。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长沙印刷厂。

学生书店：一九四六年三月创办于蔡锷中路，是龙成云、龙

杨云、肖崇毅、黄梦兰等合伙组织的，龙成云任经理。以学生用品和文艺书籍为主要业务，一九四九年起兼营地图、挂图、年画等。一九五三年迁于府正街，更名学生文具社。一九五四年，又迁于五一广场。一九五五年和学习、中四、新文、文文四家合并为文建书店，作为新华书店的代销店。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新华书店。该店在长沙市经营的历史整整十年。

大中书店：书址设于蔡锷北路水风井口，创办人为任德明（中华书局的学徒出身），以经营文具为主，代销中华书局出版的书。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文化用品公司。

友联书店：店址设于府正街湘芬书局的对面。系合股性质，股东多为下江人。首任经理为蒋联卿。在他任内以经营文具、仪器、水彩颜料和油画颜料为主要业务，并经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继任经理为钱勇明。在他任内以批发文具、仪器为主要业务，兼营门市零售。该店创立于一九四六年，结束于一九五六年，整整经营十年。在公私合营时，并入纺织业。

以经销书籍为主兼售文具的书店

其中外帮书店六家，即陶冶、新时代、天下、昌文、启新和南方。

陶冶书社：社址设在三公祠（现在的蔡锷北路）。系商务的学徒万诵陶于一九二〇年办起来的，是夫妻商店，仅有学徒一名。经销的书以商务出版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为主，后兼销中华和世界出版的书，附售各种文具。一九二一年毁于火灾，赖商务的支援得以复业，改建店房于原店的对面。复业后兼销各种文艺书籍，以收入较丰，把所欠商务、中华、世界各家的书款都偿还清楚了。一九三八年“文夕大火”店房又付之一炬，资本损失殆尽，再无力复业，夫妻俩都回到湖北原籍教小学去了。

新时代书店：店址设于南正街商务印书馆的对面，系江西

人吴某开设的。开办的时间还在陶冶书社之前。吴也是商务出身，经销的书以商务出版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为主，兼售各种文具。每当商务未开店门前或关了店门后，他店里的生意特别好。在一九三八年“文夕大火”中受损失甚巨，歇业回江西去了。

国光书店：一九三五年六月开办，创办人为刘让泉。店址原设于府正街。以经销湘芬出版的书为主，兼营各种文具。一九三六年迁于中山东路二〇六号，除继续经销湘芬出版的书外，并代销上海新声书局出的《各科常识问答》，兼销上海各书店出版的“标点书”和少量的新文艺书籍，生意很好，颇有盈余。一九三八年“文夕大火”时，迁于宁乡道林通书湾。一九四五年九月回到长沙，在原地址自建门面，改以经营文具为主，兼销文艺书籍。解放后，经销新华书店出版的书。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联新文具店。

明明书店：创办于一九三八年。店址原设于中山东路又一村对面，后迁于怡和布庄旧址。是石岱观独资经营的。以销售进步刊物和文化书籍为主要业务。“文夕大火”后迁到宁乡道林下南圪。光复后回长沙，在南阳街自建门面扩充营业，以经销开明书店出版的书为主，兼销商务、中华、世界、湘芬各家出版之书，以及各种文具。解放后改营手工业以烫金为主，兼做日记本。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人民印刷厂。

新文书局：创办于一九三八年。局址设于南正街。是肖中秀、冯正中两人合伙经营的。聘章兰生为名誉经理。肖系商务出身，冯系中华出身，故以经销商务、中华两家出版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为主要业务。“文夕大火”后迁于安化桥头镇。加入一部分教育界的股份，改由张伯涛任经理。光复后迁回长沙，仍在原地营业。以经销地图、挂图、画片、油墨等为主要业务，兼售文艺书籍和各种进步刊物。解放后以销售新华书店出版的书为主。一九五五年与学生、学习、中西、文文四家合并为文建书

店。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新华书店。

湘芸书局：局址设于蔡锷中路。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办。以湘芬经理吴起鹤兼任经理，由吴淑琼、吴维新两人主持业务。以销售湘芬出版的参考书和上海各书店出版的新文艺书籍为主要业务，兼售各种文具。实际上等于湘芬书局的分店。一九三八年日军进逼，长沙吃紧时，该店把所有存书、文具退还湘芬，自行歇业了。

新中国书店：一九四七年成立。店址设于老照壁。经理李雨民，原是一个会计教员。所以会计簿记、统计各书为其主要业务，兼销各种新式簿记本及各种文具。长沙解放不久即自动结束，仍当会计教员去了。营业时间仅仅两年。

金城书店：创办于一九四六年。店址设于南正街。创办人刘丙炎，系商务出身。以经销商务出版的书为主，并销售各种文具。解放后自动结束，改营电影事业。自开业起至停业止刚刚三年。

天下书店：开办于一九四七年。店址设于南阳街。以经销地图、挂图、画片、油墨为主要业务，兼售各种文具。经理姚志鹏，上海人，该店系姚独资经营，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新华书店。

吕文书店：一九四七年开办。店址在万庆街。创办人黄咸臣，浙江人。以经销法律书和“标点书”为主，兼售各种文具。解放后参加新联文具社。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长沙印刷厂。

启新书局：一九四七年开办。局址在中山东路。创办人车仲英，江苏人，和启明书店的老板车鸿泉是兄弟。该店实际上只是一个书摊。销售的有“标点书”，也有文艺书和部分文具。刚刚做了两年即告停业。

南方书店：在临近解放时才开办的。设于先锋厅。店主吴

启农，上海人。该店以收买旧书为业，也出售部分文艺书籍。解放后经销新华书店出版的书。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新华书店。

业勤书店：开办于一九四七年。设于中山东路小吴门口。为周翰之子（忘其名）所开。他是一个残废军人，断了一只手。经销商务、中华、世界、湘芬各家出版的参考书，附售少量文具。开业不久周被别人谋害，书店就停业了。

亚新书局：一九四七年开业。设在蔡锷中路。店主刘梅村。经销的书很杂，新书有文艺书刊，旧书有“标点书”和各种版本的《杂字》，如《包举杂字》、《求真杂字》等。解放后改以经售文具为主。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百货公司的文具部。

以经销军事书籍为主的书店

军用图书社：一九二七年开办。原设于中山东路又一村口。系李国良和袁凉两人合办，郭先达任经理。该社由长沙起家，发展到南京，在南京设立总社。一九三八年，又在长沙南阳街设立分社。专售军事书籍如《步兵操典》、《炮兵操典》之类。“文夕大火”前几天，把所有书籍都运到桂林去了。

武学书局：约在一九二六年开办。设于白马巷振兴旅馆里面。只与部队直接联系，做整批生意，未设立门市部。据云系由云南军官学校毕业归来的某军官所创办。该局以印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所编《典范令》诸书为主要业务。

“文夕大火”后，就结束了。

拔提书店：总店设在南京，一九四六年在长沙蔡锷中路设立分店。经售的多系国民党中央训练总监所颁布的《典范令》和各种操典，以及各国的军事参考书，如《大战回忆录》等。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时被查封。

以经营杂志为主的书店

属于第七类型的书店，计有四家。

中国文化服务社：创于一九三六年。社址设在蔡锷中路。该社名义上由私人集股而成，据云每股仅光洋五元，实际上是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人为CC分子陈士棻。以经销杂志为主要业务，曾与国民党《中央周刊社》订立特约经销合同，该刊在湖南归它总经销。所售各种书刊政治倾向极为明显，都是替国民党作宣传的，如《西安半月记》、《伟大的蒋介石》等。

“文夕大火”时曾迁到耒阳。光复后回到长沙复业。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管。

青年书店：一九四六年开办。店址初设于清泰街，后迁到中山路怡和布庄旧址，系三青团创办的。政治倾向和经营方针完全与中国文化服务社相同。开办不到两年，即告结束了。

上海杂志公司：系上海总公司的分店。一九三七年开业。店址原设于蔡锷中路。“文夕大火”时宣告结束。一九四七年复业，迁于府正街湘芬书局隔壁。经理周玉书，上海人。营业范围除销售各种杂志外，兼售地图、挂图以及各种文艺书籍。解放后结束，把存书运到汉口去了。周玉书本人仍留长沙，转到百货公司工作。

金城杂志公司：一九三七年开办，也是从上海分来的。店址设于老照壁。经理为上海人张某（忘其名）。以经销各种杂志为主要业务，兼售自来水笔和挂图、仪器。“文夕大火”时结束，仍回上海去了。

以经销儿童读物为主的书店

这类书店计有两家，本帮、外帮各一。

上海儿童书店：总店设于上海，一九三八年在长沙府正街

设立分店。经营总店出版的书，均系幼儿园和小学生读物，如各种连环图和故事书。经理叫楼炜春，宁波人。该店开业不到一年，“文夕大火”后结束，仍回上海去了。

忠文书店，一九四五年九月开办。店址设于府正街。主持人邹河汉，原系《楚湘晚报》负责人。该店以经销儿童用书和通俗连环图为主要业务，并代销小学教科书。解放后，经销新华书店出版的书。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并入新华书店。

未设立门面的书店，只有一家，即武昌亚新地学社长沙分社：社址附设在二府坪长郡中学内。主持人为文士员，系亚新地学社的编绘人员，也是长沙有名的地理教员，在各中学任课甚多，附带经营地图生意。长沙各书店所经销的地图，多由他这里批发。他还经销欧化社的粉笔。这个社系他的老弟所创办的，所产的粉笔，软硬适中，长沙各学校大都乐于采用。他经营这两项生意，自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四九年止，整整有二十年的历史。

我所知道的湖南《大公报》*

张 平 子 **

湖南《大公报》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在长沙问世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停刊，经历了三十余年。这三十多年中，湖南政潮汹涌，政权几易，战乱频仍。《大公报》处此惊涛骇浪中，遭停刊处分九次之多，成员遭逮捕、系狱、审讯和逃亡次数更多，财产、书物、房屋被抢劫焚毁尤难估计。回首往事，痛定思痛。这就是我写作本文的原因。

湖南《大公报》创办 缘起与筹备经过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湖南高等学堂，文、理科学生三百余人适于此时毕业。“毕业即是失业”，在旧社会已习以为常。况且正当革命发生之际，旧政府已经崩溃，新政府虽已宣告成立，也无暇顾及学生的事。我们这班毕业生除少数有亲友可以攀附的外，都成了社会上的流浪儿。幸而从前在高等学堂当教务长的周震麟（号道腴，前清秀才，留学日本，老

*人民出版社影印本作“长沙《大公报》”。据本文所述，实应称湖南《大公报》。

**张平子，湘潭人，湖南《大公报》创办人之一，曾担任该报记者、编辑、社长等职三十余年。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已故。

同盟会员，与黄兴、宋教仁等俱为湖南革命领袖人物），其时方任筹饷局总办。他素来爱护学生，奖掖后进。我们甲班一班人中，由其介绍加入同盟会的几占三分之二。他所委任的各县筹饷专员差不多尽是我们的同学，只有我们四五个不肯就此职的人除外。我们几个人一日相约同往局处商量就业问题。周说：“你们既不愿做经理银钱的事，何不去办一日报。为革命宣传，为人民呼吁。以你们的才干和品德，我相信是可以办好的。果有此志，我当尽力支援。”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办报的志向乃由此决定。

在叙述《大公报》创办经过以前，不能不讲一下贝允昕和他主持的《湖南公报》。贝允昕，字无征，前清举人，少时与同县（浏阳）谭嗣同同学。谭殉难后，贝远走日本留学，习政治法律，学成归国，执律师业务于长沙市，并担任长沙律师公会会长。辛亥革命后，谭延闿督湘，任贝为司法司司长。贝力辞不就。谭改任其为第一法政学校监督，仅一学期即辞职。后被私立妙高峰中学举为校长，不久亦力辞而去。贝在湖南有“校长之长，律师之师”的尊称。其时谭延闿之宪政派创办《湖南公报》，慕贝之名，聘为社长。贝曾任湖南高等学堂法政教授，此次组织《湖南公报》班底，除经理部外，编辑部亦多任其学生。时正当周振麟任湖南筹饷局总办，他对地主、豪绅、官僚、资本家采取不妥协态度，强行派捐，毫不徇情减免，有捐谷至万石，捐银至一、二万元者，因此大招这些人的怨恨。《湖南公报》常著社论时评，支持周震麟，引起国民党人的不满，某晚组织数十人袭击《公报》编辑部，全体人员逃走，贝躲于帐后得以幸免。其时共和党来湘组织支部，宪政派人乃全体加入。共和党遂以《湖南公报》为其机关报，一切宣传品及新闻报道均送交该报，要求发表。编辑部除重要文件代为刊登外，其余一概拒绝，以此又引起该党的不满。一日，有名

易云龙者持该党公文一纸来谒贝社长，贝取视，系一通知，略谓：经本党干部会议议决，凡负本党宣传责任者，尤其是报社中人，应一律入党。贝未置可否。易去后，贝召集报社全体人员宣布通知。时经理部经理袁家元首先表示赞成（袁系宁乡人，曾毕业高等师范学堂，热中名利，得知袁世凯帝制自为，乃从其家中取出一部族谱邮寄北京，请与合谱，具函自称“族侄家元”为人耻笑）。但编辑部全体人员皆默不作声。旋即全体辞职以示反对。贝亦写一辞函，与大家同进退，并立时搬出报社。

我们为周震鳞先生所鼓舞，办报的兴趣未曾少衰。一日相约至贝宅聚议。贝对办报极表赞成。当即决定。一、自行出资办报，不依靠任何方面，以免受牵制不能自由发表言论。二、站在民众方面说话，不畏强暴。三、报社同人俱要以办报为终身职业，不能半途而废，尤其不能出去做官。贝先生听了频频点首，说道：“你们壮志可嘉。”他还谈到他的岳父刘星老（人熙）怀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向，抱有反帝、反袁的思想，对我们办报或可给予臂助。我等闻之大喜。次日即由贝介绍往见刘，陈述办报之事。得到刘的赞许，我等乃进行筹备。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刘星老。刘名人熙，浏阳人。系前清翰林，曾任广西兵备道，署理臬台，广西训练新兵是他一手主持的。蔡锷、蒋尊簋、陆荣廷等均为其部下，尤以陆荣廷对刘感恩深重。一九一一年刘与沈秉坤（当时任广西巡抚）王芝祥（当时任藩台）响应革命，宣布独立。终以手无军队，处境艰困，未几而相率辞职。刘辞职后返湘，寓居长沙市富雅里。

我们既决定办报，首先就要筹集资金。我们都出身于小康家庭，家中资财仅敷日常生活，实无余裕，经千方百计四处借贷，仅筹得五百元左右。即以此敷租佃房屋，购置家具。那

时，适遇一好机会，我们的同学易策勋（长沙人，高等学堂预科毕业）、好友金贡安（长沙人，北京大学商科毕业，建国后为湖南省参事室参事）均在省实业银行任职。某商人有一台二号平版印刷机，抵押借款于该行，无力还款取赎。我们乃商于易、金二人，请转商于行长曹训农以分期缴款，向其购买。曹与贝允昕有交情，一说即允。我们筹备办报的事遂粗有头绪了。

湖南《大公报》的组织与成员

筹备就绪以后，参加筹备的人员于一九一五年八月中旬集会，通过以下各案：

报纸定名：决定叫湖南《大公报》。因为我们本是《湖南公报》成员，现在更加恢宏光大，故于公报之上，加一“大”字。

报纸性质：决定为商办，以公司名义，向商会注册，向党部及政府立案，以示不依附政党、军人之意。

组织章程，主要内容如下：

本报设董事会，由本报创办人及聘请有关人士组织之。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董事若干人；必要时经董事会会议通过，得设名誉董事若干人。

董事会的职权：

（一）制定预算，审核决算。（二）审查各部计划及报告。（三）社长任用及辞退人员时，须与之商榷，征得其同意。（四）修订章程及办事细则。

报社设社长、副社长各一人共同主持对内对外一切事宜，但重大问题须与董事会商榷。社长下设编辑与经理二部，受社长指挥。编辑部设总编辑一人，副总编辑一人，以下设编辑、主笔、记者、通信员、译员若干人，均归正副总编辑指挥。经理部设

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一人，会计、庶务、采买、交际、工友若干人，归正副经理指挥。

组织机构确定后，第一件事就要解决印刷问题。当时军人横行，报纸若触犯他们，便有被封闭、掠夺的危险。为避免意外的损失，我们另外组织一个彰文（印刷）公司，招收外股，请别人出面主持，该公司除印报外，还对外营业。这个公司的股份当然以《大公报》最多，不过都是由个人署名，与报社不发生关系。如此果然收到了效果，张敬尧二次封闭大公报时，本想掠夺印刷机器，因查系商公司所有而未敢妄动；林修梅的兵抢劫大公报数次，报社同人的钱财衣物损失甚巨，公司亦未遭殃。

第二件事是安排各人的职务。当推举刘人熙为社长，贝允昕为副社长，李抱一为总编辑，张秋尘为副总编辑，龙兼公、张平子为主笔兼编辑，龚介眉为编辑，赵闲云为编辑兼译员，朱翥为总经理，李晋康为副总经理，其余如编辑部之校对，经理部之会计、庶务等皆临时聘请或雇用。创办人全为董事，后来又加聘左益斋、王聘莘、史春霖、李寿增诸人为董事。在报纸创刊之前，蔡锷自北京寄来五百元及祝词，我们即推举他为董事长。蔡回电以“军人不能以借报纸议论国政”坚辞。我们只好以其汇款作为股本，仍以刘人熙为董事长。

报社组成后，首先租赁犁头后街福建都督孙道仁公馆之侧屋为社址，后来由犁头后街迁至皇仓坪（现在的五一广场），又由皇仓坪迁至仓后街湘清里的湘乡试馆。三十多年来始终没有修建或购买一处房屋，作为固定社址。

湖南《大公报》主要成员之略历

湖南《大公报》成员的略历，正副社长刘人熙、贝允昕二

先生，前面已经述及，此处不赘。下面仅对其他成员作一简单介绍。

总编辑李抱一，名景侨、嗣循，笔名抱一、小知、盾等，以抱一为著，后遂以为号。生于新化大同镇一个小地主家庭。李氏聚族而居，其父时为族长，执掌公产，近于土豪，抱一亦受其影响。少时入大同镇学堂，后赴省考入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复升专科之文科，先后凡六年，于一九一一年毕业。即由贝允昕介绍为《湖南公报》主笔。《大公报》成立，公推为总编辑。他虽曾受周震鳞及其同乡邹价藩的影响，参加同盟会，但不敢有所动作。平日极好读书，常手不释卷，专习清代汉学，著作以考据为多。也曾作诗，但非所长，且深染儒家气习，尚孝悌，拘礼教。性固执而胆小。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发表过不少这类言论。

他曾一度请假离开报社，毛泽东等人就是这一段时间与大公报的张平子、龙兼公等往来的，马日事变时他已返社，反共甚力。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中国前夕，他离开报社久假不归，后死于新化老家。

副总编辑张秋尘，名廷实、笔名劲公，祖籍浙江绍兴。其父松年为有名刑幕，历任湘省各署幕僚甚久。秋尘兄弟随父来湘，遂入善化县籍。秋尘在前清考取秀才，后入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毕业于矿科。辛亥革命后唐支厦（湘乡人，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唐蟒（浏阳人，号桂良，唐才常之子，留日本学军事，参加同盟会）创办《军事日报》，邀秋尘任总编辑。同人中有与之同学的，知其有办报才能，故聘请相助。秋尘平日无甚主见，颇热衷于升官发财，不久谋得建设厅秘书及科长等职，但仍萦怀报社，直到出任某县县长后始与报社完全脱离关系。解放后，任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于一九六一年去世。

主笔龙兼公，湘潭人，名彝、号寿彝、笔名兼公。父系

穷书生，家为破落地主。少从其叔读书，性聪颖能文。后在省立第一法政学堂毕业。由张平子介绍入《湖南公报》，初任校对，后任编辑。其人性颇严峻，常读《韩非子》，为文立论精辟，风格近似韩非，惟才气不长。在毛泽东与大公报来往时，他常与毛接触。赵恒惕督湘期间，《大公报》曾倡导制宪运动，兼公作《省宪浅释》，在报上连载，后因赵杀害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诩而终止。其后毛泽东与之合作，共草《善选制宪建议书》名噪一时。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全市印刷工人在毛泽东领导下组织工会，工会向资方提出两条要求：（一）增加工薪。（二）提早发稿时间。未得资方同意，乃于二十五日全体罢工，迄十二月中旬，尚未解决。双方开会谈判，工方请毛泽东记录，资方由兼公记录，记录者有发言和表决权，辩论结果，兼公理屈词穷，终于尽依工方要求。各报十三日恢复出版。是日，李抱一作一时评，署名“盾”，题为：《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内有“我劝印刷工人以后千万要注意基本的学问。……为了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实验主义的牺牲，更非注意学问不可。有了相当的学问，然后可以免掉这种种弱点”。他在文内还“忠告从事劳工运动者，不要满足于罢工胜利和组织工作，结果只有助长工人嚣张习气，使社会增加不安宁。”第二天，即十二月十四日，《大公报》刊出了毛泽东执笔写的《印刷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指出这位记者是“穿起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接着说：现在社会上工人、农民和学生似乎是“被人教训者”。

“而长衣社会的先生们则是拿出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的教训人者”。文章指出：“工人并非不接受别人的教训，但是教训人者必须做到下面三点：一、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为我们的朋友。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

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这种在一个报纸上同时刊出意见完全相反的文章，有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答曰：“相反盖亦相成，此大公报之所以为大公报也。”兼公与抱一同样胆小，在“马日事变”以前几个月，即主张停办报纸，并先后出走。兼公节俭，善治家产，在报社每月薪水不过六十元，但能分寸累积，若干年后竟买田租百石，公馆一栋，大公报以此于十八年后，推举他为总经理。但终以报纸迭受打击，景况日非，他亦无所为，不几年即辞职归家，度其地主生活，仅在每年开董事会时，到报社住数日而已。

编辑龚介眉，名尔位，笔名零公，湘乡人。少时由湘乡县保送考入高等学堂预科，后升入文科专科，毕业于辛亥革命后。由同学罗尚宽（号伯苍，湘乡人，留学日本学经济，民国元年任湖南省银行行长。）委龚为金库科员，银行行长先后易十余人，龚均得留任。他读书甚多，擅诗，在《湖南公报》时，曾主编副刊。又善交际，与当时政界重要人物如文牧希（即文斐，醴陵人，留日同盟会员，入民国后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粤汉铁路湘段局长，并主持《长沙日报》），罗伯苍，唐支厦等交往甚密。《大公报》每多变故得其维护之力不少。后来《大公报》由盛变衰，零公始终未曾脱离。抗日战争中以老病回乡，死于家中。

总经理朱矫，号让枏，湘潭人。其父朱碧林为湘省藩台衙门小吏，积资在湘潭十四都购有田产，生子三人，矫居长。让枏少时与弟魁梧，俱考入湘潭中学。后其弟夭死。他复考入省高等学堂，由预科升文学专科毕业。民国元年为贝允听引入《湖南公报》。入《大公报》后，被推为总经理。张敬尧督湘时，湘人密组驱张会，朱矫任秘书长，奔走甚力。该会一切文电，多由《大公报》同人撰稿，由彰文公司印刷。赵恒惕主湘时，朱任省议会议员，发言和提案颇多维护人民利益。朱任《大公报》

经理终身，于一九二八年八月死于省寓。身后无以为继。

副总经理李晋康，名嵩岳，世居省城，籍属善化，生于小吏家庭。少入善化小学堂，继考入省立高等实业学堂，转入高等学堂文科毕业。由贝允昕荐为《湖南公报》编辑，后与同人创办《大公报》，奔走甚力，尤于经济上多所筹措，故被推为副总经理。他性情谦逊与总经理朱矫和衷共济。朱常外出交涉，赖他管理内部，井井有条。每当编辑部事忙时，则出面协助。又常为省议会记录。其文章颇为人所称道。朱矫死，他继任总经理。后一度入樵运局供职。从樵运局辞职后，仍任报社总经理。龙兼公善经营，关于社内经济事务晋康辄商于龙。在他任经理期间纸销数激增，广告业务发达。一有盈余，即悉行储蓄，并添置印刷机器，购买纸张以备用。一有亏损，便出其储蓄以资弥补，故始终无欠薪欠债的情形。

报社在动乱中多次受创，晋康艰苦筹划，得以度过难关。他与报纸相依为命，自始至终。很少离开。本文写作时犹在湘清里《大公报》最后所佃房屋中蛰居，年将八十，处境艰难。

湖南《大公报》的历程

《大公报》是一种大型对开日报。它的办报宗旨、主张表现在报纸的言论上。但这种表现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要从一贯和全面来看。以该报反对国民党来说，除索款、迎黎二事外，未见有其它反对文字。反对共产党，也是有时间性的，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不仅不反共，而且欢迎毛泽东等湖南共产党人在报上撰文；一九二八年以后，《大公报》开始攻击共产党，究其原因，除了受官方的压力以外，主要是由于我们

对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很不理解，且有抵触，特别是抱一恨共、兼公怕共所造成的。及抱一逝世，兼公退隐，报纸的政治倾向便有所改变了。如我们揽聘了共产党员张华莲等到报社工作，常将官电中“共匪”字样，改为“共军”，将“共产共妻”的诬蔑词句，予以删去，有时甚至有打倒资本主义、赞成阶级斗争的言论出现。至于反袁、反帝、反复辟、反军阀，反贪官污吏，反土豪劣绅，则一直是报纸的主流，现分述其大若如下。

一、《大公报》的第一天

（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

《大公报》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出版，社长刘人熙撰发刊词，以“贿赂”、“感情”、“浅识”、“听荧”四事相诫。副社长贝允昕撰宣言，略谓：“同人鉴于中国危机益迫，而国人俱巽懦阿谀，无有敢仗义执言，以唤醒迷梦而挽回颓运者，因奋袂而起，秉着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精神，以期唤起国人共赴患难，挽千钧于一发。自辛亥革命后，推倒五千年帝王专制，改建共和，此本是全国四万万人民之共同心愿，且经世界全体承认者也。乃未及四年，而一二拥有势力者，妄想窃窥神器，而少数攀附之徒，希图富贵，强奸民意，妄倡变更国体，国家危机莫有大于此者！本报当此惊涛骇浪中发行，虽日奋其螳臂，实冀唤醒睡狮，以遏彼凶残，还予旧物”。

编辑部同人复撰时评，题为《本报对于国体问题之主张》略谓：“夫以少数人之私意，遂欲假造民意以变更四万万人之心意，倾覆共和国体。姑无论其狂妄，即其举动，真谓狗彘不食也，本报暂当秉春秋之笔以诛之。”

编辑部复据各方面通讯，写成一则新闻专电，略谓：“京中及各方名人对筹安会均极力反对，该会中人极力招致无效，闻军界中人亦多不赞成，南方各省闻将联合以声罪致讨云云”。

以上各种言论，在当时均为全国各报所未有，亦不敢有，而《大公报》竟于创刊第一炮中同时施放出来。发行后阅者皆以为“涤得我心，欣喜欲狂。”同时又不免为报社同人惶恐，以为在袁世凯这样的专制魔王下面，敢触其逆鳞者，得不撻奇祸乎，孰知袁氏虽凶恶，但对湖南已鞭长莫及。这个问题在下面还要详说。

《大公报》既为社会人士所欢迎，销数激增，不一月即发行四、五千份，不数日即跃至万份。用大号平版机打制纸版，始能应付。

二、反袁驱汤中的《大公报》

（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六年七月）

汤芎铭以海军次长经袁世凯任为湖南宣抚使，入湘后，即以杀伐立威，首先逮捕谭延闿任内之财政司长杨德邻、警察局长文经纬、会计检查厅长易宗羲、筹饷局长伍任钧等杀之。对于报界也决不宽假。当时《长沙日报》、《国民日报》等报，在汤未履任时即行改组，社长、经理、总编辑等相率出走。汤到任后对各报一概予以封闭，且通缉其主持人。《大同日报》出版未久，亦遭封闭。独《大公报》反袁反帝比各报尤烈，竟予以优容，其原因之一盖为刘人熙之声望所慑也。另一原因则为汤督之兄化龙时居上海，也以反袁自命，他一方面交结驻沪湘绅如谭延闿等，一方面交结留省湘绅如刘人熙等，准备万一将来帝制不成时为其弟留一余地。他曾致函刘人熙略谓：“贵报义正辞严，全国钦仰。兹为代向两湖人士募集股款三千元，以襄盛举。”我们立即将他此函在报上刊出，使汤芎铭觉得《大公报》是乃兄所支持的，他又为何敢反对呢？

《大公报》副总编辑张秋尘之父张松年，时在汤督署充文

案。汤命吕其子秋尘入署，对他说：“汝报经费困难，我所素知，这里有三千元汝可拿去。但反对变更国体事以后不要再说！至于钱之来源你们以后当会知道的。”秋尘将支票拿回与同人商量，拟将反帝言论略为和缓。次日刘人熙到馆，同人以此事告之。刘笑着说：“此系殷款，当非贿鬻，我们不可因此而有所动摇。”同人乃受之，以之计入股份。

我曾写过《从清末到北伐军入湘前的湖南报界》一文，刊于《湖南文史资料》第二辑，也纪述了此事，但自己不无疑惑。后问于刘通叔（刘人熙之子），他说曾见汤化龙函。足证确有其事。

叶德辉（湘潭人，前清主事）与符定一（衡山人，北京大学毕业）二人为汤芾铭指定之省教育会正副会长。叶与我同为湘潭县人，其家藏书最多，他又长于版本校刊等学。我常向他借书，因此往来颇密。一日，叶与符于本市司门口之醉仙亭款宴汤芾铭的秘书长张跋公，邀我作陪。酒酣，叶对我说：“大公报文字典雅雄伟，足见君等皆为其才，但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天运所向君等已知，使能赞襄鸿业，则取青紫如拾芥，又何必批逆鳞，招奇祸呢。符副会长与君为同学，容后当细商。望能徇己见，共策进行。”张跋公从旁插话说：“奂老（叶号奂彬）金石之言，诸君当知所从。”我未答复，但狂饮而已。辞归后告之同人，共商对策。都说我们可以不置可否，委之刘、贝两社长可也。过几日，符定一来报馆与同人作长谈，我们均推说本报的主权在两社长。符乃快快而去。《大公报》的主张卒未稍变。时湘人杨度、胡瑛等在京组织筹安会，曾电促叶、符在湘活动，其秘电为《大公报》探得，乃予披露。叶、符均系湘筹安分会主要分子，以其事电告袁世凯谓帝制障碍在湘一隅。袁世凯大怒，即飭汤芾铭、沈金鉴（北京政府派来的湖南巡按使）严办。叶、符二人又以《大公报》曾揭露其隐

私，恨之入骨，遂假凌晓施等人名义分呈军、巡两署，请立将报馆封闭。这时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胜利消息频传，汤芑铭已持首鼠态度，仅令警察厅查办而已。警察厅长张树勋（长沙人，留日学生，曾加入同盟会）极力护持，乃告无事。

杨王鹏、龚铁铮均为湘乡人，同在日本留学加入民义社，并交叉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民义社的政治纲领中有“歼除国贼”一条。该社以杨勇敢，龚有智谋，因派二人回湘主持刺汤。二人于一九一六年二月抵长沙，寓于吉祥巷大吉祥旅社。龚铁铮与《大公报》编辑龚介眉为同宗兄弟，且系少时同学，常来报馆叙谈，介眉知其任务，劝其勿轻举妄动。铁铮笑答曰：“士各有志，况我等亦有所准备，未必不成，纵会失败牺牲，亦所甘愿。君不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殉难乎！”

汤芑铭对民党专以残杀为务，一经拘捕，不问首从，悉行枪决。其所任之军法处长华世羲即为一嗜血魔王。其部下鹰犬，网罗密布。杨、龚在大吉祥旅社之所为，为华所探悉。先是杨、龚已运动混成旅，相约二月二十八日联合进攻督署。适民义社李唐、金东舒等欲先炸汤芑铭，独树大功，他们伏于五堆子汤宅前以谋狙击，不意为侦探发党围捕，李、金以炸弹突掷，二人俱死。杨、龚以事机泄露，迫不及待，乃提前于二十一日下午四时部署进攻，以殷之辂率队突袭西区警署，夺取其枪枝，自领大队攻打督署。因两处俱有备，龚当场被格毙，杨受伤被俘。汤亲自审问，杨大骂不止，汤乃下令割其舌，剖其心，支解其体，其惨不忍睹。龚介眉欲收葬铁铮尸，商诸报社同人。刘社长以电话达汤督，先贺其免于危险，得平大乱，继曰：“威德已彰，何必任尸体久肆市朝，我拟与商民掩埋，清洗血迹，以美观瞻，此亦王者掩骼之仁政也。”得汤允诺。龚介眉乃购衣衾棺木殓之。自汤入湘起至离任止共杀全省党人及群众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余人，因此“汤屠夫”之名益著。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蔡锷潜赴云南，与唐继尧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大公报》首得其消息，即于报端公布，一时省城人民欢欣鼓舞。汤督商谕沈金鉴，传语警戒本报，我们未予置理。汤乃勒令报馆每日送稿检查，并订定检报办法七条。本报至此，只好将其检去者“开天窗”，且署“检查员删去数字。阅者皆能察之。

三、刘人熙督湘及谭延闿二次督湘时期的《大公报》

（一九一六年七月至一九一七年九月）

蔡锷在云南起义后，讨袁军事迅速发展，汤芾铭在湖南的统治已难于维持。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汤本应立即滚蛋，但他仍想恋职，延至七月四日晚始被迫出走。汤逃后，第二日，省城各界即推举《大公报》社长刘人熙为湖南督军。刘人熙鉴于当时政治环境，辞去《大公报》职务，同人等乃公推贝允昕继任社长。报纸言论，一如既往。

刘任湘督不及两月，黎元洪继袁世凯任总统，乃任命谭延闿为省长兼署督军。谭于八月二十日抵省，刘即于二十二日交替下野。这时，湖南处于南北争夺焦点，战事一触即发，一旦战端再起，势必重遭糜烂。本报因此主张全省上下同心同德，保境安民。所以发言记事，俱持谨慎态度。惟对当时国际、国内、省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本报未能缄默，都曾发表言论。如对北洋政府和湖南当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欲以湖南矿产抵押、交换借款一事，本报力持反对，及时揭露，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为反对张勋复辟，本报曾大造舆论；对长沙码头工人罢工，本报曾详细报道，表示支持；对省议会一些议员企图阻止通过省政府提交以中央政府发还的“粮盐公股”作扩充省银行之用的议案，本报曾著论加以抨击，中有“恐难免‘猪仔’之谓”一语，引起议员的很大反感，等等。

四、傅良佐督湘及张敬尧督湘时期的《大公报》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一九二〇年六月)

这一时期，南北军阀在湖南混战，湘民终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公报》在此风云激荡的时局中，频频受到摧残，处境极为危殆。仅在傅良佐治湘的短短两个多月中，就遭受过一次乱兵的洗劫，损失达五六千元之巨，几乎使报纸无法维持；一次被军队强行封闭，停刊多日。此类事件之发生，除军阀仇视报纸，纵部殃民之因素外，与黑社会势力之煽动串通，亦不无关系。因《大公报》鉴于当时环境，对省政难以置辞，一度以注意力转向社会调查，对黑社会有所揭露，引起他们的不满，于是串通军人，制造事端，惩罚报纸，以泄其愤。

傅良佐从一九一七年九月九日任湖南督军，至同年十一月十四被迫出走。傅离湘后，湖南一度成为南北军阀角逐的战场。一九一八年三月，北洋政府派张敬尧督湘。张系一介武夫，论官职仅为第七师师长，既无声望，又无战功，任命一经发表，即招致各方面的反对。加以他暴戾成性，对湖南人民施行残酷统治，激起湖南人民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终于在一九二〇年六月被赶出湖南。

张敬尧统治湖南时期，对新闻舆论的钳制，较之汤芗铭、傅良佐更为严厉。凡被检查删去的稿件一律不准“开天窗”。

《大公报》曾联合其它报纸与之力争。不仅不予置理，而且对报界更加仇视。为了团结一致，争取合法权利，省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青年会及报界等团体发起组织工团联合会，推举《大公报》总经理朱矫为秘书长。公团联合会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解散新国会、查办安福系等事，向全国发出通电。张敬尧初以为是省外事，未加注意，而致全力于省议会选举。公团以为南北未统一，湖南亦未统一，极力反对选举，

拟发一文告，又怕被检查删去，乃作广告登出。岂料广告刚刊出，是夜警察厅即奉张命派警察数十人至本报，抓去工作人员十余人，连来客亦不能幸免。次日公团集会，派代表质问张氏，张理屈词穷，只好向代表道歉，将报社人员释放。

次日本报将此事经过作一条新闻刊出。张氏更怒，复派警捕去本报编辑并封闭报社。公团复派代表质问张氏，张答称：“道歉无异哭脸磕头，我不能受此屈辱。”代表不得要领而退。于是有主张罢市、罢工、罢课以对付者。张氏探知，恐事态扩大，于己不利，乃命警厅将捕去的本报编辑，送法院宣判，以无罪开释，听任本报继续出版，不再过问。

接着北京各报登出冯玉祥在常德宣布独立的消息。《大公报》驻京访员，即据以拍发专电，由本报刊载。张氏竟以“造谣倡乱”，命警厅督察长周斗山传本报经理讯问，并判令报纸停刊七日。我们以为事已了结。不料警察厅长佟国安随即又率枪兵数十人至本报抓人，我们事先已有所风闻，悉行走避得以幸免。但事后又不见他们再有行动。他们究竟因何复来抓人，亦不得而知。其弁髦法律、蹂躏人权，一至于此！

本报既一再受张敬尧之压制，乃不得不谋对策。经同人商议决定：第一、今后有关当局言行之消息，既不能批评，即不予登载。第二、注重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如当时人力车工人、泥木工人罢工本报都有详细报导和评论。上海厚生纱厂在湘招收女工一事，由劳资关系问题发展为男女平权问题，毛泽东曾在本报发表评论。第三、介绍和探讨现代思潮。特约省内外专家学者撰稿。撰述最多的有毛泽东、方维夏、何叔衡、夏曦、柳直荀等，黎锦熙、杨树达、徐特立、李六如、曾三、田波扬亦屡有文章发表，可谓极一时之盛。第四、增设读者论坛。本报既辟有现代思潮介绍专栏，必然引起读者的兴能，于是特辟此栏，供读者发表意见。张敬尧以为这些与时政无关，

未加注意，使我们的报纸得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本报得讯后，即著《危机一发之山东问题》一文，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并拟特邀张慎安、黎锦熙、杨树达等撰写论文，由平子主编专栏，以宏舆论。预告方在报上登出，即遭新闻检查处的制止，并传平子加以审斥。我辩说，这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若是全无消息报导，还成什么报纸！检查员无辞以对，转问张氏请示，结果允登新闻，不准登评论。我乃将评论渗入新闻稿中发表，竟瞒过了检查。

张敬尧摧残舆论，理所当然引起报界的同人痛恨。有谭笃恭者（长沙人，留日学生），创办《华瀛觉报》，假本市小西门外日商小岭洋行为馆址借以庇护。该报专门攻击张氏，并揭发其阴谋。张痛恨之，乃诬谭通匪，派包探伏于谭居处。某晚谭出，即捕之送于军法处，次晨枪毙于浏阳门外。报界中人均敢怒而不敢言。不久省内外湘籍人士，秘密组织驱张团体，各报社中人多参加，本报经理朱矫奔走尤力，终于形成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迫使张敬尧逃离湖南。

在驱张运动中，尚有一二事值得记述。”

一九二〇年五月湘军入衡阳，克宝庆，张敬尧命其弟敬汤为援衡总司令，以义子张继忠部为护卫。敬汤起行时，身穿八卦袍，头戴纶巾、手持羽扇，俨然诸葛亮打扮，观者皆笑之。《大公报》派我为随军记者赴衡阳前线观战。我家居南岳后山，由山道间入衡山县城。湘军攻入衡山的为赵恒惕的第一师廖家栋旅，担任前卫的为叶开鑫团。予至旅部见廖，廖即以电话告叶，并派兵送余至叶团。团部设在衡山北门外五里牌一小山下的一幢茅屋中。叶方从山上督战回，见余握手表示欢迎。此时一发炮弹落于团部外塘，距予等不过三、四十米。叶说：“此地危险，先生宜速退。”我说：“不足畏。我此行以观战来，

不看到战争的结果是不走的。”遂同叶登山。时炮声如雷，枪声如爆竹，知北军亦在顽强抵抗。我取望远镜四处瞭望，“知敌方左翼空虚，当以告叶，建议攻敌弱点。叶深以为然，即令预备队二营蒋克勤增加火力，向敌左方攻击，夺取其制高点。蒋奉命率其生力军顷刻即将“叶”字旗插在山上，并大呼已活捉张继忠了。叶即令吹冲锋号，挥军向前，北军不支遂悉溃退。张敬尧掠一民船沿湘江下逃。待我反抵长沙时，张敬尧已仓皇逃走了。我写了一篇《衡山观战记》，详述当日情况，刊出本报。

驱张得以成功，固赖知识界的倡导谋划和湘军的英勇作战，工人罢工的兴起亦为一重要因素。人力车工人因反对车主商租盘剥，首先举行罢工；继之为泥木工的自动增加工资；再次为笔业工人因反对资方以铜元折合纸币而举行的大罢工，此次罢工规模最大，参加的人数最多。此外还有锯木、酒业、漆业等行业的工人要求发给现金增加工资的罢工。其规模较小，都因业主运动政府和军警实行压制而没有获得结果。当时省内各报都以为驱张运动是一出全武行，主要靠军队，至于工人罢工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独本报对之甚为重视，除派记者采访，详细报道外，毛泽东与本报同人且迭作时评、社论、表示同情和支持。

五、谭延闿三次督湘和赵恒惕治湘时期的《大公报》

（一九二〇年六月至一九二六年三月）

张敬尧被驱走后谭延闿复入长沙，第三次任湖南督军兼省长。谭系前清翰林，自以为文章学问高出他人，辄轻视记者谓为“文氓”，每遇记者求见，都不愿接见他们，只令马弁传语。又常假戒严法对报纸百般刁难。报人不堪其辱以报界联合会名义呈谭表示抗议，谭置之不理。各报乃请《大公报》社长（报界联合会会长）贝允昕面见谭传达众意，并规劝之，以后才

有所改变。

谭任之始，即倡“地方自治”之议。本报曾为社论称许，但说：“愿为真地方自治，愿为人民之地方自治，不愿为假地方自治，不愿为官吏、武人之地方自治；愿真正实行，不愿徒托空言。”

毛泽东此时从北京转回长沙，寄寓其族人毛宪律师事务所内。该所在新安巷，与《大公报》社仅一壁之隔。本社原有全国各城市及日本、英国、美国、南洋群岛等地点的交换报纸一百多种，陈列于我的寝室外面室中。毛泽东极喜浏览报纸，每坐其中辄数小时不去。遇风雪之夜难于返寓即与我同榻而卧。他为本报写了不少文稿，同人颇佩服他的卓见。他此次返湘，实为从事新文化运动及革命工作，曾组织文化书社，募集股款，每股十元，本报编辑部同人皆曾入股。又组织新民学会，进行政治活动，本报同人亦多加入。本报鉴于省政当局既以“自治”相号召，且有制宪的准备，以为言论出版自由，从此可以实现。为适应时代起见，拟集合一批思想进步人士专任撰述，特聘请毛泽东、金铨三，马文义等为特约记者，并将聘书刊于报端，以示隆重。

一九二〇年十月有一批中外名人应来湘讲学，其中有英国的罗素夫妇（其夫人叫勃勒克女士）和美国的杜威夫妇，以及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张溥泉等人。他们分别在教育会、逦道会作了讲演。本报以为这是新文化、新学术的一次盛举，除编辑部人员多数参加外，还邀请特约记者毛（泽东）、金（铨三）、马（文义）三人参加，并请他们担任记录。金、马二人每次负担一篇至二篇，毛泽东独能一天完成三篇以上，每篇都约三四千字。讲演结束后，政府将讲演稿印成专册，都是采用《大公报》的记录稿。

未几，赵恒惕逼走谭延闿，取而代之。赵有意收买舆论，赵

命其秘书长李鸣九宴请新闻界人士于天然台，席间宣布发给报纸津贴，大报每月二千元至三千元，小报每月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通讯社及杂志等每月二百元至五百元不等，在坐者均欣然有喜色。宴后，李因与我为同学，呼我至内室，以一张八千元的支票给我，希望我以《大公报》的资格在拥护政府方面为各报倡。我当即拒绝。从此赵氏遂仇视本报。本报既不为其金银所诱，亦不为其威力所慑，依旧坚持正义。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四日本报发表一则省内新闻，标题为“第一纺纱厂工人为要求年饷不遂，从昨日起全体罢工”。十七日又登一条新闻，标题为：“赵总司令查封劳工会，其主任黄爱、庞人沅被杀。”接着又有“成立法制编纂会的报道”。教人们看了，感到极不调和。黄、庞被杀，为当时的一桩重大政治事件，与本报亦有关系，不妨在此略加叙述。那时虽有所谓工会和工界联合会，皆系资本家的御用工具，完全不能为工人谋福利。黄、庞二人自上海求学归来，有见及此，倡导另组劳工会，并将其章程投送各报。请各报就其宗旨广为宣传。各报对劳工会都存疑惧未予接受，独《大公报》为之登载。黄、庞因此常来本报与同人商讨时事。当时第一纺织厂有男、女工人五、六百人，厂方获利甚丰。黄、庞注意及此设法渗入该厂，运动工人尽加入劳工会。其时已近阴历年底，按照惯例，凡工厂商家获利者必加发员工年饷一、二个月。黄、庞因命工人援例向厂主福出要求，未得允许，即策动全体工人罢工。厂主密见赵氏，指黄、庞为过激党。赵氏大怒，认为非镇压不可。厂主即至劳工会，假意与黄、庞商讨解决办法，同意发给工人年饷，约定于十七日晨签字。黄爱信以为真，于十六日晚亲自起草一报道稿送交本报，嘱为发表。是日我与赵的秘书长李鸣九同在某处赴宴，谈及纱厂事，李对工人和黄、庞甚表愤怒，我知不妙，即以告黄，劝他今晚勿归以防万一。黄说：“此事关系重大，已

约定明晨签字，我不能以个人利害妨碍公众的利益。”遂辞出。黄归家未及一小时即与庞一同被捕随即遭杀害。事后毛泽东曾领导学生工人为之开会追悼。本报曾致送挽联，联曰：“奋斗为众生，千古伤心是工运；取义拼一死，九原含笑亦冤魂。”

赵恒惕主湘以后，继承谭的政策，继续搞“自治”、“制宪”那套把戏。外省军队，一时退出。我们以为从此湖南可以安定一个时期了，拟对本报有所改进，使之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改进要点为：将现代思想栏扩充为农工商部，将本省新闻栏增加“劫后余闻”，在社论后增加“省宪浅释”每星期另发行“劳动特刊单张”一张，还编印定期或不定期的青年、教育、文学等专刊。及黄、庞惨案发生，赵的假面具全被揭穿，本报同人非常泄气，因著论指摘省宪无成绩、议员受贿赂，并揭发某要人强委吏官的怪剧。岂料竟以此而触赵怒，唆使黄孟祥等十数人在省议会提案，控告《大公报》犯有“破坏省宪”“公然侮辱”二罪，咨请省政府勒令停刊。本报提出抗议无效；提起行政诉，亦被拖延数月未予受理。于是全省各公法团、各县议会函电交驰齐起指责省议会和省政府摧残言论，破坏宪法，但都没有结果。本报迫不得已乃另改名为《新公报》继续出版。这时省议员包道平以处分本报过当，提请议会复议，留日湖南同乡会亦通电各公团、法院代诉不平，政府及议会不无顾忌乃不再过问。本报被封五十三天，始行恢复出版。

本报在此时期还有两次拒贿的事。一为商人曾次爵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承包造印厂的权利，因怕报纸反对以五千元托人运动，被我们严词拒绝，并在报上揭露。一为某军人欲以金银贿赂本报，取得支持，屡派人与同人接洽均被婉拒，一日忽携五百金来，强委于案上而去，经同人商议，命我送还本人，但也向对方表示，愿代守此一秘密。

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长沙的学生、工人、市民举行维持国货游行，停泊于本市小西门外码头之日本“伏见”号兵舰的水兵登陆开枪，打死市民王绍元、黄汉卿二人，击伤九人。一时群情激愤，组织外交后援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议要求日方惩凶、赔款等八条，责成外交司向日领提出觉书（照会），但谈判毫无结果。本报著论主张坚决维持国货，抵制日货，断绝外人在省内一切生活上的接济，并要求政府采取革命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必要时封锁商港，驱逐外商。这些主张，赵恒惕政府是做不到，也是不敢做的。本报除发表评论、大声疾呼以外，还把“维持国货，誓雪国耻”八个大字长期刊于第一版之首，以唤起全省人民。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为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同人拟举行庆祝。省内外闻人学者都撰文为贺，共得三十余篇，美术和书法大家齐白石、杨重子等亦以书画见赠。我们以报纸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容纳，乃编印成纪念专册全书多达四百余页，字画都用珂罗版印出（系由武汉印书馆代印）。九月一日那天报社宾客盈门，不仅有工、商、军、政各界的人，还有乡村农民携蔬菜、鸡鸭走数十里来贺者。赵恒惕亦派秘书长携湘绣、银鼎、贺联并银洋两百元来贺，同人待之以礼，而却其财货。同人的艰苦奋斗已可概见。

六、北伐战争时期的《大公报》

（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九二六年三月，北伐军逼近湖南，唐生智转向革命，由湘南向长沙进军，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唐率部进驻长沙。四月，赵部叶开鑫师联合北军陈家谟部及粤叛将谢文耀部反攻宝庆，唐一度退守衡阳。迨北伐大军入湘，唐亦反攻得胜，于七月十一日复入省城，实现对湖南的统治。八月，唐奉命出征，

驻节武汉。次年春天至夏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湖南亦发生“马日事变”。唐因反蒋失败，率部退回湖南，旋即宣布下野。程潜一度以湘鄂政务委员会主任兼主湘政，至一九二八年六月，又为鲁涤平所取代。鲁任职仅九个月，到一九二九年二月，又为桂系所逐，由何键接替主湘。这段时间是湖南政局变动最频繁的时期，也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期。

当北伐军入湘之前，《大公报》本具反对军阀之一贯立场，屡次发表社论，指斥赵恒惕，拥护北伐军。迨北伐军深入湖南境内，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大公报》对工农运动夙抱成见，自然不愿迎合，但又慑于它的威力，不敢反对，抱着“兔死狐悲”的心情，对大局保持缄默。结果被目为反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被国民党（国共合作的）市党部查封。

查封时当局态度颇为宽松，曾示意只要报纸改变态度，拥护革命，可以启封。时李抱一、龙兼公已离开报社回乡，来函非坚持不可，报纸终于停刊，到一九二九年八月始行复刊。我在“马日事变”后，应友人邀也离开长沙到武汉主持《武汉民报》去了，直到《大公报》复刊，才应召回到报社。

七、何键主湘时期的《大公报》

（一九二九年五月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大公报》停刊两年余，贝允昕社长以职工失业生活无着，亟待解决，乃函邀李抱一和我等来省磋商报纸复刊事。经过短时间的筹备，报纸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复刊。此时正值何键上台伊始。他为讨好报界，每月由省政府发给各报津贴一千二百元，单给《大公报》一千六百元。

这年七月四日，《大公报》社长贝允昕去世。

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大公报》的言论方针较前有所改

变，带有更多的反共色彩。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为了纪念本报复刊一周年和纪念“马日事变”三周年，本报出了特刊。李抱一所作《共匪之祸甚于李、白》、《国人应和衷共济以防共祸》、《共匪势将西窜国军应如何防止》等篇评论都是在此时发表的。报纸在编辑方针上，注意教育、实业方面的报道。如增辟“教育新闻”栏，编撰“教育特刊”，并印行了一些单行本，无非是想以发展教育、实业，为民众谋些利益。

一九三〇年夏天，湖南局势又发生突变，红军进攻长沙，形势骤然紧张。抱一、兼公闻风先走，仅留我一人支持报纸。我聘陆爱群、周次功为助理。七月二十七日红军攻克长沙，报社职员全部逃走（工人未动）。报纸不得不暂时停刊。八月五日红军撤退，我于七日返社。据工人告我，曾有红军指挥员来社，嘱工人把我找回，让报纸继续出版，他们允予保护并发给经费云云。九月，大公报继续出刊暂时缩减为一张。二十八、九两日红军再次反攻长沙，周次功曾作《倡勇敢、息谣言》的社论，意在安定人心。十月一日报纸增加半张，恢复《先路》副刊。十一月一日又增加至二张半，恢复教育专栏。至此，报纸基本上恢复了以前的篇幅。

在此期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胡适应何键之邀来湘讲学，实际是帮助反动统治者欺骗麻醉人民，舆论界颇多非议，《大公报》抨击尤力。

一九三三年日军进犯热河、榆关。报社同人发起募捐购买飞机，以固国防，并将同人捐款五百元存入银行，以示提倡。

当时湖南国民党分为甲乙两派，甲派依附“CC”，乙派为何键御用，两派斗争甚为激烈。《大公报》曾屡次撰文予以警告。又针对何键为了扩充势力，大肆收编军队一举，作《治军刍议》，提出“不妄报”、“不攘功”、“不讳败”的观

点，进行劝导。

如前所述，何键上台之始，为收买本报（及其他各报），曾月给本报津贴一千六百元。后见本报不为所用，削减为五百元，并常借故拖延不发。其后，进一步对报纸进行摧残。一九三四年八月，以申请登记尚未核准为借口，封闭《长沙报》和《新报》等十一家报纸。《霹雳报》因评论湖南的天灾人祸而被罚款二百七十元，终于迫使该报停办。何键还呈请中央在本省设新闻检查所，委派余定为所长。从此报纸受钳制更严。报界同感愤慨，但亦莫可奈何。

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为《大公报》创刊二十周年纪念。本报编印纪念专刊，敦请周凤九、赵恒、宾步程等专家和知名人士，就二十年来湖南之公路、工业、金融、教育、军事等方面撰写论述文章三十余篇，同人自撰二十年湖南大事记及本报经历等文，还特邀齐白石、徐山立、刘寄踪等名家作书作画，用珂罗版印于册内。这个专刊所载资料，至今还为历史学家所珍视和采用。何键亦为前清秀才，颇擅小楷，是日亲书贺联一副送来，联曰：“大而无外，宇宙光辉；公尔忘私，人民喉舌。”我们没有把它刊入纪念册。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大公报》于十一日首先发表消息。接着又于十七、十八两天刊登北平某大学学生邓文惠两封报告运动详细经过的信，在湖南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二十日长沙各校学生数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公报》又作了详细的报道。事先何键曾命教育厅设法阻止，没有奏效，因而迁怒于本报，但亦莫可如何。

“一二·九”运动之后，人民救亡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声势浩大，不可阻挡。《大公报》常以占国内新闻三分之二的篇幅报道各地救亡消息。何键也懂得救亡图存，事属正当，民

意不可侮，潮流不可逆，也就不再多加干涉了。

一九三七年夏，湘西苗民“抗日革命军”起义，矛头直指何键，接着“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何键在统治了湖南九年之后，于这年十一月被调离湖南。

八、张治中主湘时期的《大公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十七十一月）

何键调走，张治中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不久，全国处于团结抗战高潮，一派兴旺景象。张在政治上向以开明见称，治湘期间，除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外，力图刷新政治，曾延揽一批学者和知名人士如尹任先、朱经农、陶履谦等担任各厅厅长，提出颇具革新精神的施政纲要，制定组训民众和加强抗日自卫力量的方案，调训全省县长等等，使湖南面貌一新。《大公报》对他的这些措施，曾力为鼓吹，大加赞扬。

是时中共中央派徐特立为驻湘代表，王凌波为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在长沙公开活动。徐老与我为老友，凌波是我的同学。他二人百忙之余，常来报社，或接洽工作，或作闲谈。一日，值予生辰，报社设宴为祝，徐、王均来参加宴会，并各赋诗。席间王从衣袋中取出《新华日报》（重庆版）一张载有驻湘记者流云通讯稿一篇，对各报有所评论，其中谓：“《大公报》主张国人一致抗日，提倡民众爱国运动，可算是进步的，惜处恶劣环境中，不能畅所欲言”云云。王说这是一份顶好的寿礼。我阅后亦颌首而笑，并举杯称谢。

那时日军飞机时来侵犯省城。我们日则奔走于防空洞中，晚则以木板关窗，在室内工作，其处境之艰苦，可想而知。不久黎澍、马午等办之《观察日报》，田汉、廖沫沙等所办之《抗战日报》先后问世。《观察日报》与《大公报》声息相通，并

由《大公报》印刷厂代印。《抗战日报》常请徐老为之撰稿。二报异军突起，我们始不感孤掌难鸣了！

也就在那个时候，突有一桩危及报社和我个人的事情发生。起因是国民党顽固派想把《大公报》夺过去，变为他们的宣传工具。中统头子韩中石，（湘潭人共产党的叛徒）、罗德钰（湘潭人）和我是同乡。罗常来报社，故示与我亲密。一日，罗假其妻所主持的回息度小学什么纪念的名义请我赴宴，我欣然前往，见韩、罗均在座，还有一些腰佩手枪的人。席间韩忽手出一纸相示，视之则为国民党之入党表。韩说：“我们今日请张社长入党，并请大公报为党国效劳。”我自知处境甚危，因答道：“要我入党是可以的，若要报纸变为官报，容归与同人商量后再作答复。”遂起身告辞而出。时日军已大举侵湘，我与同学黄衍钧等创办之大麓中学（我为该校董事长，黄为校长），为避寇计已决定迁至湘潭古塘桥。因前往筹备，借以避开韩、罗。不久长沙发生“文夕大火”，我就留在大麓授课。后来回长沙时曾见到韩、罗，也就未再提及此事了。

“文夕大火”中，《大公报》全部设备财产悉付一炬，报纸就停刊了。

九、薛岳、吴奇伟主湘至长沙沦陷期间的《大公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

张治中于文夕大火后被撤职。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

文夕大火后的第三天我由湘潭回到长沙。次日找到李晋康、朱石农，和他们商议数事：一、确定报纸存废问题，一致主张要争取复刊；二、马上组织力量扑灭报社余烬；三、建立同人通讯站，以便取得联络。这几件事，全要托他们去办，我仍返大麓中学教课。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大公报》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在长沙复刊。当时报纸销数仅两千份，每月广告费收入仅

四、五百元，亏损甚巨。我们这些人又囊空如洗，几乎无法维持。而CC派的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社又企图乘机篡夺本报，虽然遭到我们的抵制，但也使我们增加不少的烦恼。

《大公报》复刊以后，在言论方面，仍坚持独立主场，对当局的不当措施，持批评态度。如省政府成立物价委员会，用强制手段平抑物价，结果越评物价越涨，老百姓把薛岳称为“薛平贵”（意为越平越贵），本报发表评论，指出这种作法是不懂经济法则。

薛岳的军饷本应由中央发给。他为了搜刮民财以饱私囊，竟以弥补军饷为名，向财政厅长胡迈（湘潭人，号彦远，曾留日习经济，当过省议员，明德中学代理校长）索谷三万石，银元三十万元，胡不予，实际上也拿不出如此巨额粮款。薛大怒，诬胡犯有贪污罪，拘送法院，却又久不定案。我为《大公报》写了一篇社论，谓“贪污当重证据。胡之贪污证据既不能举出，徒以威势而久系无辜，此岂法院所应为？！”法院终于被迫将胡无罪开释。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月、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军曾三次进攻湘北，旋即撤退。《大公报》派有战地记者，深知个中底细。薛岳却发动宣传机器，制造所谓三次“湘北大捷”。我们只好在新闻报道之前加上“据称”二字，以示存疑，并作社论隐隐讽之。

一九四四年六月，日军以强大兵力再次进攻（这次是真进攻），直逼长沙。第四军担负城防任务，军长张德能于六月十五日发出告示，限居民于三日内全部疏散，同时积极备战。

《大公报》于十六日停刊，员工尽行遣散。我于是日黄昏时偕报社职员于赞侯自南门出城同道步行向湘潭家乡逃走。次日黄昏甫抵家门，即为驻在该处之日兵所拘，解送其司令部。敌司令见我为人，未加伤害，并嘱仍回长沙办报，我唯唯应之，

以为没有事了。詎料归家一个月以后，有刘晴示者（湘潭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曾任某混成旅旅长及何键、薛岳之参谋处长等职回乡后为日军所俘），时任伪湘潭警备司令，遣我原来的黄包车夫李国民持他的手函及一百元来见我，函内谓奉皇军命，促我速即回省办报。我却其银，未复其函，即避往衡山白果，主持迁于该处的湘潭中学，得以免入汉奸所设陷阱。

十、日本投降至《大公报》停办

（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于十五日辞去湘潭中学校长，水陆舟车赴省。此时日寇余威尚在，仍能肆其暴虐。我们派经理部职员李秉秋去收拾报社，行至大西门即为日军所杀。报社大部财产则早已被汉奸匪徒劫去，仅存机器、铅字、铜模等笨重的东西，旋又被国民党七十三军搬去，我们派人去交涉，他们竟以得之于日军的战利品为辞拒之。后由李经理面见王军长说明情形始予发还，然亦损失十之七八了。

经过短时间的筹备，《大公报》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复刊，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动停刊，历时两年又三个月。此段时间，有下列可述之事：

（一）笔者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忽然被拉去当市参议员。我在参议会内迭发怪论，被称为“小铜炮”，放炮之后，辞职离去。

（二）青年党钟汉驊在《大公报》上发表反动文章《毛泽东为湖南第一罪人》，平子自沪返湘后，即将此人辞退。

（三）民社党党魁张君迈经湖南党徒向某介绍会见平子，鼓吹什么“共产党是恨人，民社党是爱人”等一派狂言，平子不纳。

（四）由平子之婿熊沛引进一批进步青年如刘华连、刘云

雁、毛彬、忝先模等，充实了编辑部的力量。由于反动势力的嫉恨，这些进步青年正常的新闻活动，也曾多次引起纠纷和遭到迫害（编者注：因篇幅关系，这些事件的经过都略而未刊，作者手稿当存本会）。

（五）省田粮处长黄德安大贪污案发生后，于一绿皮箱中发现了大量行贿、受贿的证据，其中新闻界的不少，唯独《大公报》没有得贿。

一九四七年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转守为攻，眼见国民党政权行将复灭，本报同人心存疑惧，爰于十月七日召开董事会议。我在会上报告：“时至今日，报社的声誉和信仰已无法维持，财政上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国民党数百万军队节节败退再无振兴希望。将来共产党主政，我报是以反共著称的决不能相容。与其将来受害何如此际谋生。”云云。遂决定于本年底停刊，永远不再恢复了。至于职工失业问题，一方面促其自我工作，一方面尽力向外间介绍，并事先通知他们。我们经营三十余年的事业，就这样结束了。

关于湖南国术训练所的片断回忆

竺永华*

何键统治湖南时期，曾设立国术馆，倡导军民学习国术。我任省国术馆馆长多年。现将当时见闻略述于后。

一九三一年冬，何键在长沙市皇仓湾修建国术馆，成立湖南国术训练所，招收社会男女青年进行训练。所长万籁声为北方人，他聘请的教师也就多系北方籍。其中教务主任顾汝璋对南派武术多所贬抑，引起湖南武术界的不满。特别是湖南首届国术考试冠军获得者湘潭人唐徽典，满以为国术训练所成立后，会聘请他当教官，结果大失所望。当他去拜访万、顾时，遭到他们的白眼，唐因此更为怨愤。

当时长沙有个柳森严，因为在军队里学过几乎花拳，也想向国术方面寻找出路。他经人介绍与唐徽典认识后，两人即商议由柳出面向北籍教师寻衅，唐则在暗中相助。不久，即有柳森严约顾汝璋比武的事愤发生。当时，何键以第二届国术考试举行在即，命柳森严准备参加考试。

当柳森严函约顾汝璋比武的时候，故意神乎其神地宣称自己由峨嵋山学道归来，又常挟一把很大的红油纸伞，西装而赤脚草履，招摇过市，引得小孩闲汉相率尾随，往往途为之塞。消息传开之后，长沙市大小报纸竞相刊载，大肆渲染，并撰文评论南北拳技之优劣。人们好奇，争相传说，又常以讹传讹，

*竺永华在何键任湖南省主席期间，曾任国术训练所副所长、国术馆馆长。已故。

把个柳森严说成简直是小说中的剑仙侠客一样。

一九三二年冬，湖南第二届国术考试在长沙举行，比武擂台设在教育会坪（即现在省农业厅前坪）。这次考试场面较大，由何健亲自担任裁判长，并在地聘来一些国术专家任裁判员。这时，国术训练所和技术教导大队都已开办将近一年。因此，除各县派来的选手外，这两个单位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报名参加考试。事先，何健秘密通知柳森严，要他参加考试。如不参加就不准他在湖南立足。柳只得硬着头皮报名应考。柳森严打擂的新闻在各报刊载后，长沙市又闹得满城风雨。比武那天，参观门票要售光洋五角，但仍人如潮涌，教育会坪挤得水泄不通。

这次考试和第一届相同，仍采取散手对打办法，也不分类和轻重级，每二十人为一组，抽签轮赛，倒地者为输，同时倒地者以倒在下方的为输，双方同着地为平交，并采用三赛二胜淘汰制。当初赛进行时，由于与考人员受当时报纸有意吹捧柳森严的影响，大家都以为他真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或神技点打，故在抽签时抽到以柳为对手的人皆自动弃权。柳未经交手即获得决赛权。在决赛时，柳抽签遇到技术教导大队学生宁德生为对手，宁又决定弃权。但宁的同学谭忠其不服气，愿顶宁名与柳比赛。谭练过搏击和摔跤，初生之犊不畏虎，几个回合，打得柳只有柳架之功，面有还击之力。最后，谭搬了柳的左柳将柳甩倒在台上。柳自知已失败，便死扭谭手不放，谭也倒在柳的身上。柳倒地后又柳身将谭压在底下。这是违犯比赛规则的。当时执行裁判辛健侯几次吹哨叫停，但双方互扭，都不肯松手，辛只得用手去扯。这时台下观众大哗，柳趁势站了起来。当辛健侯判定他先着地为负时，他不服输，并向台下大喊：“裁判员不公平，我不参加比赛了。”说毕即愤然下台，观众有信以为真的，大哄大闹要退票。在场的国民党军十六师师长

彭位仁的弁兵，竟以手枪威逼辛健侯。辛只得向何键面前跑去。何键一面制止弁兵行凶，一面令枪兵威吓群众说：“谁再哄，就打死谁！”这样才将混乱场面平定下来。

当天长沙市各晚报又捕风捉影，说柳将要倒地离地还有五寸高时，突然使出“鲤鱼打挺”一招，将宁德生压在底下；裁判员辛健侯为形意拳专家，一拳打出有五百斤重，连击柳三拳，柳面不改色。还有人说，柳在北门某处路过，反手接住暗处袭来的飞镖。如此渲染，使这个流痞身价大增。以后他竟设厂授徒，并开设森济医院，专卖跌打损伤药酒（其实就是湘西皮子药浸的酒），为人治伤以敛财。后来，他更沦为中统特务，解放后被镇压了。

一九三二年，中央国术馆在南京举行全国国术考试。湖南在国术训练所和技术教导大队选拔了男女学生九十余人，由李丽久、向恺然领队到南京应考。因为当时其他各省还没有举办集体的国术训练，所以湖南选手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一些，比赛结果，湖南获得总锦标，并获得个人德标和奖品甚多。何键对此异常高兴，

在这次比赛中，由于湖南选手骄傲成性，不时与各省选手发生冲突，无理取闹。最大的一次冲突是与河南选委的争吵，闹得全体退出会场，威胁大会。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派总务处长竺永华调解，经过两天斡旋，一场南北风波始告平息。不久，竺永华应何键之邀来湘任国术训练所副所长，旋又兼任国术馆馆长。

在中央和省内举行国术考试的影响下，湖南各县也相继摆擂台、考武士。场面较大、观众较多的有湘潭、湘阴、常德等县国术馆举办的几次国术考试。如一九三六年秋，湘阴县国术馆在东明观举行国术考试。除聘请李丽久、白镇东分任裁判员外，何键还派随从副官李如桂赴县主试。当时规定报考不分县

籍，所以滨湖各县来应考的很多。记得三天比赛，共售门票七千余张（每张三角），场面之热烈也是少见的。

国术训练所和教导大队的学生，都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血气方刚，加上学得几手毛拳，更加横无忌。虽然何键口头上也禁止私斗，但私斗的事情还是常有所闻。何键和所属治安机关对这些青年武士，不仅不予约束，往往还予肇事者以包庇和纵容。如一九三二年，国术训练所学生多人，不购门票闯入远东戏院看戏，与戏院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大打出手。事后，万籁天还歪曲事实真相，向何键慌报说远东戏院侮辱学生以致激成事故。并藉势勒令远东戏院停演三天，登报向国术训练所道歉才了事。一九三四年，这些武士又在军训主任廖梅亭的默许下，纠集五十余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捣毁了西牌楼百合电影院。还有一次他们在世界戏院非法捕人，私刑吊打。这里所举的仅是几次较大的事故，至于个别的行凶打斗的事情是不胜数的。当时，这些武士把长沙闹得乌烟瘴气，行人望而侧目。他们到戏院看戏，只凭衬衫上所印“国高”、“国师”、“技高”等字样，就可不购门票，长驱直入。各戏院都吃过他们的苦头，也只有忍气吞声，任其所为。

与此同时，何键也利用国术训练的机会进行了一些“秘密”的活动。原来湖南省政府招待所设在皇仓湾关帝庙内，与国术训练所右侧门相通，何键日必到招待所写小楷一页，并在此接见男女客人或找训练所的学生谈话，借机拈花惹草。他的老婆不时前来探听何接见的女客究系什么人，使弁兵们左右为难，说真说假都不讨好。听说有的因此得了意外之财，有的则因此而被开除。有一次，何妻写了状纸向湖南高等法院提出控诉，要与何键脱离夫妻关系。院长陈长簇在百般为难中，将状纸秘密交给我，要我与李觉（何的女婿）从中婉为劝解息事。

一九六四年五月于长沙

记亚新地学社

邹协勋*

武昌亚新地学社，是湖南新化邹焕廷创办的。焕廷世居新化罗洪(现属隆回县)，小时家境贫寒，无力入学，乃学裁缝，手艺很好，倍受顾主欢迎。惟据传说，每逢入祠祭祖时，别人因为他是一个裁缝，辄将身上脱下的衣褂命其持叠，焕廷很气愤，便立誓不做裁缝，挈妻往湖北武昌另谋生活。可是当时找工作是不容易的，当雇工也少有人雇，焕廷只好临时租一部人力车，靠拖车子度日，其妻则为人洗衣服以糊口。

先是有新化邹沅帆者，世袭云骑尉，博学多才，精通史地，将其祖父邹叔绩所著《叔子通书》及校订的《王船山遗书》送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为曾左所器重，保荐他随清廷某公使游学英、俄诸国。沅帆很留心外国地理，对各国山川地势、水陆交通等，均随时记录。回国后，创办中国舆地学会于武昌，并著有《西征纪程》一书。据说，他当时所绘世界全图，即以南极与北极为标准，以天为360度计算，天上每一度，等于地下一百公里，但以各国度量试算，天与地均不相符，惟有英尺相符，所以他就采用英尺，首创中国尺与英尺的比例绘图。就以我国舆图与世界各国舆图相比，独以邹沅帆创办的中国舆地学会出版的地图为最好。他所绘制的地图，系按英尺一万丈等于一寸，或十万丈等于一寸的比例，视图纸之大小，与

*邹协勋系湖南新化人，亚新地学社创办人邹焕廷侄孙，此稿是他与中国舆地学会创始人邹沅帆的侄孙邹兴辟及邹焕廷之孙邹新核共同回忆写成的。

所绘地方之宽窄，推算画格，描绘成图，再脱于铜版上，用硝酸漫蚀后显出纹路，再印成图，然后染色，以区分国界或省界。听说最初用手工染色，效果不好，后派其族弟邹继笃假装哑巴，打入日本某印刷所作工，表现特别勤劳、聪敏，惟不会说话，以争取厂方信任，从而学到日本人保守秘密的先进染色方法，再逃回国仿制。邹沅帆在国内创设印刷所，采用铜版染色印图，为光绪年间中国唯一先进的地图印刷场所。清廷对邹沅帆特别器重，封官授职（听说他在京师大学堂讲过学），沅帆固辞不就，甚至连发来的函令都不屑视，一心只想振兴祖国实业。

邹焕廷到湖北武昌大约半年时间，适邹沅帆由北京回到武昌，武昌的官员纷纷到车站去迎接他。焕廷适于此时拖空车至，大呼：“老爷！我的车子很好，请坐我的车子。”沅帆闻是新化口音，询其何处人氏，答曰：“新化罗洪。”又问何姓，答曰：“姓邹。”问何房，答曰：“三房。”问何辈，答曰：“永字辈。”盖系沅帆同族之子侄辈也。虽非至亲，但沅帆认为有族侄在外省者实为难得，乃曰：“我是你叔父辈，‘老爷’不是你应称呼我的。”并即付与银元一元，嘱其将车子退掉。焕廷将车子送还车主，回到平湖门，沅帆嘱他雇车二辆，二人各坐一侄，同行至古月楼，沅帆又命停车，嘱他往估衣店将衣服换了，再一同坐车至黄土坡舆地学会。沅帆约焕廷同进晚餐，并询问他在家干何职业，焕廷据实以答。于是沅帆留他在舆地学会干文案板的工作，每月津贴十块钱，晚上则与沅帆的亲侄邹永成等一同课读（当时专聘有一位余老先生为家庭教师）。焕廷一面读书，一面学习绘图，如是者数年。因其学习刻苦，办事勤奋，甚得沅帆器重。

时有晏主菴者，亦新化罗洪人，在舆地学会当职员。有一天，晏因友人来访，呼焕廷为之倒茶，焕廷不依，发生齟齬，竟致互相殴打，经沅帆族弟邹光达唤来沅帆的胞弟邹幼权，方

才制止。是年冬，沅帆从北京回武昌，幼权将此事告诉乃兄，沅帆以晏主菴是亲戚，邹焕廷是子侄，二人中不好随便辞退其一，乃命邹焕廷另率一班人往上海，代为购买石印机二台，带去分省图铜版数幅，另行开办一个地图印刷所，取名为“亚新舆地学会”，又赠给银洋五千元为资本，并嘱咐焕廷：若有湖南人来你处，遇有困难，务必相助。焕廷以资金不敷，又以沅帆名义从两江总督魏光燾处借得银洋五千元。后来魏派人到武昌中国舆地学会讨还该款。事为沅帆获知，并来追问焕廷。沅帆生两子，长名安图，次名安众，时均年幼。长侄邹永成，又正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参加陈天华、黄克强、孙中山等组织的华兴会、同盟会，奔走于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邹沅帆逝世后，其所办之中国舆地学会，即卖与清政府，为张之洞收去，改为陆军舆地学会，即湖北军事测量局之前身也。中国舆地学会卖与清廷，得银二万两，部分为邹沅帆回乡安葬所用，部分供邹永成从事革命之费用。焕廷以沅帆创业维艰，不可不继，乃将设在上海的亚新舆地学会迁回武昌细横街，并商得沅帆胞弟邹幼权同意，将中国舆地学会的铜版仪器，留一部分借与他用，还拿了一幅皇朝一统图铜版及世界全图铜版和历朝图铜版、湖南省图铜版若干幅，与其婿欧阳纆等，创办亚新地学社于武昌。其子伯庚（五十多岁就病故了），孙新垓（西南联大毕业、学地质）均继承此业。亚新地学社兴办五十余年，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颇有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亚新地学社搬到新化，继续出版各种地图。听说有一部分铜版材料，为防日机空袭藏于郊外河边，被国民党军队在用炸弹炸鱼时炸毁，损失颇重。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我在国民党远征军任职驻扎滇西时，亚新社已是邹新垓当家。新垓很注意了解滇缅方面的交通地形，曾致函与我，要我在发现有与图上不相符合或者图上没有的线路和地

名时，随时告之，以便加以校订。乃祖焕廷，年近八旬，虽患耳聋，每天仍照常写字（他写的魏碑很有功夫）、看报。我于一九四九年冬由西北回到新化，去探望他的时候还是这样。我的父亲和邹永成当时也都健在，被目为族中三老（邹焕廷是解放初期去世的）。

以上所述，系我和邹沅帆的侄孙（幼权的孙子）邹兴晔共同回忆的一些情况。爰为记述，藉供参考。

从黎锦晖说到湖南歌剧

朱 立 奇 *

歌剧 (Opera, Oper) 始于十六世纪末的意大利和德国、法国，后来在欧洲普及开来。传到中国，则已是十九世纪的末期了。传到湖南则更迟，那已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但是讲中国歌剧史，不能不引以自豪的是：中国歌剧运动的早期杰出致力者（引进和民族化）湖南人不少。数典不能忘祖，该先述黎锦晖、黄源洛之事迹。

两个创始人

黎锦晖 (1891—1967)，湖南湘潭人，老家在晓霞镇石湾坝，是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子弟。其父黎松安为晚清秀才，在家开设一所兼教中西课程的家庭学校——长塘松溪学校，把心力倾注于教育子女。后来黎锦晖八兄弟都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界、实业界的有名人物，老大锦熙是当代有名的语言学家，老三锦耀为矿业学家，老四锦纾为教育家，老五锦炯系桥梁专家，老六锦明是文学家，老七锦光是音乐家，老八锦扬为著名美籍华裔作家。黎锦晖排行第二，则是教育家、音乐家和中国歌剧的开山鼻祖。

黎锦晖从童年起就学习古琴及各种民族民间乐器，哼过昆曲、湘剧，练过汉剧、花鼓戏，十岁起每年祀孔春秋两祭，参

* 朱立奇建国前毕业于湖南音乐专科学校，现在湖南省戏曲研究所工作，湖南歌剧研究会第一任会长。

加习乐习舞；也参与民间的宗教（作道场）和戏剧（花鼓戏）活动，并曾邀集花鼓戏艺人进行表演，向他们学唱和记谱。他从小就对我国的雅乐和俗乐进行了学习、钻研。民国成立之初，他被聘为湖南师范传习所（优级师范前身）的乐歌教习，并在明德、修业、周南、广益等学校兼课。这是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周的事。黎锦晖实为湖南学校音乐课程的开拓者之一。

他在教学中，除了教弹风琴，教唱当时流行的一些西洋歌曲以外，还以民间俗曲配上新词自编教材。例如以民间小调《四季相思》配词为《四时读书乐》。这是一种使音乐走民族民间道路的尝试，但曾遭到了当时音乐界的一些人的反对。

一九一四年，黎锦晖到北京（他大哥黎锦熙是北京大学教授）集中精力学习皮簧戏及鼓书等。从一九一七年起，他到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同时参加北大音乐会（刘天华等所组学术团体），被推为“潇湘乐组”的组长。一九二〇年，他邀集同好，在其住地斗鸡坑（离北大不远）成立明月音乐会。为什么以“明月”命名？他说：“我们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就叫‘明月音乐会’吧。”黎锦晖的这一宗旨，后来贯彻到儿童歌舞和电影音乐中，使得他创作和改编的音乐能风行全国，并流传海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黎锦晖是推广白话文和国语（普通话）的骁将。他担任上海国语专修学校校长，并亲自带领三个国语宣传队到沪宁沿线城镇去推广国语。他发现以语言配音乐来推广国语是个好办法，在儿童中推广尤为有效。于是开始创作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的实验性活动。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九年的十年之间，他创作了儿童歌舞表演曲二十四首和儿童歌舞剧十二部。这十二部儿童歌舞剧大都以童话为题材，表现了科学、民主、平等、博爱、团结、善良以及歌颂北伐胜利和人性慈爱，讽刺复古读经和恶人恶事等。如《麻雀与小孩》、

《葡萄仙子》、《月明之夜》、《三蝴蝶》、《快乐的春天》、《七姐妹游花园》、《神仙妹妹》、《小羊救母》、《最后的胜利》、《小小画家》和《小达利之死》等，都体现了上述旨趣。

黎锦晖不仅创作了许多剧本和音乐，而且组建了上海国语专修学校附小歌舞部（1922—1927）、中华歌舞专门学校（1927—1928）和中华歌舞团（1928年5月）等机构、团体，进行排练演出，并到南洋各埠去演出过。他的创作和演出，风靡一时，成为全国各地儿童音乐教育（从幼稚园至小学）的教材和广大儿童们的精神食粮，国外华侨也把它视为祖国的艺术花朵。

黎锦晖的歌舞剧音乐，很多是用湖南花教戏和民间曲调填词或改编的。他的创作，也体现了湖南民间音乐的地方色彩，既为全国儿童所欢迎，更为湖南儿童所喜爱。现在许多五、六十岁读过中小学的湖南人，还能哼唱几段。我从事歌剧事业，也就是因为从小受了黎锦晖歌舞剧的影响。

三十年代初，黎锦晖在上海组织了明月歌舞团，将他创作儿童歌舞表演曲和歌舞剧的经验，发展为描写成人生活题材的节目，并向社会公开演出。这个时期他写了一些配合时事的歌曲和爱情剧，例如《桃花江》是反封建，提倡自由恋爱的，《特别快车》是讽刺一见钟情的闪电式乱爱。但作为职业剧团到社会上演，要受观众接受能力的制约，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还要受剧场老板、军、警、宪、特以及流氓地痞等的左右。他们往往看到儿童歌舞节目和时事教育节目就起哄，看到爱情剧就欢迎，尤其喜欢临时添加的噱头和庸俗的表演。黎锦晖觉得这样不行，就解散了明月歌舞团，参加了联华影片公司。他的一批演职人员除参加拍摄歌舞影片外，还组织了一个联华歌舞班作舞台演出，仍受到刁难，演出很不景气，一九三二年二月终于被迫解散。

黎锦晖重振旗鼓，把原班人马改组为明月歌舞剧社。他说：“自从创办明月歌舞团后，上海滩相继出现了玫瑰歌舞团、桃花歌舞团……等，它们专演庸俗低级的歌舞，名声搞得很坏，因此，这一次决定废‘团’改‘社’。”他作了一首社歌领导全体社员演唱。歌词是：

“我们履行，宗旨光明。不谋私利，不慕虚荣。抱着宣扬文化的志愿，改进社会。同舟共济，努力前进！”

黎锦晖原想在社会上独树一帜，只演正派的节目，自然是行不通的。一九三三年明月歌舞剧社在南京演出，池座还没坐满，

一群“丘八”哄入剧场，恣意闹事，抢座不让，挥拳打人，拔枪威胁，观众纷纷离场。又一批警宪趁机而入，占领座位。这些兵爷们对演出儿童剧和宣传爱国思想的歌曲就喝倒采，对爱情歌剧则大声怪叫，拍手顿足，甚至向台上扔果皮烟头。这样一来，观众却步，十天演出结帐，倒欠老板一笔钱。

与此同时，在明月歌舞剧社拉小提琴的聂耳，也以“黑天使”的笔名在报上公开批判黎锦晖的爱情歌剧。黎写了《野玫瑰》一出歌剧，以一对恋人双双参加抗日义勇军为内容，来回答聂耳的批评。演出十五场，反映不错，其中插曲《民族之光》并得到广泛流传。但黎从事歌剧的积极性，由于内外夹攻，受到了极大的挫伤，以后他的歌剧创作活动也就逐渐停止了。但是，黎锦晖新开创的通俗形式和创办演出团体，仍然在京沪江浙一带延续下来。抗日战争期间，湖南也曾经出现过许多这样的班社。

黄源洛，长沙县人。其父黄晓东是湖南优级师范毕业的，学过音乐，家里备有不少乐器。黄源洛自小学便会玩各种乐器。在长沙师范毕业后，他考入上海美专音乐科，一九三〇年底毕业。在上海学习期间及毕业后参加了电影公司的乐队和各种歌舞班社的乐队，到过北京、天津、青岛等地演出。一九三二年回长

沙，在衡粹、民光、明德、一师等学校教音乐。他还参加了魏开泰、刘式欣等组织的大时代音乐社，写了《马尔加周达》、《幼儿之杀戮时代》等几部歌剧，由学生游艺会上演出。这大约是在一九三五年，是目前所知湖南上演自己所作的第一批歌剧。

一九三七年黄源洛到武汉参加中华交响乐团，后随团去四川重庆。一九四一年由地下党员雷兴宇配词，黄源洛作曲，时成中国第一部大型歌剧《秋子》，讲的是战争中反对侵华战争的故事，该剧在重庆和成都共演了四十多场，反映较好，重庆《新华日报》给了肯定的评价。黄于一九四七年回长沙，担任湖南音专的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继续为湖南培养音乐和歌剧人才，直到解放。解放后，以教授身份参加海军政治部文工团，以至现在。

抗战时期，有的学校的师生也自编自演过一些歌剧。如一九三八年益阳信义中学音乐老师何吉安就写过一个叫《从军乐》的剧本，在校内及对外宣传活动中演出过。但这方面的情况本人所知甚少。

通俗歌剧活动

我国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端于文化教育界。歌剧、话剧这些舶来的新戏剧样式，都是文化教育界首先搞起来的。在这种新潮流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戏曲界如京剧大师梅兰芳等，也搞起时装戏来了。

市民阶层需要他们自己的艺术，于是市民戏剧应运而生。但市民戏剧并非市民们自己创造的，而是把文化教育界和京剧界新创作的东西接受过来，加以改造，变成他们所欣赏的艺术，就是所谓“文明戏”。

试考察一下文明戏的剧目，就知道其中包括通俗话剧和通俗歌舞剧。这种戏剧的特点是：内容大部是表现市民的生活，

包含某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没有固定完整的剧本，往往只有一个提纲（幕表），演员可以即兴表演和任意发挥。这种演剧方法对于演技熟练的演员来说，无疑是显示他们的天才的极好机会。一些好的文明戏团体的演出往往是非常生动活泼的。有的文明戏团体也演出一些歌舞剧，可是他们唱的歌，多是演员所熟悉的歌（不论古今中外，拿来就唱，唱词也多用原曲的唱词，水平高些的演员甚至即席编造唱词）。他们的舞蹈或武打，也是演员会什么就来什么。这样的歌舞剧演起来，也颇生动有趣。象《夜半歌声》、《三笑》、《啼笑姻缘》等等，就是他们出色的剧目。

抗战以前，湖南曾来过这样一些表演团体。曾在京沪一带演过文明戏的湖南本地人，也筹组过剧团（社）。如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熊师安就在长沙组织了“九一八剧社”，这个剧团一直延续到今天，已有五十年历史了。它们在抗战时期，虽然也演抗日戏或时事戏，也演话剧如《日出》、《雷雨》等，但演出更多的还是一些通俗话剧和通俗歌舞剧。解放前这类剧团（有的从外省来又去了）在湖南大小城镇的市民中，曾经吸引了不少观众。我以为，要谈歌剧史（或戏剧史）是不能忘了这种艺术的客观存在和它的历史作用的。

文工团的乍起乍落

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初期，南下的部队文工团队和省湘江文工团，主要演出歌剧如《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他们的任务是把解放军的新文艺介绍到湖南。后来湘江文工团分成一个湘江话剧团和一个湘江歌剧团。另外成立了长沙市工人文工团、邵阳地区资江文工团、湘潭地区建设文工团、衡阳地区岳南文工团、零陵地区零陵文工团以及这些地区的县级文工队。还有部队系统的军区文工团、工兵文工团、军分区的文工

队和学校系统的革大文工团等数十个剧团。他们在南下部队和地方文工团的影响下，也大都演出新歌剧，为新歌剧在湖南的普及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一批歌剧艺术人才和观众。一九五二年全国进行剧团专业化、正规化的调整，加强戏曲改革工作，对文工团进行整编，湖南也撤销了一些全省性的文工团队，而在各地、县建立了一些戏曲剧团，抓地方戏曲的改革工作。在省级剧团中留下十八个人，准备成立省花鼓剧团。经过几年争取，于一九五六年成立了湖南省歌剧团。但未及一年，终因强调搞地方戏曲，又改成了花鼓剧团。从此，全省就没有一个省办的歌剧团体，歌剧人才也转了业，我省的歌剧事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一九五一年夏，搞了一次全省文工团会演。因为当时都是学生队伍，搞歌剧还不很熟悉，仅有一个小歌舞节目《双送粮》质量较高。这节目曾到北京参加会演，并到怀仁堂给中央首长演出，反映较好，其插曲《浏阳河》至今尚为人们传诵。

一九五六年虽然成立了省歌剧团，但领导上的意图是搞花鼓戏，用作曲（不是套花鼓戏老调）的办法处理唱段是不准许的。几经争取，才试创作出一个小戏《女社员》，那是完全按花鼓戏音乐的格调写的曲子，并用方言演唱，标明为地方歌剧。这个戏演出效果很好，曾于一九五七年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巡回演出，各地专为此戏开了座谈会。在上海开座谈会时，黎锦晖也出席了，他特别肯定了《女社员》用花鼓戏格调谱写音乐的成绩。

但是，那时湖南有些同志对外来歌剧与民族戏曲有不同的理解，认为地方歌剧，在音乐上一定要以老调子作基础，从而否定了《女社员》。并在一九五六年年底宣布把省歌剧团改为省花鼓剧团。

一九五七年二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歌剧座谈会，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明确地指出“在戏曲基础上发展新歌剧”

的提法不妥；创作新歌剧与戏曲改革应该分开进行，不宜混为一谈。当时，我作为《女社员》音乐作曲者，也写了文章寄交北京座谈会，提出应该用创新的方法发展新歌剧，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五七年第五期《戏剧报》的篇首。五月，全国整风鸣放，省花鼓剧团原来搞歌剧的一批同志纷纷提出意见，要求恢复省歌剧团。接着，在反右运动中，这批同志就被错误地划为“新歌剧右派反党集团”，我被定为头目，被开除出文艺界。

解放后，在国营的文工团之外，以民间职业剧团的形式，演出通俗歌、话剧的团体，在湖南活动的仍有四个，即“九一八”、“大众”、“华北”和“××”。一九五六年全省民间职业剧团定点，一个定在南县，一个定在澧县，“九一八”定在常宁；“华北”解散了，部分成员参加了上述三个团。因为这些团体一直是生长在群众中的，虽然从政治上看或从某种艺术角度上看，不是很强的，但它们演出的歌剧节目，例如《小二黑结婚》等，往往比文工团演的要生动得多，更受群众的欢迎，所以它们得以一直生存下来。以“九一八”为班底发展起来的常宁歌舞剧团，一直存在到今天。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提倡敢想敢干，戏剧界的思想也解放了一点；一九五九年《洪湖赤卫队》获得成功，影响全国，于是，湖南各地又纷纷建立起一些歌剧团体。

一九五八年，常德地区把澧县、南县两个团合并，成立常德专署歌话剧团，次年下放津市，改为实验歌剧团，一九六一年又调回常德，改为专区歌剧团。

同年，长沙市由搞湘剧和搞花鼓戏的老演员领头，结合一部分公安系统的文艺积极分子和中学生歌舞团的骨干，成立歌剧团，搞花鼓戏也搞歌剧，后改为实验歌剧团。

一九五九年元旦，郴州地区在该区业余文艺会演的基础上成立了文工团，后改为歌舞剧团，以演出歌剧为主。

同年四月，株洲市成立文工团，由建筑工业部文工团下放的一批老同志和该市厂矿学校业余文艺骨干组成，后改为歌舞剧团，也以演歌剧为主。

一九六〇年湘潭市委招收一批学生，送经西安歌舞剧院培训后，于次年成立歌舞剧团，一九六三年五月改为市花鼓戏二团，一九六五年又改为实验歌剧团。

一九六四年邵阳地区，通过全区文艺会演，挑选一批演员乐手，成立邵阳地区歌剧团。

至此，全省共成立了七个演出歌剧的团体，歌剧事业在我省逐步发展起来。但到一九六八年，在“四人帮”的“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口号下，这七个团和全省各类文艺团体一样，被全部撤销，歌剧和其它艺术事业一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文化大革命”期间，搞歌剧的同志，也和其他搞艺术的同志一样，有的下放当农民，有的进“五七”干校，有的长期被“群众专政”，有的还进了牢房。留下的少数人转去搞“样板戏”和纯属宣传性的歌舞，或被吸收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去。

一九七五年以后，歌剧事业才逐步有所恢复。许多地市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工团，又逐步演变为歌舞剧团或歌剧团。近几年来，这些剧团有的转向搞地方戏曲，有的被撤销。留下的地市级团体，计有岳阳市歌剧团，衡阳市歌舞剧团，怀化地区歌剧团，县级的还有新晃县文工团、花垣县苗歌剧团和古丈县文工团等。

从一九五七年省歌剧团撤销，到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前的二十二年间，全省歌剧活动曾几度兴起，前后成立的歌剧、歌舞剧团体多至二十来个。这些团体演出了全国新歌运动兴起以来的一些优秀剧目，如《白毛女》、《刘胡兰》、《洪湖赤卫队》、《小二黑结婚》、《江姐》、《红松店》、《红霞》、《红珊瑚》、《红鹰》等等，使新歌运动能够普及到部分群众中去。

尤其是演通俗歌剧有经验的常宁歌剧团，演出格调上更接近群众，流动演出的时间长，地域广，影响也较大。这些剧团在这二十二年中，也创作了一些剧目。但由于对新歌剧的创作强调突出政治，往往要求配合某项中心任务；歌剧本来需要有较好的抒情唱段，可是又只允许抒“无产阶级之情”，使歌剧创作受到很大的人为的限制，新留下的成功作品很少。加之这些剧团全是地、市、县级剧团，艺术力量有限，而且多是自发搞起来的，省文化行政部门对于如何促进歌剧事业的发展和建设，基本上不曾过问。会演、调演也没有歌剧这个项目。邵阳歌剧团的一个创作剧目要求参加调演，因为不肯改为花鼓戏而没有获准参加。株洲市歌舞剧团创作的《送货路上》，改为花鼓戏后才同意拍电影。因此，二十二年中全省歌剧界同志的创作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成品。

湖南省歌剧研究会

打倒“四人帮”和三中全会以后，湖南的歌剧事业呈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势头。一九七八年全省戏剧会演就有《中原女烈》和《带血的百鸟图》两部歌剧获得一等奖。《中原女烈》还在电视台播出了。一九八〇年省文化厅艺术处直接领导并投资由湘潭市歌剧团推出了轻歌剧《现在的年青人啦》，后由中央歌剧院在北京演出。长沙市歌剧团创作的《三个女儿的婚事》曾流传到七个省市，上海、天津的歌剧院都曾上演。常宁歌剧团整理的老剧目《夜半歌声》和改编的《不准出生的人》，株洲市歌剧团改编的《特别代号》都曾在许多剧团演出，且流传到邻省去了。

另一方面，各歌剧团普遍存在着人员青黄不接，艺术力量薄弱且不配套，经费困难等等问题，大多数剧团都面临着一个生存问题。如何巩固现有的歌剧团，如何发展歌剧的大好形势，是摆在文艺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在一九八〇年省文化

会期间,由朱立奇、银汉光(两人都是一九五七年为歌剧被划为右派于一九七九年改正后归队的)、李克琳(长沙市歌剧团编剧人员)等同志发起组织湖南省歌剧研究会,得到省文联、省剧协和省文化厅的支持,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因为省一级没有歌剧团体,省歌研会就起着联络全省歌剧团体和歌剧从业人员、促进歌剧创作、向省文化行政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的作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朱立奇、范光新(长沙市歌剧团演员)作为全国歌剧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湖南代表出席大会,李克琳、盛和煜、潘一尘、刘振球等同志则作为歌剧创作人员参加大会。大会以后,潘一尘同志作为文化厅剧目室工作人员,朱立奇、李克琳、刘振球、银汉光等作为歌研会成员,配合剧目室进行工作,促成了一九八四年三月的全省歌剧巡回观摩演出。这次活动有七个歌剧团体参加,演出了大小剧目十二个,经过评选,湘潭市歌剧团创作演出的《蜻蜓》,长沙市歌剧团创作演出的《灯花》和常德地区歌剧团创作演出的《犁担姻缘》质量较高。同年六月,北京举行第三次歌剧座谈会,湖南去了朱立奇、刘振球等八名代表,并调去《蜻蜓》和《犁担姻缘》两个剧目给大会演出。从此,湖南便被称为“歌剧的绿洲”。参加这次调演的歌剧团体都是中央和大军区一级的歌剧团。唯独湖南的两个节目是地市一级的小团。

绿洲在艰难地开拓

调演归来,为了迎接全国歌剧会演,湖南的歌剧团体及创作人员,仍在继续努力。以期拿出更多更好的剧目。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也很重视。成立了临时歌剧工作组,歌研会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这个工作班子。工作组主要抓剧本创作。一九八五年年头年尾,分别召开了两次歌剧剧本讨论会。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省文化厅分别在长沙、湘潭和长沙市郊开了三次歌剧工作

会议。

但是，这个期间，歌剧团体的处境仍然是艰难的，如果不说是更加艰难的话，舞台演出的进一步不景气，使得各剧团大都被迫去搞“副业”——即为音乐茶座伴奏和伴舞。当时正值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调整，歌剧团体是否应该继续存在，成为各有关地市议论的问题，真是前途未卜。曾经以两个通俗歌话剧团为班底、在滨湖一带颇受群众欢迎的、一九八四年以《犁担姻缘》去北京参加调演载誉归来的常德地区歌剧团，竟在今年春天被撤销了。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省文化厅和歌剧工作组，为了推进歌剧事业，排除一切障碍，于今年六月底至七月初，举办了全省歌剧话剧观摩演出，参加演出的歌剧节目共有六台，在湖南歌剧史上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它预示着歌剧的美好前途。长沙市歌剧团演出的《想穿牛仔褲的老知青》，无论在音乐、导演和表演方面都有突出的成绩。株洲市歌剧团创作演出的《小巷歌星》富有新意，音乐、表演和舞美，均获得了广泛的称赞。新晃县歌舞剧团演出的侗族神话歌舞剧《茶花妹》，把人们带入了一个纯朴、美丽的世界。常宁县歌剧团改编演出的《兰花约》，是一台反封建的现代戏，取得了非常感人的效果。郴州地区歌剧团创作演出的《公寓13》清新流畅、意趣隽永，是反映城市生活的一台成功之作。湘潭市歌剧团创作演出的《深宫欲海》以浓重的笔墨，揭示出封建宫廷的秘密，是一台高层次的好戏。文化部代表万弢舟专员和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张拓同志，对湖南这次观摩演出，作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说：湖南这块歌剧的“绿洲”，果然名不虚传，而且比两年前更加繁茂了。又说：“有人怀疑中国能否搞自己的歌剧，不知道中国歌剧是什么样子，那么，请到湖南来看看吧！”关于歌剧发展：今年十二月在长沙有全国性的盛会，必将显示一个新的里程碑了。

我生活的艺术天地

周 文 珊

姑娘生来爱唱歌

假如我有那么一点点艺术天份的话，应该来自祖母和父亲的遗传。我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对他老人家知道的不多，祖母的事就知道得较多了。她有中国文学修养，诗词歌赋样样能，而且更喜欢京剧。在那个时代，她已拥有一架新式的留声机，虽然是手摇上链的，但喇叭已经装在机内，并不是那种大喇叭装在外面的。家中各式戏曲唱片很多，还有当时流行的时代曲，电影插曲等，我们从小就听了不少音乐。

父亲承受了祖母的艺术气质，他虽然是矿冶工程师，对于中国文学却精透，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字。家中经常有人来访，都是请父亲赐给墨宝。在他的书房中，有许多宣纸。父亲写对联的时候，我就磨墨，帮忙拉纸，看着他布局，然后将那潇洒的大笔，在纸上写出了漂亮的字。最佩服他写悬腕字，手的功力真了不起。爸爸觉得我也有写字的天份，要我先练习临帖颜体、柳体，我就是没有那样的耐性，临了几个字以后，就在纸上自说自话的乱写。爸爸说我是鬼画符，所以我就没有练成甚么体，只是自己乱写一通。但是桌上文房四宝经常放着，有空时，就去鬼画符的写几张。

父亲是京戏票友，时常粉墨登台。他唱黑头，大花脸，照

* 周文珊系湖南长沙人，现居香港，著名抒情女高音歌唱家、教授。此稿为周女士自述，一九八二年写于香港。

声乐的观点来说，他属于男中低音。声音宏亮有力，家中常有票友来聚唱，并有琴师来伴奏。父亲要我和比我大两岁的二姐学戏，二姐长得秀气斯文，要她学青衣，我比较好动象男孩子，小时还喜男装打扮，所以要我学老生。我却两样都唱，也学了几套戏，好象《打渔杀家》，《武家坡》，《苏三起解》等。我还在学校表演，有时一人唱青衣、老生两角，倒与邓寄尘有异曲同功之妙；但我始终喜欢唱歌多于唱戏。在中学时，教生化的老师，他觉得我嗓子不错，也很赞成我学京戏，我说：“不会看工尺谱。”他很有耐性的将谱都写成简谱，我总觉得自己唱京戏的腔调，仍然是唱歌腔，所以辜负了父亲和老师的栽培。

我原籍湖南长沙，生于南京。当我三岁时，母亲带我们回乡拜望外祖父母。母亲共有兄弟姊妹十人，她是最小的女儿，排行第九，所以我的表兄弟姊妹很多，大部分都年长于我。那时我会唱民歌《小白菜》，常常当众表演，又唱又做。这首《小白菜》已是我首本戏，因为我唱得多，其他表兄弟也学会唱了。当他们唱时，我却很霸道地说：“不许唱我的《小白菜》！”这都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原来我早已实行版权所有，不许翻印的政策了！

小学时，常有机会登台，不但在校内，还经常派到校外表演，并去过几次中央广播电台播音。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位同学两人合唱一首《我亲爱的小弟弟》。这首歌是讲亲爱的小弟弟一病不起，歌曲哀伤婉转。和我合唱的女孩，她回家曲不离口的唱，她母亲一听歌词，就骂她不许唱，因为她家上面有三个女孩，最后一个才生弟弟，妈妈听到这样的歌曲，当然不喜欢女儿唱了。

当我升到小学五年级时，全校要选主席，奇怪同学们都一致选中了我。他们都说我唱歌好听，没想到爱唱歌还有机会当上

领导呢！

有一次学校派我们到交通部的一个晚会演出，因为我们学校是属于扶轮社的机构学校，与交通部有关的。这次的演出十分隆重，音乐老师选了四个同学，我们表演一首菊花歌舞，分为红、黄、紫、白四朵菊花，我就唱红菊花一角。妈妈一早替我做一件枣红色丝绒舞衣，白色花边领口、袖口，我们都穿白色长统袜，这是我第一次穿长统袜。我们并没有穿舞鞋，就是以袜在地下歌舞，比较轻盈。回到后台，我们四个人的袜底都变黑了。晚会的节目很丰富，我们表演后得了不少礼物，在回程的车上，四个小孩都睡觉了，礼物洒满一车。到家门口，是别人唤醒我们的。

祖母去世后，这架留声机就是我们听音乐的专利品。那时我喜欢听儿童歌曲和当时的流行曲。有一年夏天，我在乘凉，一面开唱机听音乐，自己却沉沉入睡。那个唱针没人管，一直在来回的转，将唱片也弄花了，给姐姐骂了一大顿，如果有现在的自动掣就没事了。有这么一架留声机，给了我童年的初步音乐教育。

当时的歌曲内容都很健康，还有不少专为儿童写的歌舞剧。我听姐姐们唱的歌曲，也跟着她们唱，那时只是信口开河，唱的甚么也不明白。现在依然记得其中一首《悲秋》，歌词相当不错：

“秋风起，秋云低，一片片的落叶满阶前，远望天空漫无际，只有一只失群的孤雁，徬徬徨徨向着北面飞。雁呀！你可是同我一样，有人欺侮，没人怜。那谁复有真情？谁复有真情？只是见你的青春美貌，才供他片刻的流连，片刻的赏鉴，谁来管你，春去秋来，一年老一年。”现在凭音调记下来，才知它是一首嗟叹红颜薄命的歌曲。

多姿多采的学生时代

我的学生时代，全是在战乱中度过。虽然生活艰苦，颠沛流离，但那是一个充满着激情和富于朝气的时代。经过战争的洗礼，在热炙的战火熔炉中提炼过的人，生活面更广。

逃难开始，我还不太懂事，以为暂别了南京的家。记得当时长江的船票很难买到，我们特别从上海买票，由南京上船，爸爸仍留守工作岗位，妈妈带着我们一家三代，上有叔祖母，下有七个儿女，还有伯母、堂姊、堂兄，浩浩荡荡的驶向武汉。临走时，妈妈不许我们带留声机，我们坚决反对，结果还是带走了。大姐看见花园中的玫瑰开得正美，还剪下一大束鲜花，预备上船去插花瓶，那知上船的一刻，简直象打架一般。码头上的苦力将我们的行李，你争我夺的抢着挑，妈妈带着一群小家伙，总算安全上船，六十件行李都安然无恙。

我们在船上还十分开心，没想到这是中日大战的开端。船到江西时，有一位警察局长上船来，看他的来头不小，随员众多，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吸食鸦片。这位局长在船上吞云吐雾，连房门也不关，因他的舱位离我们甚近，我闻到一阵异味，发现异味来源，与弟弟一同去参观这位局长抽大烟的模样，他却堂而皇之，旁若无人！

到达故乡之后，因怕敌机轰炸，两位姐姐留在城中念中学。妈妈带着我和弟妹们住在乡下，真是开心，因为还有其他表姊妹，都住在一间大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乡村的情景。整日游山玩水，在田野中采摘奇花异草，压在书本中，做成书签，寄给在城中读书的姐姐，并向她们描绘乡村的风景，使她们羡慕不已。

我们成群结队，到田里去拔新鲜萝卜，或在瓜架上摘新鲜的黄瓜，拿到清澈见底的溪水中去洗，然后吃着脆生生的瓜，

顽皮起来，就卷起衣裙，在清溪中追逐小鱼群，真是其乐无穷。屋后的竹林，新生的竹笋，我们用脚一踏，就取得了一条嫩笋。听见老母鸡咯咯的叫，我们就到鸡窝去拾带着温暖的新鲜蛋。见到大人们亲手做的湖南腊鱼、腊肉、腊八豆、糍巴、在火炉中煨的蕃薯，还有随时炒出来的黄豆、冲的咸味茶，人们连茶叶豆子一齐吃下……我体会到乡村的生活，也热爱乡村的生活。

我的生活太自在了，妈妈担心我会荒废功课，将来考不到中学，所以监督我要做完功课，才许出门玩。母亲教我功课，我们在灯下对坐，她写信给父亲。有空时，就练毛笔字。我看母亲写字，竟学得与她一样的字体。我模仿别人的笔迹，有点本领，有一次在中学还被老师教训过，因模仿班主任，在黑板上写布告，冒签老师的大名。虽然那次的动机是好的，因见值日同学未清洁课室，地上很脏，于是布告上写：要罚该位同学多做三日清洁工作。同学们以为是真的，后来班主任说：你的原意很好，但不能冒别人名来出布告。这件事我一直牢记。

下一学年，母亲将我送到一间寄宿学校就读。那儿临近我的二姨母家，所以仍然不觉寂寞。我在学校是活跃分子，歌唱、话剧都有参加，学会了很多抗战歌曲，例如：“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我们就由五位同学扮工农兵学商，载歌载舞的唱出这首歌。

前年一位我当时的老同学，他从美国回国探亲，过港时来我家小聚，还提这件事。

战事失利的消息传到，我们在长沙大会战前，又迁往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那时我们家的人更多，除了我们自己家的兄弟姊妹外，好多表兄表姊，他们也与我们一家撤到大后方。有好几位都正上大学，一到假日我们家更热闹了，表兄姊他们，又带

了他们的同学来，我们家开饭时，除了桌上坐的，还围了好几圈城墙。这些年甯人都叫母亲“姑母”，许多朋友问起母亲：“你怎么这么多侄儿、侄女呢？”妈妈笑着回答他们：

“有些是野侄儿、侄女呢！”母亲能干，深察人情事故，且还是这些年青人的爱情顾问呢！当他们讲起自己的恋爱故事，要母亲提意见，我在旁偷听，他们还叫：“你这小鬼走开！”有时，我又是他们初恋时的电灯胆，到时机成熟，我这小鬼就要退居幕后了。

逃避战乱，我很幸运没有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过。我们先后到过昆明、乐山、贵阳、重庆等几个大后方城市居留过，都是随着父亲工作的机构搬迁。加上我以后去过的地方，中国大地我曾到过十三省，所以真正嗅到不同地方的乡土气息，这对于我日后植根在中国艺术上有极大的帮助。我喜爱听中国歌曲，尤其中国民歌，今年八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独唱会，唱了三首中国民歌。乐界人士对于我的中国民歌还很欣赏。我特别喜爱云南民歌，因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在田野中工作的青年男女，他们是如何将他们的爱情讯息，由宽阔的阡陌之间，以嘹亮婉转的歌声，传送到对方的耳里。

在绘画上我学过油画和国画，但我更喜欢一挥即就的中国写意画。

从中学到大学

难忘的中学时代，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抱负的青春岁月。我先后在乐山、成都、昆明等地念过书，因为逃难的关系，有时到达一个城市，学校已经开学，我们姊妹只有请补习老师，在家学习。我算是一个用功好学的学生，例如我并未初中毕业，而且一跳班就跳了一年半，我由初二直进入高一下学期，在班上成绩还名列前茅。我的读书方法很简单，上课时一定用

心听课、抄笔记，我喜欢参加课外活动，并不死读书。到考试时温习笔记，从不开夜车，早班车倒是常开的。我自小到大都有早睡早起习惯，同学们给了我一个花名“早神”。他们起不来的话，都要我这“早神”去吹起床号。高一读完，家中又要搬回桂林，因母亲对四川的水土不合，喜欢桂林。学校给我奖学金，要我留读到高中毕业。父亲说在战乱时期，不要分开，全家的人总要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我只得放弃了喜爱的中华女中。为了这件事，还闹家庭革命，关起房门写日记，绝食抗议。后来还是给双亲劝通了，又重返桂林。

在中华女中时，有一段很芳香的回忆，要叙述一下。学校的环境相当好，校园中遍植槐树。记得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日上午，课室静悄悄地，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数学习题，窗外飘来阵阵槐花香气沁入心肺。当时自己有一种极大的幸福感，在这战火遍地的时代多少人家放人亡，我还有这样的机会，安静地读书，一定要好好用功。值得父母欣慰的是我的成绩一直都不错，因好胜心强，考试时总要得高分，而且好胜过头，每科考试都要抢着交头卷。有一次粗心大意，漏做了一条题目，下课后还哭了一大场。因为我跳班的关系，十七岁就做了大学。

抗战末期，我进入桂林中学，是广西最好的中学。这是第一次进男女同校念书，班上女孩子不到十人，男同学五十以上，所以其他女同学都很害羞。从小家中表兄表弟很多，加上自己也有几分男子气，所以与同学们没有隔膜。那个时候也是搞课外活动最多，学校举行唱做比赛，我每年都参加，年年拿冠军。到了高三的下学期，我不想参加，要让其他同学分享冠军的乐趣，结果赛后学生会邀请我特别客串表演一曲。

我们演出《野玫瑰》、《风波亭》，还有许多当时救亡抗日的独幕剧。最记得是李健吾的一个独幕剧。其中是讲反间谍的故事，要用到真的手枪，我就去向一位在军队工作的朋友借用

他的配枪，引起他向我展开追求攻势，写了好几封情书给我！后来我将这些信给母亲看，还是母亲帮我解了这个围。我根本未想到爱情这件事，只抱着我要好好念书，将来考一间著名大学，前程远大。我相信每个读高中的学生，都是有志气也充满着幻想的。

演《风波亭》时，我做岳飞的女儿银瓶，知道父亲被奸人迫害而死，哭得泪流满面。当时我是由一位老人家扶着的，那位扮老人家的同学，在我的耳边轻轻说：“不要真的哭，你脸上的油彩要洗掉了！”

一直喜欢唱歌，还参加了全市的唱歌比赛，也得到了冠军。我偷偷的去投考广西艺专，考取了，母亲不赞成我去读。她说：“你的功课不错，应该入大学。唱歌只能算是兴趣，而且唱歌很辛苦。”我听了她的劝告，而且依她的愿望，考取了全国数一数二的清华大学。

我们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进入清华的。自己比较好动，适合学社会学，而且知道社会学系，是一门新的社会科学，社会系的教授都是鼎鼎大名的，如费孝通、潘光旦、陈达、吴景超多位。我计划要好好充实自己，这样好的读书环境，图书馆、大礼堂、体育馆……都是极富代表性的建筑，真的要努力吸取精神食粮。大一的时候，我没有参加任何课外活动，只是埋头读书，还有在报章杂志投稿。我选过李广田教授的各体文习作，每一次上课，我们自己拟题写文章，他又给我们讲解文章的写法，现在我还留着他上课的笔记，每次发还作业的时候，他将认为好的文章，先发给同学，我常有这样的机会。下课后，同学们追着要看我的稿，我也以此为荣呢！

到了第二年想静也静不下去了，因为有过去的中学同学也进入清华，她邀我参加合唱团，当时由张啸虎指挥。他是清华土木系毕业，转行搞音乐。在那动荡的时代，有血气的中国青

年，决不能“闭关自守”。反饥饿，贴大字报，沈崇事件大游行，我们投入了另一个革命的狂潮。

歌唱，话剧，文学创作都是反映时代的产品，比在中学时期更搞得有声有色。我们演出过茅盾的《子夜》话剧，还请了黄宗英来导演。除了在课堂上的功课外，更读了许多课外书，生活感到更丰盛。

校园中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现实与生活都是如此。水木清华的朝晖夕照，朱自清教授的杰作《荷塘月色》的荷塘，在春花怒放的日子，树荫下传来阵阵的读书声。冬日积雪，荷塘变了同学们的溜冰场。黄昏以后便播放音乐，大家翩翩飞舞在冰上。多么幸福的大学生活！

音乐生活更多姿，薰光光、马思宏、黄源尹的三人音乐会，程砚秋的京戏清唱，使我们吸收到更多艺术营养，这些都是毕生难忘的回忆。

半途出家皈依音乐

结束了多姿多采的学生生活，结婚定居香港，幸好找到一位音乐爱好者作伴侣。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外子只是一个打工仔，我们住的亦是一间尾房，客厅公用。我就去租了一架琴，开始了多年未完成的夙愿，当时拜周书绅和胡然两位学琴学唱。学唱一年之后，在胡老师的个人独唱会中，他为我安排了两组节目。记得两首中文歌是：《我住长江头》和《阳关三叠》；普契尼的歌剧选曲《亲爱的爸爸》；托斯卡中的《为了艺术和爱情》也唱了。初试啼声，反应很佳，胡老师鼓励我“你应该有学声乐的信心了。”这样我每日琴歌不辍的开始了音乐生涯。外子亦答应我，如考到皇家音乐学院的歌唱文凭，送我出国留学。他未想到我一次就考取了，为了遵守诺言，他终于让我去意大利留学。一去就是六年，这一段时间，

对于一对年青的夫妇，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有音乐的联系，我们都很坚贞的完成了任务。

回港以后就开始了教唱和演出的香港式音乐人生活。那时大会堂是很容易租到，大堂也只五百元一晚，我经常开独唱会和学生音乐会。外子也是搞这行的熟手，除了自己办音乐会外，亦义务的帮别人搞演出。香港的正统音乐开始萌芽，我们对于提倡正统音乐，也应记上一小功。那时本港留学外国的声乐老师不多，我的教学成绩相当好。学生在各项公开歌唱比赛，常名列前茅，学生人数亦不少，但我始终觉得人不是机器，我选择学生也有条件，如果他的资质好，不用功的话，我也不收他的。有一个学生声音好，模仿力强，但一点乐理基础没有，她得过两届歌唱比赛亚军，以为做歌唱家很容易，我教她唱歌就象教鹦鹉说话一般。她不好好学乐理，我开除了她。当时男高音田鸣恩说：“没有私象老师开除学生的。”我知道学声乐不是会靠嗓子，要有音乐天份，更要下苦功。我不认为音乐是用作求名求利的工具，我们要有艺术良心，遇到一些没有天份的学生，尤其是男学生，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以歌唱为终生职业，将来会饿死老婆和儿女的，作为一种艺术修养就可以。”因我不想为了赚人家的学费，误了别人终生。

学而知不足，尤其为学生们预备考皇家音乐院的高级班，还有听到外国演唱家，他们演唱曲目之广，涉猎之多，令我钦羨。我感到仅是意大利的歌剧，不能满足艺术要求，我开始找私人老师学习德、法两种语言，打算有机会再短期出国深造。我们的生活也日渐好转，外子对音乐和唱片的爱好，好似女人追求时装，但从这些消费中我们获益不浅，音乐知识更加丰富，也更感到自己所能太少。我家有千多张唱片，去年还将澳洲搬回来的四千多张唱片，赠予清华书院。目前家中有一间房，专门用来放唱片，我想这些知识的宝藏一生也受用不尽。

除了庆幸自己有这般的欣赏机会之外，更感人生苦短，无法听完世界名曲。我这一世耳朵的享受是很够了，当自己听到美妙的乐韵时，想到别人没机会欣赏这样的音乐，不是在度一生吗？！

我的生命旋律都是快乐轻松的调子，乐天知命，很少有短调（Minor Key）的。我的爱好除音乐外，绘画，养花（天台种了一百多盆花）。还有就是客串爬格子，我是天主教徒，总感到天主给我的惠宠已经太多了，我应该多为人们做些事。所以曾做过十三年清华音乐系主任，担任台湾文艺康乐协进会音乐总监六年，目前属下有两个儿童合唱团，一混声，一女声合唱团，今年五月又成立了台湾管乐团，经常筹划青少年的音乐活动。星期六，星期日也投入工作了，我觉得生命是充实的，并未虚度一生。

这些年来，因工作很忙，每年我都要赴世界各国见见世面，也借此轻松一下。当我学过德文法文后，我曾到过奥国莫扎特音乐院，研究德国艺术歌曲，又曾多次参加英国的暑期音乐大师班。除了使自己音乐领域更扩广之外，亦为了更有效的去教育下一代，我参加过几次声乐老师讨论会，得益不浅。音乐是世界性的，我们后代的音乐天地，将会比我们更辽阔，所以作导师的应该辅导他们，使他们成为既博又精的艺术家。艺术是不应该封锁在象牙之塔里，海阔天空任遨游，那是一个欣赏不完的美妙世界！

最近一位意大利著名男中音金罗·贝琪，来此讲学，他的教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说：我的教学不是为了赚钱，是要将我一生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今年八月我在北京认识他，所以他来港时，我听了他的三场讲座，还请他来我家。我唱了三首意大利歌剧选曲，请他指教，他对我的发声评语不错。我新学的一首意大利近代作曲家费拉理的歌剧选曲，是用威尼斯的方

言唱，他给我提了不少意见。有的人说：“周老师你不用再学了。”我想这句话并不正确，追求艺术的完美永无止境，就是世界的名歌唱家，他们亦经常到老师处练声，和研习新歌剧，这是我在意大利亲眼见到的。有的歌唱家就是一出同样的歌剧，他们已经唱过无数次了，仍然要经常与伴奏练习。我深深的体会到，学海无涯。如果你谦虚的话，在艺术的园地上将有更好的收成，愿以此与同学们互勉。

